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在斷層中延續：天兒慧論中國

Continuing on Faultlines:

Amako's four theses on China



曾采薇

Tsai-Wei Tseng

指導教授：石之瑜博士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September, 2012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在斷層中延續：天兒慧的生活中國

Continuing on Faultlines:

Amako's Four Theses on China

本論文係曾采薇君（學號：R98322035）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1 年 3 月 29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石之瑜

（簽名）

（指導教授）

陳彤仁

何思博

謝辭

研究所三年的時光，真的是轉瞬即逝。這段時間，無論在學業上、生活上，都預見太多太好的人，經歷太多太好的事情；求學的過程縱有辛苦之時，這份珍貴的經驗仍然讓我珍惜萬分。

這本論文的完成，首先當然要感謝指導教授，石之瑜老師。對於外交系畢業的我來說，老師的研究領域與研究方法都是我之前鮮少接觸的；但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讓我產生了莫大的興趣，並決定跟老師學習。無論知識上、論文的寫作上、學術的理想乃至作人處事的道理上，老師都給了我太多啟發；能夠在研究所的期間和老師學習，真的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

再來要感謝擔任口委的陳鵬仁老師與何思慎老師。兩位老師都給予很多精闢而重要的建議，甚至對論文的格式與訪談稿做出指正，對我論文的完成有相當大的幫助。也要感謝曾經提供我助理機會的楊永明老師及張登及老師，讓我接觸了更多日本與中國相關的研究。最後感謝本論文的討論對象天兒慧老師，在百忙之中撥冗接受訪談，讓我有機會了解更多老師的想法。

特別謝謝邵軒磊老師，無論在赴日期間或論文初期的構思階段都給予很大幫助。而安排訪談的沛君學姊、同行的治中學長、晃銘、協助訪談稿的鈴木同學，都是協助這本論文完成不可或缺的人，謝謝你們！當然還要謝謝其他台大政治系的老師，開拓我學術的眼界；也要謝謝政大外交系的各位老師，為我奠定知識基礎。

在知識的學習與交流上，當然還要感謝團隊中的同學。謝謝有形、宗翰、厚穎、容禎等學長姊，宇馨、小艾、翊豪、敬豪、恒光、庭豪、宜錚等同學彼此的建議與鼓勵。謝謝在 410 一起工作的凱蒂、怡瑾、苑柔，希望研究室的溫馨氣氛能夠一直傳承下去。當然還要謝謝一起跟隨石老師學習的欣嫻。懷念我們一起暢談學業的時光，也祝福你工作和論文都能順利。

也要謝謝除了學業上，精神上也給予我很多支持與鼓勵的研究所同學。大學以來就是同學的方隅、育真、其睿，研究所期間才結識的明萱、冠穎，以及 112 研究室的銘男、伯駿、莉筠，對我來說大家都只能用「強者我同學」來形容，真的讓我獲益良多到了大開眼界的地步。也很懷念一起組英文讀書會、寫論文、努力準備考試的時光；大學畢業後還能結交好友，倍感珍惜。謝謝擁有革命情感的夥伴羽穎，你總是能更夠理解我的那些想法，也很開心看到你已經在開創新的人生。

最感謝的當然是爸爸和媽媽，以及哥哥和兩位阿姨；沒有你們的支持，就不可能讓我有機會完成學業。藉此機會也感謝高中同學智萱、怡賢、卉勻、怡君、鴻哲，以及大學同學昕伶、姿茵和巧潔；謝謝你們一直以來的關心和鼓勵，能夠一直和你們保持聯繫，真的很開心。也要謝謝育君和巧柔，除了給我日文上的幫助外，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總是那麼開心，可以忘掉所有麻煩的事情。最後當然要謝謝嘉晏。大學以來，任何生活的喜悅與低落，總是有你跟我分享，替我打氣，給予我前進的勇氣。記得曾經跟你說過會在論文中感謝你，現在終於有機會實現。

求學的生涯告一段落，未來還有許多需要努力的事物。無論是論文的寫作還是求學的歷程，真的有太多要感謝的人事物，非謝辭篇幅得以言盡。因為有你們在，我總是覺得自己的人生幸福又幸運，謝謝你們！

采薇

2012 年 8 月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日本學者天兒慧的中國研究。其觀察中國的政治社會情勢，認為中國在四個層面上具有「斷層」，分別是都市與農村、精英份子與民眾、統治的制度化與視狀況而定的人際關係，以及政治掛帥經濟殿後政策之間的差距；並以此提出「基層結構」概念，作為分析中國時的基礎。天兒慧也沿用此一概念提出其對中國議題的看法，經整理可分為三種方向：毛澤東和鄧小平時期政治與社會關係的研究、中國的對外關係與日中關係。

本文發現天兒慧在中國議題的論述中，看重「斷層社會」和「基層結構」的概念。具有斷層特性的基層結構，成為「難以改變的特徵」，影響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毛澤東到鄧小平時期的領導風格，以及中國的對外關係，就分別受到基層結構中的社會和歷史因素影響，而具有延續性。而日中關係的變化，則受到基層結構中文化因素的影響；既有改善關係的基礎，又有難以避免的衝突因素。

關鍵字：日本中國學；天兒慧；毛澤東研究；鄧小平研究；中國對外關係；日中關係

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China study of Japanese scholar Satoshi Amako. Amako observed th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considered that there are four "faultlines" in China's society which are the gaps between cities and urban, the elite and the mass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Amako brought up the concept of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uses it to analyze China issues. Through studying Amako's China study, there are three main topics: research of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research about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hat the author found was that Amako's China study place importance on "the society with faultlines" and "the basic structure". The basic structure in China is just the society with faultlines, and it is also the "unchanging characteristic" which influences China's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social factor of basic structure influences the leadership manner of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and the cultural factor of basic structure influences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Moreov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have also been influenced by cultural factor of basic structure. The cultural factor can improve relations but can also cause conflicts.

Key words : Japanese Sinology ; Satoshi Amako ; Mao Zedong studies ; Deng Xiaoping studies ; China's Foreign Policy ; Japan-China Relations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V
英文摘要.....	V
目錄.....	VI
圖目錄.....	V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3
第三節 問題意識.....	8
第四節 文獻檢閱.....	10
第五節 研究方法.....	19
第六節 章節安排.....	19
第二章 斷層社會與基層結構：.....	21
第一節 基層結構概念.....	21
第二節 中國基層結構與結構因素.....	24
第三節 天兒慧的中國經驗與基層結構概念.....	37
第四節 小結.....	42

第三章 天兒慧當代中國論述.....	43
第一節 毛澤東、鄧小平時期的 政治、社會與領導風格.....	43
第二節 中國對外關係與中國威脅論	52
第三節 小結	60
第四章 天兒慧的日中關係	61
第一節 日中關係的變化與重要議題	61
第二節 影響日中關係的文化與戰略因素	68
第三節 小結	75
第五章 斷層與延續：天兒慧知識脈絡	77
第一節 「基層結構」的意義	77
第二節 天兒慧在當代學界的定位與特殊性.....	86
第三節 小結	90
第六章 結論	93
參考文獻.....	97
附錄一：天兒慧簡介資料	103
附錄二：天兒慧訪談稿.....	106

圖目錄

圖 1	問題意識.....	9
圖 2	天兒慧的中國分析架構.....	14
圖 3	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支配.....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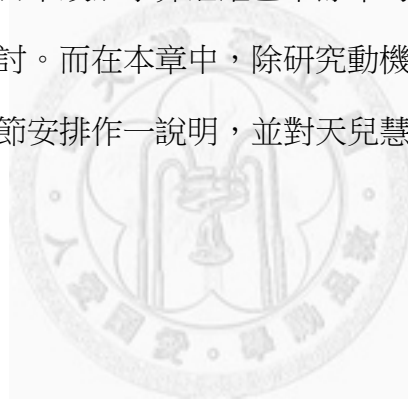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綜觀歷史，日中兩國間的關係雖然時好時壞，但兩方地域鄰近、互動密切、對對方的影響甚鉅，卻是不可抹滅的事實。對日本來說，中國曾是日本朝貢的對象、文化輸入的起源，但也曾經國力衰微、不堪一擊，遭到日本入侵。而對中國來說，日本曾經是「四夷」之一的蕞爾小國，卻也是在 19 世紀末國力迅速增強，戰後經濟也快速復甦的東亞強權。除了歷史上文化、情感的密切與戰爭造成的糾葛，兩國在邁入 21 世紀的今日，隨著中國經濟、軍事的成長，與日本經濟相對的衰退，兩國的關係變得更為複雜。雖然今日兩國仍深受過去歷史議題、雙方貿易問題、領土上的爭議所困擾，但兩國的交往確實淵遠流長，中國也一直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的研究對象。

日本的中國研究歷史悠久，簡略的可以分為漢學、支那學、中國研究和戰後的中國學研究時代（何培忠，2006：398）。當代中國研究面向則越來越廣泛，不僅只侷限於文學、歷史等領域，也越來越多經濟、政治、安全等方面的研究。這些領域在 1970 到 1980 年代時，缺乏系統化的研究方法，且經常受到情感的影響。一直到 1990 年代，才逐漸出現以價值中立為圭臬的研究。隨著 1989 天安門事件、中國的經濟發展等變化，日本的中國研究也有新動向（Ash et al, 2007: 133-136）。中國共產黨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政黨與國家關係的比較研究、中國共產黨、人民代表大會和解放軍之間的關係、中國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以及中國總體外交政策、對主要強權的個別政策、「新安全觀」、中國威脅論與中國的國際環境觀等，都是當今日本中國研究在政治與安全上的重要課題（Ash et al, 2007: 138-143; 194-207）。

日本的中國研究課題隨著中國本身的變化有許多新的發展，其中日本的現代中國研究者—天兒慧，也在這些領域中有所貢獻。天兒為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自學生時期以來，長期關心中國的現勢議題，20 幾本專著或編著的著作與上百篇的期刊文章中，幾乎全部都和中國有關。天兒研究的中國議題十分廣泛，從中國國內的政權交替、改革開放的政策，到中國對外的外交政策、日中關係等，都有所涉略。其提出研究中國的「基層結構」分析架構，也被日本另一名中國研究學者小島朋之（1943-2008）認為是 1990 年代日本政治科學理論意識抬頭的代表之一（Ash et al, 2007: 135）。本論文的目的即是針對這樣一名在當代日本政治學界活躍已十餘年的學者，及其在日本知識學界中的定位與貢獻進行探討。而在本章中，除研究動機外，也將針對論文背景、問題意識、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作一說明，並對天兒慧之文獻做一回顧。



第二節 研究背景

壹、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發展情形

日本的中國研究在戰後以「中國研究」的形態出現，此後歷經了一段確立與分歧的過程。隨著中國國內環境的改變和日中關係的變化，日本的中國研究在 1980 年代之後進一步有了更大的轉變。日本的中國研究自 1950 年代中期以來就被確立在「區域研究」的位置之下；雖然區域研究的方法一度造成爭議，¹但現今已是日本中國研究的主流。

一、「中國研究」的出現、確立與深化

過去通常將「五四運動」之後視為中國「現代史」的開始。然而，近來在日本和中國都出現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現代史開始的新見解，也廣受各家採用（山根幸夫，2000：1246）。不過，對日本來說，20 世紀 40 年代後期的大事不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還包括了日本在戰爭中的戰敗。這兩件事情都深深衝擊了日本對中國的看法，最明顯的影響反映在日本對中國稱謂的改變之上。無論是政府機構、教育部門、民間機構還是各種出版物，都將「支那」的稱呼改為「中國」。而由於政府政策的介入，大學中「支那哲學」、「支那文學」的課名改為「中國哲學」、「中國文學」，學生也開始在學習漢語；日本對中國的研究可說是進入了「中國研究」時代（何培忠，2006：411）。

在戰後到 1970 年代末這段「中國研究」時代，日本的中國研究歷經了確立到分歧與深化的過程。從 1940 年代中期到 50 年代中期，日本的中國研究機構歷經了重組，出現「中國研究所」、「亞洲政經學會」等組織，讓日本的中國研究在 50 年

¹ 主要是指 1960 年代美式研究方法受到批評時，區域研究做為美式研究方法之一帶來的爭議。

代後有較穩固的學科地位。但由於當時日本受到美國的占領，日本的學界受到美國很深的影響，也讓許多日本學者對美國的中國研究非常重視。這也造成「親華」學者對美國影響進行批判與抵制，在 60 年代發生了「福特基金會」事件。²而 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也對日本的中國研究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有部分的學者表示理解與支持，但也有許多學者進行批判，產生了分歧的現象（何培忠，2006：411-424）。

二、1980 年代以後的發展特點

隨著 1976 年毛澤東過世在中國帶來的反思，以及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展現的全新面貌，日本的中國學研究顯得更多樣化，也讓研究者在資料蒐集上更為方便，對研究方法影響甚大。另外，1970 年代日中兩國間邦交的正常化，也讓雙方學界的交流大幅增加，對於彼此的議題有了更真切的感受。1980 年代中國學發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而這些特點也對研究方法和議題帶來一些改變。

（一）日本國內機構與人員的發展與變化

雖然日本一直都有中國研究的進行，也有許多中國研究的機構，但 1980 年代之後，這些機構在規模上出現了變化，研究人員的結構也出現改變。除了成立時間較長的「現代中國研究會」、「東方學會」、「亞洲政經學會」規模上有所成長，80 年代後也出現許多新的學會組織，如「中國社會文化學會」、「日本日中關係學會」等。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改革開放之後也拿出高額的經費支持中國研究，例如文部省的科學研究補助金，以及對愛知大學、早稻田大學中國研究相關機構的經費支援。除此之外，日本其他政府部門也有加強對中國的研究，而政府外圍的研究機構也紛紛將中國列入重要的研究項目。人員方面，80 年代後日本的中國學研究不再侷限於大學內的研究者，媒體記者、企業界、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等都

² 福特基金會事件是指 1960 年代美國福特基金會以鉅額補助支持特定研究一事，在當時日本的中國學界引起很大的紛爭，也引發學界親西方與反西方的對立。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何培忠，2006：431-444）。隨著不同機構和不同領域研究人員的增加，研究的議題也越發多樣化。80年代後，新成立的機構涵蓋史學、漢學、經濟、政治甚至是媒體研究等方面，舊有研究機構的研究議題也愈趨廣泛。而不同領域的人員更是有各自關心的議題，如企業界的中國研究就集中在經濟、貿易、法規等方面。

（二）日中間資訊與人員的流通

隨著中日邦交的建立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相關的資訊大幅增加。這一方面是中國媒體對社會改革變化的報導增加，另一方面日本媒體也開始進行中國的實地報導。90年代後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資訊的流通程度更大了。人員的流通方面，日本的學者開始有機會到中國進行實地觀察和調查，或到中國擔任客座教授、到駐華使館擔任外務省特別研究員（何培忠，2006：439-445）。這些轉變除了讓日本學者對中國的議題有更多深切的感受，也克服了過去因為資料不足或無法取得帶來的研究限制，有助實證研究、田野調查等的進行。

三、日本的區域研究

戰後初期雖然有很多人在進行中國現代史研究的恢復，但只是剛起步，且在資料的蒐集上也有困難，因此多半只是從中國與蘇聯的研究成果中翻譯與摸索（山根幸夫，2000：1271）。5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當時引進美式區域研究的風潮，日本的中國學也重新定位在「區域研究」的領域之中（何培忠，2006：416）。區域研究的方法在日本學界有支持與批判的兩種聲音。然而隨著1970年代後學界對文革的失望，「革命史觀」的研究方法開始退潮，區域研究的方法逐漸受到重視（邵軒磊，2009：193）。

區域研究者主張以客觀科學態度從事區域研究、比較政治甚至是比較文化（人

類學/民族學)的開展,採取價值中立的方式。不過,區域研究本身也歷經改變。從40年代戰時社會(農村)調查中心,50年代的政策經濟制度中心,60年代的區域研究漸漸朝向比較社會論和民族學的發展,採取去軍事化的立場,議題也從高度政治走向低度政治(邵軒磊,2009:167)。70年代末期,區域研究開始嘗試各種新的研究方法,接納政治學、國際關係、民族主義等其他人文學科的方法論(邵軒磊,2009:206-210)。到了8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開放與日中的交流讓田野調查成為可能,區域研究也因此多了對中國的實地研究。另外,由於中國政治的動盪,研究者也開始關心中國現實政治的新議題,例如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改革等(邵軒磊,2009:217-238)。

貳、近代日本的中國意識

日本在六世紀中期就已經有中國典籍的傳入,其後隨著兩國政治、文藝、宗教的來往,日本知識界形成「漢學」的文化形態,其中的思想原料即來自於中國(曾倚萃,2008:11)。然而當時的學者雖然對中國的典籍或思想進行研究,實際上卻缺乏「中國認識」,對中國的問題並不關心。溝口雄三(1932-2010)(1999:103-104)就曾批判,日本古代對中國的關心,實際上是對「被日本內化的中國」的愛好,是「沒有中國的中國學」。

後來由於明治政府政策的改變,歐美的學術湧入日本,以儒學研究為代表的「漢學」地位日漸衰微,取而代之的是東洋史學流派的崛起。明治政府認為歷史上的中國是偉大且值得學習與研究的,現實的中國卻是落後的(何培忠,2006:404-406)。日本政府在明治維新進行一連串西化與現代化的改革,也形成學界關心的另一個命題:日本如何面對歐洲?如何進入「近代」?

在整個近代化的過程中,由於西方的出現,日本不斷嘗試探尋和西方的關係,

以及自身在亞洲的位置。然而受到歐洲思想影響的日本知識界在反思日本的身分之時，卻始終無法擺脫中國此一「巨大的他者」（石之瑜、黃佳甯，2009：15-16）。日本在進入近代化的過程中為了建立自己的語言，把日本的現代語言與中國漢字區隔，所以發展拼音（李慶，2002：106-110）；福澤諭吉提出「脫亞論」，視中國為落後而必須擺脫的「惡友」（石之瑜、黃佳甯，2009：15-16）。反此種種，都顯示中國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始終是一個參照點。石之瑜（2007：1）就指出，「自黑格爾東方專制主義傳至日本以降，進入近代性的過程無異於就是超越東方的過程，且首須擺脫中國。東方所象徵的停滯、封建、落後由中國背負，一旦日本能予以擺脫，則日本加入近代性、普遍性與進步性的願望，便得以獲致實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日本的思想家極力撇清和這段侵略歷史的關係，被稱為是「轉向」或著「斷裂」。然而，這其實都是這些戰前知識份子為了決定日本在面對西力衝擊時的國家定位，以及建立國家主體性所做出的選擇，並非本質上的轉向或斷裂（石之瑜、李靜旻，2007：24-25）。無論戰前或戰後，日本始終在確認自己的身分，探討自身和亞洲、和世界的關係，並以中國作為參照點。晚近，隨著中國的「崛起」，日本過去對中國的侵略成為一個歷史問題，然而現實中「中國威脅論」卻在日本甚囂塵上。即使在全球化的今日，中國在地理上或文化上都仍是日本無法忽略的他者。因此，觀看「日本學者的中國觀」之時，日本近代以來的中國意識也是重要的背景。

第三節 問題意識

前面提到，1980 年代之後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和日中兩國關係的正常化，研究人員的交流逐漸增加。毛里和子、小島朋之、川井伸一等研究現代中國問題的學者都曾擔任外務省調查員，國分良成、並木賴壽（1948-2009）等也都有在中國大學生活的經歷；天兒便是在 80 年代後擔任駐北京調查員（何培忠，2006：438-439）。天兒的中國經驗對其有很深的影響，其以這段期間的觀察建構出了一套分析架構，強調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中的各種「斷層」的特性，以及這樣特性帶來的影響，也是其日後進行中國研究的分析基礎。然而其意圖並非創造普遍性的理論，而重在理論的動態性，在動態的框架下觀看中國自身的變化所帶來的影響。

中國從過去富饒的天朝上國到清朝末年衰弱的東亞病夫，如今在二十世紀以降的百年之中也仍然瞬息萬變，其中的延續性一直是日本中國研究中追尋的課題。天兒的研究範圍從國共內戰期間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後來的繼任者、從中國革命到改革開放到中國威脅論，總是隨著中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去追尋研究議題，也是一種追尋中國延續性的表現。研究方法上面，在日本的中國研究盛行實證主義、理論建構的年代，天兒也不脫這一潮流。然而在其強調客觀中立的同時，卻使用自身的經歷來建構其理論，其中的關係值得細細檢視。

天兒的經歷與研究課題和其他的日本中國研究者具有相似性，卻又有特別之處。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問題即是，天兒研究的分析架構與議題觀點為何？這樣的架構如何受到其自身經歷影響，又對其探討的議題產生什麼影響？其所使用的概念與對議題的看法，又具有什麼特殊性？

僅以下圖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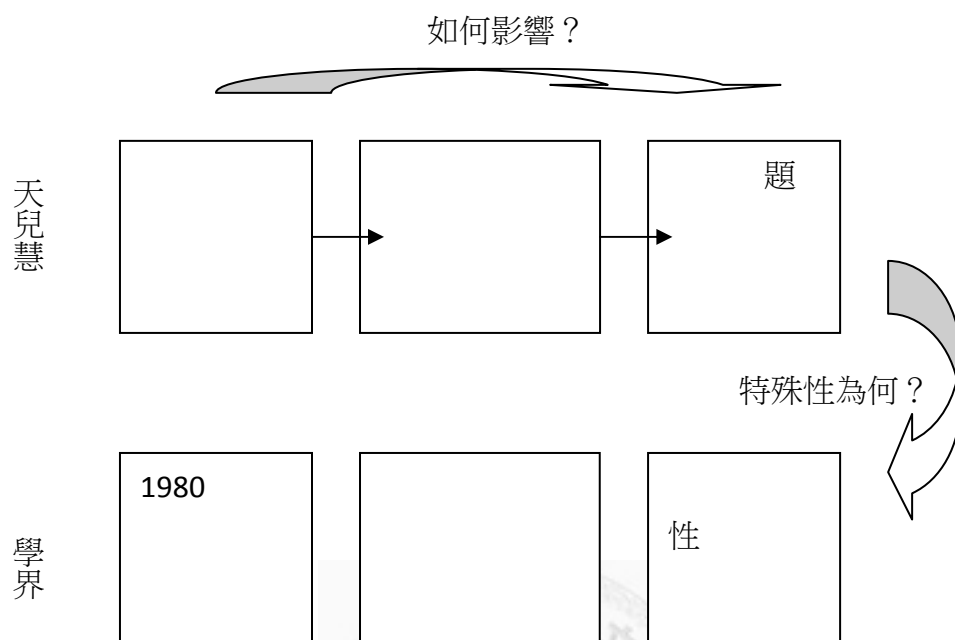


圖 1 問題意識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四節 文獻檢閱

壹、天兒慧簡介

天兒慧（あまこさとし）是 1947 年出生於日本岡山縣的人，大學就讀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1974 年自東京都立大學取得法學碩士學位，1986 年自一橋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天兒長期關心中國議題，大學、碩士與博士的畢業論文題目都與中國相關，其博士期間的論文《中國革命與基層幹部》（中国革命と基層幹部）一反過去只針對領導者作用的中國研究，著重中國政治中基層幹部的角色，是其重要研究基礎。天兒曾於琉球大學任教 8 年的時間，現在則於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擔任教授，並擔任早稻田大學 G-COE 計畫（The Global Center of Excellence Program）代表，³以及現代中國地域研究所所長。⁴

天兒從 1986 年三月到 1988 年二月，擔任日本外務省駐北京的專門調查員。整整兩年的時間，天兒到中國各地進行觀察、訪談、研究，旅行的總路程超過兩萬公里（天兒，1989：45）。其訪問的地區包括廣東、海南、山東、湖南、河南、河北以及邊境的貴州、陝西、黑龍江、甘肅等各省，對象包括高官、工廠長、居民，甚至是火車上偶然遇見的乘客。這段經驗為其中國研究增添了許多實地觀察的基礎，而其研究成果也收錄在《中國改革最前線》（中国改革最前線）、《中國近代化的調查記錄》（中国近代化の調査記録）、《前往中國大陸》（中国大陸をゆく）、《彷徨中的中國》（彷徨する中国）等書中。

天兒著作等身，出版的專書逾二十本，亦編輯許多專書及於他書中寫作專章，發表於期刊上的論文超過百篇。其重要著作包括《中國革命與基層幹部》、《中國

³ 早稻田 G-COE 計畫網址 http://www.waseda-giari.jp/index_j.html

⁴ 早稻田中國地域研究所網址 <http://www.china-waseda.jp/index.html>

改革最前線》、《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⁵《中國是威脅嗎》(編)(中国は脅威か)、《日本人眼裡的中國》⁶等。

貳、前期著作：對實證資料以及實地觀察、訪談的重視

一、中國經驗的影響

除了 1970 年代短暫訪中之外，天兒於 1985 年再度訪問中國，並和許多中國學者有所接觸。由於其在 1986 年起擔任外務省的調查員，因而在北京居住了整整兩年的時間。這段時間，天兒十分密集的到各處實地觀察、訪談，進行了十二次一至兩周的旅行，並和政府、黨的領導者或社會科學相關的學者進行了許多座談與討論。其以搭乘火車的方式代替搭飛機，以求對中國有更多深切的認識與體驗(天兒，1989：35-48)。天兒在中國居住期間的觀察、生活經驗及訪談資料，化為對 80 年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觀察與分析，在初期的著作中大量提及。⁷在後來的研究中，也不時引用過去的經驗。⁸

二、著重實證資料，且重分析甚於預測

天兒(1989：iv)在《徬徨中的中國》一書前言中曾提到，該書的重心並不是放在對未來動向的預測，而在探討現代化的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的特徵。究其早期的幾本著作，也都可以發現這些論述。《中國革命與基層幹部》即完全運用中國的報紙資料，對中國內戰時期中共所指導的解放區「陝甘寧」及「晉冀魯豫」分開觀察。書中分析兩區的政治經濟及地理環境、大眾運動的進行狀況，並著重基層幹部在其中的角色。

⁵ 原作名《中国—溶変する社会主義大國》，1994年由月旦出版社出版中譯本。

⁶ 原作名《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2006年由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中譯本。

⁷ 如《中國改革最前線》、《中國近代化的調查記錄》、《前往中國大陸》、《徬徨中的中國》這幾本書。其中《中國近代化的調查記錄》忠實的紀錄多次訪談重要的對話細節。

⁸ 例如在《日本人眼裡的中國》一書中就曾多次提到。

前面提到天兒曾在 1986-1988 年間在中國各地進行密集的旅行與訪問，當時的觀察與體驗被記錄在和加藤千洋共著的《前往中國大陸》一書中。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結果是當時最關心的項目，該書也一如副標題所揭示的，⁹探討了一些改革開放的成果。不過該書並不是以政策為主體而去進行逐一檢視；而是以地區為單位，先探討此一地區的歷史、地理、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性，甚至是文化或食物等等特徵。對改革開放成果的觀察與評價，則隱藏在許多看似平常的觀察之中，或和當地官員、居民的訪談之中。其訪問的對象也十分廣泛，從高官、工廠長、居民，到火車上偶然遇見的乘客都列入對象之列。這些對話的重要內容，則節錄在《中國近代化的調查紀錄》一書中。

《徬徨中的中國》一書以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為起頭，分析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以及在這之下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結構與人民的意識形態，並對日中關係做簡單探討。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基本上都以其中國經驗為出發點，且均能提出自己當時的感受。例如論述物價上漲等中國 80 年代的社會情況時，就是根據其當時在中國對物價的切身體會為根據。分析對現代化的印象，及日中兩國民族性的差異之時，也是以其在中國居住期間的觀察為基準。

從這些文獻的探討中可得知，天兒早期的中國經驗在其著作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無論是從報紙、實地觀察還是訪談，也都是著重實證資料的研究方法。其試圖建立對中國的完整印象，偏重分析中國本身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基礎結構，少做預測性的分析。

三、中國認識的形成

天兒這些早期的經驗與研究，逐漸形成完整的中國印象與自己的分析架構，

⁹ 副標題為「現代化的真實層面」(近代化の素顔)。

並在《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一書中展現出來。其所提出的架構就是「社會主義、開發中國家」模式以及「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¹⁰前者是指中國在內政、外交政策上都受到社會主義，以及「開發中國家的定位」的影響（雖然實際上的發展可能超越開發中國家）。不過單靠此一結構恐怕不足以說明中國的特殊性，因此又提出另一模式，亦即「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此模式意指系統會受到社會中基層結構的影響，而基層結構又是由社會中許多要素構成。這些要素就是「三大規模與四大斷層」。所謂的三大規模，指的是中國廣大的國土、眾多的人口，與中華意識的強大。四大斷層，則是中國政治地域的價值結構（都市與農村）、政治文化的階層結構（精英份子與民眾）、政治社會的統治結構（統治的制度化與視狀況而定的人際關係）以及政治經濟的意識結構（政治掛帥經濟殿後）上的斷層。這四個斷層是中國社會的要素，是基層結構的內涵，亦是中國「難以改變的特徵」（天兒，1994：44-47）。

這些認識主要是從其中國生活經驗所啟發。在〈文化大革命的質問：在北京研讀的日本文革論〉（文化大革命への問い：北京で読む日本の文革論）中，天兒（1987：126、132）提到，「在中國生活之後，我開始思考兩者（農村跟都市）的差距是否比我以前所想像的更大。」以及「這些（差距和斷層的情況）都是由社會結構上的特質而產生的。雖然只在中國生活了不到一年，但這種感覺卻是越來越強烈。」

這些中國社會結構上的特徵，可以說是其初期的中國認識，在其往後的著作中也時時可見。¹¹其中國認識的形成乃根據自身經驗而起，並對中國的多樣性十分重視。天兒在《中國改革最前線》（1988：4、9-10）一書中就曾經提到，從中國回

¹⁰ 不過，後者的必要性在之前的著作《徬徨中的中國》第三章中就曾經提出。詳細見本文第二章和第五章的說明。

¹¹ 例如在1997年出版的《中國的21世紀》（中国の21世紀）中討論中國現代化進程時，仍強調三大規模與四大斷層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

到日本後，每當被人問起「對中國的印象如何」，都讓其覺得難一言以蔽之。如果要說中國最大的特徵是什麼，那就是「多樣性」－多樣性的民族、地域、社會結構、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等等。其在《前往中國大陸》中也提到，中國的真實面貌是多樣化的，不同的地區、不同的人民都有很大的差異。大部分的人對中國的觀感都是單一的面相，雖然確實也是真實的一部分，但還是有很多忽略掉的地方。天兒認識「真實的中國」的方式，就是從中國地域發展、文化階層與政治結構等的多樣性切入，試圖描繪完整的中國形象（天兒，1990a：240-244）。

下圖說明天兒在分析中國時的研究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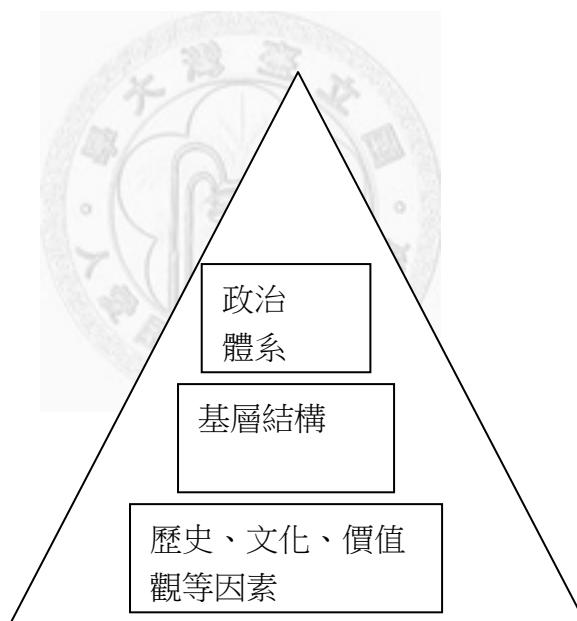


圖 2 天兒慧的中國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參、近期著作：對中國現狀的關心與對日本的再檢視

一、對基層結構的重視

前段提到，天兒在《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中提出「社會主義、開

發中國家」模式以及「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這兩個架構。這兩個概念雖然被天兒定位為方法論，但更適切的說，是其根據過去的文獻與自身經驗，提出在觀察中國之時，所應重視的兩個面向。其在書中也提到，這些斷層性事實上已有了改變，是「結構性變動的開始」(天兒，1994：47)。在2006年出版的《中國、亞洲、日本》(中国・アジア・日本)中，其也提到「中國已不再強調自己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是第三世界的一員」(天兒，2006b：162)。天兒真正重視的並不是此一理論架構，而是隱含在背後的概念，亦即結構對體系的影響。無論在其提出方法論的《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一書，還是之後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出其對基層結構的重視(基層結構又由結構因素構成)，遠勝過理論與模式的建構。其對中國的關心，正是隨著這些因素的變動而有所變化。

二、對中國現狀的關心

天兒(2009：148-149)在《日本再生的戰略》(日本再生の戰略)一書中提到，現在(日本的)中國研究者，往往太過專注於特定議題，對「整體中國」的形象缺乏認識。這經常也是由於研究者一味引用歐美的普遍性理論，不對理論本身加以質疑所致。天兒自身也學習歐美的社會科學理論，但還是認為，在做區域研究之時更應注意該區域特有的歷史、文化、宗教的價值觀與規範、當地人的生活 and 思考方式等等。這樣的理念也可以從天兒的研究成果中應證；其研究主要聚焦於中國的現勢議題，著重從歷史、文化或民族性等角度去解讀，間或建構自己的分析架構，對普遍理論則較少使用。以下將以此角度簡述其研究的重心：

(一) 中國的內政

事實上，這是天兒從早期就一直延續下來的研究議題。天兒從1980年代起就持續關心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鄧小平下台後也密切注意此一事件對中國產生的影響。《鄧小平—邁向富強中國的摸索》(鄧小平—「富強中国」への摸索)一書

詳細介紹鄧小平時期的內政、外交政策。《歷史上的鄧小平時代》（歴史としての鄧小平時代）則探討鄧小平時期的改革開放政策，對中國國內政治與社會結構的影響。在《現代中國》（現代中国）、《巨龍的變動－毛澤東與鄧小平》（巨龍の胎動－毛沢東 vs 鄧小平）中，則都有對「後鄧小平時期」的探討。

值得注意的是天兒在進行相關論述時，對歷史、文化等基層結構的重視。對於毛澤東或鄧小平的領導模式，天兒（2004：50-52）強調「歷史的連續性」，在《巨龍的變動－毛澤東與鄧小平》將毛鄧兩人的獨裁表現比喻為「皇帝與半皇帝」。其中毛澤東的表現尤其如此，天兒（2000：17-28）在《現代中國的結構變動1》（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1）¹²中，詳細分析毛澤東體制和過去歷史上連續與不連續的部分。而改革開放政策對中國帶來什麼影響？在《現代中國的結構變動4》中，天兒（2000：7）從中國廣大的土地與人口，以及長期以來「人治」的制度特徵，論述政治制度化的困難性。天兒在探討中國內政及其影響之時，不時會以中國歷史上的經驗類比，或點出從歷史上遺留的特徵。其對基層結構因素的重視，可見一斑。

（二）中國的對外關係：中國威脅論與日中關係

除了中國的內政之外，天兒對中國的對外關係也十分重視，尤其是中國的世界觀，以及中國對自身在世界中地位的認識。在《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一書中，就有一章探討此一議題。而隨著中國的經濟成長與軍事能力的增強，「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在日本也引起廣泛討論。

天兒（2006a：155；2006b:22）在《中國、亞洲、日本》、《中國是威脅嗎》（編）、《發展中中國的對外關係》（膨張する中国の対外関係）等書中都提到，中國從經

¹² 毛里和子主編的系列叢書。

濟、軍事等客觀角度來說，確實是一個崛起中的國家。只是在中國經濟、軍事膨脹的同時，也不能忽略中國本身的變化。一方面中國內部還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中國也沒有明顯對外侵略的意圖。現在的中國已經意識到自己是一大國，比過去更有自信。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就是一個威脅。有自信的中國反而是變的更理性、更從容了。

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原本在東亞占據領導地位的大國—日本，也漸漸感受到壓力。加上過去歷史問題的障礙，日中兩國關係始終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日本人眼裡的中國》就是一本天兒以自身經驗探討日中兩國相處問題的著作，提出了一些對中國和日本民族在情感表現與時間和空間上的差異，認為這樣的差異是造成日中關係不穩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天兒（1997b：7；2010：47-52）在論述中國對外意圖與關係時，也會追述到歷史層面或日中兩國結構上的差異。雖然國際上對中國是「好戰國家」的印象深刻，但中國在傳統文化意識上重視道德權威主義秩序的「王道主義」也是值得注意的。探討中國所認為的「國際秩序」時，應該要從傳統的中華秩序中去觀察；對於中國部分被認為是有侵略性的言論，也應該要認知到這是出自於中國無意識間的「權威主義」或「華夷」思想。在日中兩國的關係上，天兒（1989：136-152；2006a：81-82）也強調兩國「互相誤解」所造成的問題。日中兩國在人種、語言、生活習慣等方面看似相近，但實際上卻截然不同，這就是兩國「自以為互相了解」的「相互理解陷阱」，是在探討兩國問題時不可忽視的層面。

從以上兩個天兒主要研究課題的探討中可得知，其在分析中國現代議題之時，著重的並非理論層次的探討，而是這些議題結構上的特徵。過去天兒以中國基層結構的特色建構出了中國的基本形象，這樣的中國認識持續影響著對其他中

國對內政策或對外關係的看法。

三、重新檢視日本的定位

面對中國的發展，天兒（2009：243-250）也對日本提出一些建議。《日本再生的戰略》就是這樣的一本著作，書中詳細分析了日本國家與社會的各種問題與解決之道。其在書末也自承，身為當代中國的研究者，也曾經懷疑過為何要撰寫這樣的書籍。然而一旦發現到現代日本所面臨的種種危機，就讓其有身為學者的使命感。天兒對中國的關心，是順著當代種種引人注目的議題而起。由於其長期對社會現勢的關心，或許在面對自身所處的日本之時，也有不得不重新檢視的使命感。



第五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為質性研究，採以下兩種具體研究方法：

壹、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一種蒐集資料的方法，強調文件的蒐集、整理、歸納、分類與分析，可對研究主題有客觀理解。本論文將分析整理國內外日本中國學研究的相關專書、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以及天兒慧的文章、著作，並進行解讀。

貳、深度訪談法

99年11月時作者曾於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和天兒慧就其學思歷程與其現今對中國/中國研究的看法進行過一次深度訪談。訪談過程以錄音記錄，內容也已整理成逐字稿並經天兒本人確認。

第六節 章節安排

在章節安排上，第一章為緒論，以本研究計畫之摘要為主要內容，說明研究動機、研究背景、研究方法、文獻分析等。第二章介紹天兒慧在分析中國時使用的架構，亦即「基層結構」的內涵，並分析此一架構如何受到其中國經驗的影響。第三章介紹天兒慧的中國論述，包括其對於中國政權的變動、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對外關係與中國威脅論的理解為何，以及「基層結構」在進行這些論述時帶來什麼影響。第四章則針對日中關係做探討，包括天兒對日中關係不同階段的剖析，以及影響日中關係的基層結構因素。第五章探討天兒慧的研究概念、成果，以及在日本知識社群中的位置，包括中國「斷層」、「崩潰」概念的比較，「延續」概念的意義。第六章則為結論。



第二章 斷層社會與基層結構： 天兒慧研究概念核心

「基層結構」是天兒研究中國時主要使用的架構。本章即針對基層結構做概念的介紹與分析，其中包括結構中的不同因素；最後並論述天兒中國經驗對建構基層結構時的影響。透過此章的整理，期望能為「基層結構」提出一有系統的脈絡，以及「基層結構」與天兒學思歷程的關係。

第一節 基層結構概念

根據天兒（1994：42-43）的定義，「基層結構」是一種存在於社會基層的、地域性的結構特徵，由自然、地理、生態、文化、歷史等要素，經過長時間的相互作用所組成。這樣的結構特徵可以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現象，形成該地區的特質。至於「基層結構」的作用為何？觀察一個社會的系統，以及系統的變化之時，基層結構就是需要考慮的對象。舉例來說，如果要研究中國的指導系統，不能只觀察共產黨組織的形態、制度或數量，也不能只分析黨與國家與其他組織的制度性關係。必須要先從定義上假定這樣的系統有某些政治社會的基層結構，再根據經驗去證實。

基層結構與社會系統間的連帶關係，天兒稱為「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

¹³不過事實上，天兒對於「結構」的強調與探討，遠超過對「系統」的探討。中國的基層結構由許多因素所組成，天兒方法論所關心的重點就在於這些結構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對結構本身的影響。雖然天兒也曾略將社會系統作幾個分類，¹⁴

¹³ 「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一開始出現在《徬徨中的中國》第三章，後來在《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也有提到。這之後天兒的中國現狀分析，雖然不一定使用這樣的名詞，但主要仍關注中國的結構層面。

¹⁴ 天兒（1994：42-43）對系統之定義：系統是一種有機體，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

但並不是嚴格的依照這些分類、從特定的系統去檢視其結構。系統不是形態上的架構與制度，而是實質上進行機能運作的有機體（1994：42-43）；天兒關心的是「系統」這個有機體中的真實事件的規則與連續性，而非將真實事件歸納進系統來做分析。換句話說，天兒並非把「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視做一種理論，可以套用在真實事件上去做解釋；基層結構和系統都是一個不斷在改變的概念，是真實國家社會的結構。每個國家的基層結構都有自己的特徵，構成了該國獨一無二的系統。中國的基層結構特徵如何影響政治系統中的真實事件，就是天兒中國研究的研究重心。

雖然天兒僅在分析中國政治社會之時使用「基層結構」一詞，但觀察天兒分析中國對外政策時使用的概念，也可看出其中蘊含基層架構的概念。天兒整理中國外交政策時，特別注意三點：中國領導單位的客體認知（對世界的認識）、主體認知（中國自身在國際社會中應有的地位與角色的認知）與結合前兩者的戰略思考（1994：183）。分析日中關係之時，也經常從日中兩國文化或民族的差異著手。¹⁵若依照天兒對基層結構的定義，這樣的文化與價值觀因素也都是基層結構的一部份，因此本研究也將這些因素列為基層結構的一部份。

中國基層結構的特徵，天兒認為可以簡單分為「三項大規模性」與「四種斷層性社會」。三大規模包括「廣大的國土」、「眾多的人口」，以及文化層面的「中華意識」；四大斷層則包括「都市與農村的斷層」、「精英份子與民眾的斷層」、「統治的制度化與視狀況而定的人際關係的差異」，以及「政治掛帥經濟殿後」這四個結構上的斷層（1994：44-47）。這些都是中國「結構上難以改變的特徵」，影響著包括現代化在內的各種政策的進行。

具有特殊意義的層面中，複數的行為者根據某些規則和連續性而採取的行動，包括指導系統、市場系統和教育系統等等。

¹⁵《日本人眼裡的中國》就是一本主要從日中民族性差異探討日中關係的著作。

基層結構的重要性主要在於能夠將中國自身的特性，和其他客觀條件相似的国家區分開來。中國雖然被定位為社會主義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但若只是把社會主義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的特性套用在中國之上，將會忽略掉許多特質。越南、北韓、古巴或保加利亞等國也都同時具有社會主義與開發中國家的特性，但在政治社會的各種層面上卻和中國有很大的差異（1994：40）。就像日本雖然也是採取資本主義的國家，但由於終身雇用制與強調公司忠誠的特質，也讓日本不同於其他採取資本主義的國家（1989：74）。因此，社會主義國家或開發中國家這樣的特性，都應該理解為中國的結構特徵之一，亦即基層結構的一部分，和其它基層結構的因素交互作用。然而，這些中國基層結構特徵的內涵為何？將是下節探討的重心。



第二節 中國基層結構與結構因素

天兒所提出的中國基層結構因素多而龐雜，同個事件往往受好幾個不同的因素影響。如同上節所提到的，天兒認為中國結構的特徵是「三項大規模性」與「四種斷層性社會」，這主要是基層結構中社會層面的因素，也是其分析中國政治社會時最關心的重點（天兒，1994：44）。然而，天兒在分析日中關係、中國對外關係等議題時，也不時會借重社會以外的因素。以下將探討基層結構中最主要的幾個因素：社會因素、文化因素、歷史與制度因素。

壹、社會因素—多樣與斷層的社會

天兒對中國社會的第一印象就是「廣大」。無論道路還是建築物，即使在交通運輸現代化的今日，還是難以改變廣大的印象。但若提到中國社會的特色，最大的特徵就是中國的「多樣性」。中國社會無論在民族、地理環境、社會構造、生活方式或價值觀上都有很大的歧異性。除了占最大多數的漢民族之外，中國還有蒙古、回、維吾爾、苗、朝鮮族等 50 多個少數民族。氣候在不同的區域也有極大的差異，無論是南北的溫差、內陸與沿海的雨量差都讓不同地區的居民生活與產業結構截然不同。除了客觀條件上的差異，不同地區也有不同的風俗，例如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南北兩地就有完全不同的差別。另外，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政策，由於幅員遼闊加上地區條件不同，其中不乏極大的差異（天兒，1988：2-14）。這些多樣性造成中國社會「重斷層」的特性，都市與農村、精英份子與民眾、統治的制度化與視狀況而定的人際關係，以及政治掛帥經濟殿後政策之間，都有很大的斷層。以下將以這四種斷層為主，探討基層結構中的社會因素。

一、四種斷層

（一）都市與農村的斷層

中國擁有巨大的農村社會，¹⁶且農民在眾多歷史與政治事件上都扮演重要的角色。歷史上不乏農民發起的叛亂，毛澤東也曾說「中國革命就是農民革命」。相對於這樣的農村，都市具有截然不同的特性。由於中國的農村也存在商業活動，有部分學者認為農村和都市的差距很小。¹⁷然而天兒在實際走訪了中國的農村之後，發現這些具有經濟功能的「市鎮」是所謂的「市場都市」，並不能稱為都市。以防衛、行政為機能的政治都市，都為官員、政治家、高級軍人、有錢的地主、大商人……等所支配，和市場都市截然不同，和農村之間也存在極大的差異（天兒，1994：84）。

天兒探討的「都市」，是由政治或行政必要性所形成的人為中心，也就是「城」。城是圍有城牆、設有衙門的政治都市，以及一些在計畫性的近代化下新創立的都市，如上海、青島、哈爾濱、大連等殖民都市，大慶、玉門等新興工業都市，以及深圳、汕頭等經濟特區的對外開放都市（天兒，1994，83-84）。這些城市被天兒通稱為「都市」，和「農村」有很大的差異。天兒接受菱田雅晴（1989：126-133）對中國都市與農村「二元性社會結構」的論點，認為中國的都市與農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揭示「消滅三大差別」的革命理念，其中之一即為都市和農村的差別。就結果而論，這樣的差別並沒有被消滅；只是再次證明了這個差別的嚴重性。而在 89 年的天安門事件中，民主化的訴求停留在都市而未擴展到農村，也說明了兩者在價值觀上的差別（天兒，1994，85）。這些理論和例證，都說明了中國都市和農村的斷層性情形，也是中國社會的第一個特色。

¹⁶ 天兒（1994：82）在書中提到，中國的都市人口在 1949 年占 10.6%，1982 年占 20.8%，成長緩慢。不過根據中國國際都市化發展策略研究委員會的調查，中國的都市化程度在 2008 年底時已達到 45.7%。

¹⁷ 天兒（1994：83）就曾經引述 Olga Lang 對中國商業都市的描述：「中國農村與都會的界線很難劃分清楚……（城鎮或區）的居民仍以農人、工匠為主……街頭飄浮著農村的氣氛。」

（二）精英份子與民眾的斷層

中國在「官本位」制度下，官員和人民不僅在合法的物質待遇上有所差異，官員接收不法利益的情事時有所聞。這些客觀條件上的差異，造成了官員和人民的疏離感，一般民眾無法體會到官員為了地方發展所做的努力。另外，隨著中央的政治動盪，人民對領導階層也逐漸產生不信任的情緒。例如在 1971 年林彪的事件之後，許多農村的人民產生了對幹部的不信任感，認為上位者反覆無常、難以取信。不僅如此，官員也經常以在上位者的態度自居，讓人難以感受到共產黨「平等主義」的思想。天兒就以自己曾到中國訪問的經驗為例，中方對於日方訪中團的領導者與一般團員，接待方式大相逕庭；而幹部與員警在驅散民眾時的態度也相當蠻橫（天兒，1994，85-87）。官員在物質上和民眾的差異，以及態度上展現出的優越感，都拉遠了和民眾的距離。

傳統上，精英份子通常指的是知識份子，然而大部份的官僚，又都是由知識份子所組成的。除了官僚和民眾的差距，知識份子和普通老百姓之間也有距離。縱使中國大部分的官職並非世襲，但科舉時代時考試的難度相當高，沒有一定的時間和財力是無法參加的。今日，教育仍是區分精英與普通老百姓的一個方式。天兒並不否認精英份子和民眾間有互相合作、尊重的例子，但兩者在結構條件上的差異，終究造成了彼此的斷層，也構成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另一個特徵（天兒，1994，87-88）。

（三）統治的制度化與視狀況而定的人際關係的斷層

前面的兩個斷層，一個是不同行政區域的差異，一個是不同階級間的差異，都是實際存在的兩個群體上的差別。此段的第三個斷層，指的是中國社會中兩種截然不同的處世哲學。統治階級的運作有體系且制度化，中國的整體社會卻是一個講究「關係」的社會，充滿非制度化的特性。

中國統治階級的運作是高度制度化的，對「接待」一事也很講究。中國地多人廣，中國的官僚體制歷經數千年的演變，到清末已十分成熟，也對今日的官僚制度有所影響。雖然官僚的運作在效率上或許不盡如人意，但在組織行動之上卻很有系統。相對於這樣體系化的統治以及制度化的統治行動，中國社會中的各種行動，基本上都是非制度性的。天兒認為，中國這樣的「關係」社會，主要是肇因於中國強調「人治」的傳統。「法」對中國人來說是一種統治工具、懲罰手段，而不像西方社會中是一種對抗國家、保護個人權利的武器，讓人民難以養成「守法」的觀念。除此之外，皇帝這種絕對權力制度的存在，也代表對超越「法」的權力的容許。今日中央雖然擁有高度制度化的系統，但農村等地卻依然保有「人治」的色彩，靠「關係」行事，也就形成兩種不同處世方式的斷層（天兒，1994，89-92）。

（四）政治掛帥與經濟殿後的斷層

在一般人的理解之中，經濟的變化往往對政治的動向有很大的影響。馬克思主義也主張「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結構」，強調經濟對政治的影響。然而在中國，無論政治如何動盪，經濟的情況卻很少隨之起伏，且長期處於停滯。中國政治和經濟有「自我完結」的特性，彼此互相獨立。政治方面，儒家的政治觀強調「禮制」的統治與「德」、「忠」的精神修養，不在乎生計等經濟價值。過去的士大夫到現代的知識份子，其理想從「治國、平天下」到「革命、救國」，都不脫「政治掛帥」的意識，不關心經濟的發展。經濟方面，中國自古以來都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的過程各自獨立，也只有初步的社會分工。中國傳統輕視「商人」此一職業，工商業並不發達，人、物、資金也極少流動。中國的有產階級主要是增加土地、成為「地主」，而非使用自己的財產經營商業或投資生產新產品（天兒，1994，92-94）。傳統上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彼此互相獨立，今日中國政治和經濟的關係雖

變得較為緊密，但還是常有「政治優先主義」、「政冷經熱」、「政治緊縮經濟開放」的情形，說明了中國政治和經濟的斷層依然存在，也是中國社會的第四個特徵。

二、「社會因素」概念的基礎與演變

天兒對中國社會的理解主要是從結構面著眼，其自承這樣的概念是受到部分日本或國外的學者啟發（天兒，1994：79-82）。雖然探討的重心不一，但從這些學者的著作中，確實可以看出他們對於中國社會結構類似的理解。

華裔的美國學者孫隆基就曾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探討中國社會的特徵。和天兒不同的是，孫隆基所謂的「深層結構」，是相對於「表層結構」的中國社會特徵，代表的是中國社會中相對穩定的部分，強調的是中國的特色而非其造成的影響。對天兒來說，「基層結構」則是影響中國政治社會的重要因子，採取的是結構主義的方法，強調結構對現象的影響。¹⁸另一方面，孫隆基對於中國社會的探討主要著重文化部分，包括中國人的人格、世界觀等；中國人對國家與社會的看法，僅是其對整體中國文化理解的一部分。然而天兒探討的重心，則主要集中在政治社會這個部分。因此，不論是在「結構」此一概念的運用上，或探討的重心上，兩者都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孫隆基對於中國政治社會這個部分特徵的描述，以及表裡反差的強調，還是給予天兒許多啟發。

孫隆基（2004：299-361）認為，中國的政治社會有幾個特徵：中國式專制主義、大一統的傾向、小國寡民的傾向、平均主義與特殊化的傾向。其中「大一統」是針對國家而言，強調地方和中央一制的、一元化的統治特色。與此相對的，中國庶民社會卻呈現「小國寡民」的特色，各自為政、「老死不相往來」。平均主義和特殊化也是另一個相對的概念，雖然在上位者的政策經常強調平均、平等，實

¹⁸ 孫隆基（2004：1-5）在原版序中曾表示其依照「結構主義」的邏輯寫作，但卻於修訂版序時修正表示「本書的結構主義只是一種比喻。」

際上卻充滿了特權；不平等的概念更可以追溯至周朝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做為其中國整體文化分析的一部分，孫隆基並未在這個部分多做著墨。天兒的「斷層社會」則是進一步將這種反差的概念再深入探討，並將其提升到影響中國政治體系的結構層次。

除了中國國家社會的表裡反差，其他學者也曾經提到「中國社會具有難以改變的部分」這個特徵。社會學者 Olga Lang（1946: 7）在論述過去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之時，就提到「中國社會結構的弱點會一直存在，且引發新問題。」中國學者金觀濤、劉青峰（2000：32）則形容中國儒學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和道德價值一元的思想形成一種「超穩定結構」，讓中國的政治文化從漢朝至今的兩千多年以來，都保持高度的穩定性與連續性。日本學者村松裕次（1949：8-9）也提到，和不斷變動的政治情勢相比，中國的經濟層面顯得相對靜態。不過雖然這幾位學者都提到中國社會有某個難以改變的部分，但無論是論述重心還是論述的方式，彼此都很大的差異。Lang 從社會學的觀點探討中國國家和社會過去和現在的差別，金觀濤和劉青峰採用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探討政治社會的文化，村松則著重經濟的層次。天兒自承受到這些學者影響，也可看出其「斷層社會」目的雖集中在探討中國的政治社會，實際上卻是受到不同概念影響而建構的。

天兒在 1989 年《徬徨中的中國》中首次提到「基層結構」的概念，作為中國現代化政策之中「穩定而難以改變的特徵」來探討。到了 1992 年《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一書後，「基層結構」的概念更為完整，也被提升到方法論的位置。基層結構不只可以用來觀察中國自身，也是區別中國和其他國家不同的方式（天兒，1994：42-47）。至今，天兒仍認為這是觀察中國之時重要的概念。¹⁹

¹⁹ 天兒在訪談之中也花了很多時間講述其對中國社會斷層情形的見解，參見訪談紀錄。

貳、文化因素－中國的文化與民族性

中國和日本地理位置接近、人民外表上相似，但兩國的文化與民族性，卻有很大的差異。這樣的文化差異，不僅影響各自的政策，也帶來兩國的衝突。文化與民族性造成的文化因素，雖然並未被天兒系統化的歸在「基層結構」的一部分，然而卻經常用來分析兩國政策的差異以及造成衝突的原因。此一概念因素的使用，和分析政治事件時使用的社會因素分析是相似的，都是探討中國政治社會時的結構特性；因此本論文亦將文化因素做為基層結構因素中的其中一種。

日本人和中國人外表相似，日本人到中國或中國人到日本，都常常會被誤為當地人。日文也是從中文演變而來，漢字的部分有許多相似之處。然而，中國和日本的民族性是完全不同的，許多相同的字也有不同的意思²⁰。日中這種似是而非的文化，正是兩國衝突的深層原因。因為相似，反而不願去了解，造成了更深的誤解（天兒，2006：81-83）。

一、中國人的特徵

天兒整理各國學者對中國民族的分析，加上自己的觀察，認為中國人的特徵主要有三個：互不信任的人際關係、恥感文化與自我中心的人生觀（天兒，2006：83-87）。互不信任的人際關係方面，和日本相比，中國社會中人們存在強烈的不信任感，天兒認為這主要是起源於中國人對法律與制度的忽視所至，造成人們之間缺乏互信的因素。其次是恥感文化，天兒引用 Max Weber（1971: 378,386）的說法，稱儒教文化是「沒有神的旨意的文化」，是「外面風度的倫理」。天兒認為中國人重視「對外倫理」勝過「對內倫理」，是「愛好面子」的民族。事實上，「恥感文化」一向被認為是日本民族的特徵。潘乃德（Ruth Benedict）（2007:202-207）分析

²⁰ 例如日文漢字中「走」（走る）的意思。「走る」的「走」寫法和中文一樣，但卻是「奔跑」而非中文「走」的意思。

日本民族的著名著作《菊花與劍》中，也提到日本人的謹慎與慎重；日本人將知恥辱視為德性之本，每個人都十分注重自身行為在群眾中的評價。天兒也有意識到這點，認為日本同樣受到儒教文化影響，並引述孔健（1992：80）對日本恥感文化的描述：「知恥成為他們（日本人）生命力的泉源，在生活當中，『恥』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天兒認為外界對於日本恥感文化的印象，在現代日本中是值得重新檢視的：「現在的日本人真得如此意識到『恥』？這令人懷疑。（天兒，2006：84）」天兒將恥感文化作為中國人的特徵之一，並認為日本人的「恥感文化」具有爭議之處。

中國人的第三個特徵是「極端以自己為中心」的人生觀，和日本人「極端依存他人型」的人生觀成為對比。天兒引述園田茂人與千石保的觀察，認為中國人已經拋棄了過去革命教育中為他人犧牲奉獻的人生觀，著重現世的利益，以自我為中心（園田，2001：61；千石、丁謙，1992：36、39）。雖然中國人並不是沒有借助他人力量之時，其關係的建立仍主要出於利益。與此相對，日本人有「聽任主義」的傾向，其主要的原則則出自於日本人對他人的信任。日本人比較遵守規矩，也造成容易信任與依賴他人的特性，和中國人截然不同（天兒，2006：85-87）。

二、中日民族特徵的差異

（一）時間與空間認識的差異

時間認識方面，日本人雖然不是急性子，對時間卻神經質般的分秒必爭，很注意交通工具、活動等的開始與結束時間。相較之下中國人做事總是「慢慢地」，飛機、火車誤點的情事所在多有，一般民眾普遍沒有時間觀念。空間認識方面，日本人對空間的概念是強調「同質與區分」，中國人的概念則是「異質與混合」。舉例而言，日本料理會將魚、肉、蔬菜等不同味道的食物分開盛裝，中國料理的特徵卻是把全部食材混和烹調。日本傳統家用建築會把不同部分使用的建材先做

區分，中國則一律使用磚頭組合、建造。這也反映在日本對待殖民地的角度上。和歐美當時對待殖民地的態度相比，日本尋求將亞洲殖民地「同質化」，因此也會有破壞中國、朝鮮人民自尊心與生活習慣的做法。而「區分化」的視角結合日本自視為「盟主」的心態，又讓日本對亞洲其他國家的人民產生差別意識。中國人「異質與混合」的特性，則體現在一向為中國中心思想的「中華思想」，以及晚近的「一國兩制」制度（天兒，1989：144-147）。

（二）情感表達方式的差異

除了中國人本身的特徵之外，兩國人民在情感表達上主要也可分為三種差異：「粗略與細膩」、「不協調與順從」、「激動與穩重」。雖然中國人和日本人之中也是存在著各式各樣的人，但前者基本是中國人表現情感的方式，後者則是日本人的。「粗略與細膩」方面，中國人說話行事粗枝大葉，把「差不多」掛在嘴邊。日本人做事則講究細膩，被問路的時候，如果自己知道就會十分詳盡的告知，不會只說個大概的方向。其次在「不協調與順從」上，中國人有強烈表現自我的慾望，和抑制自我的日本人不同。中國人喜歡自我誇耀，且不喜歡道歉，和喜歡把「對不起」掛在嘴邊的日本人相反。日本人認為，只要能解決問題，道歉也無所謂；但中國人因為自尊心高，害怕道歉會被人抓住把柄。以 2002 年的「瀋陽領事館」事件為例，²¹日本越是強硬的要求中國道歉，中國就決不會屈從。值得注意的是，在歷史問題上日本一向被當作是「不道歉」的一方；這也是中日兩國情感表達方式差異所致。即使日本人已經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歉意，中國人卻無法體會，而感到不滿。最後，在「激動與穩重」方面，中國人的情緒表達直接，無論是正式的談判場合或日常生活中的買東西討價還價，都居主導地位。日本人相較下則較穩重、被動，但也造成容易緊張的性格，和中國對「威脅」的認知不一。例如 1996 年因為台海危機造成的中美對抗，引來日本國內的高度緊張，其緊張程

²¹ 2002 年，五名身分不明的流亡者逃入日本駐瀋陽的領事館，被中國武警強行闖入帶出。

度更甚於其他當事國（天兒，2006：87-93）。

參、歷史制度因素－傳統中國政治體制

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也對現代中國有一些影響。和社會與文化因素相比，此一因素較少被提到，且主要侷限於現代中國政治體制的解釋。和文化因素一樣，歷史因素也並未被正式作為「基層結構」來討論，但仍是影響中國政治系統的因素之一。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傳統體制，主要又有領導階層的「皇帝制」的影響，以及傳統官僚制帶來的影響。雖然中共一度以打倒傳統文化為目標，但其領導人的行事方式與政治制度的設計，卻仍受到過去的政治制度影響。

一、皇帝與王朝

中國帝制時代由皇帝獨攬大權，民國後雖廢除帝制，毛澤東的出現及其繼任者鄧小平，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擁有皇帝般的權威。毛鄧都是魅力型（charisma）的領袖，但其權力巔峰時聲望與權勢都遠超於西方所謂的「魅力型領袖」，接近於中國傳統的「皇帝」，建立各自的「毛澤東王朝」與「鄧小平王朝」。例如文革時期群眾對毛澤東激進盲目的崇拜、跳「忠字舞」，甚至敬愛「毛主席」更超過自己的父母，都是傳統上對皇帝崇敬的表現（天兒，2000：21-22）。鄧小平雖然採取改革開放的政策，但領導風格卻也有「皇帝化」的傾向。例如在 89 年的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就捨棄了反對戒嚴的趙紫陽，轉而拔擢江澤民，人事任用全憑己意的作風近似毛澤東。其他像 92 年的南方都市視察、「南巡講話」等，都流露出毛澤東般的氣息－也就是「皇帝氣息」。不過天兒認為，比起毛澤東，鄧小平較願意接納他人的意見，算是「半皇帝」（天兒，2004：52-54）。

二、階層制官僚

中國的國家體制定形於唐代，從皇帝、中央權力機關、行政部門、地方官員呈現金字塔形的階層體制。官僚機構在中央有「六部」，官吏分為九個等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也有相似的特徵；國務院相當於過去的中央行政機構，中央的部會仿造「六部」建立，幹部的八級制也和九品中正制類似。地方幹部的人事都由黨中央掌控，和過去由皇帝掌控全國的情勢類似。中共初期是「省—縣（市）—鄉（區）」的層級制，也和傳統「省—府（州）—縣」的三級制相似（天兒，2000：17-22）。天兒的論述並非沒有爭議之處，中共中央的部會除了類似六部的外交部、商業部、國防部之外，還多了符合現代國家需求的十幾個部門。六部可說是國家行政機構的基本，現代國家大致上也都有這些部會。而地方幹部的設置，也受制於行政區的畫分，未必和過去的制度有所關聯。不過，中國官僚制度行之有年，到晚期已經十分成熟，對中共的官僚制度有影響也是自然之事。

三、王道主義

除了傳統政治體制，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也具有一些影響力，尤其在對外政策方面。中國過去為「中華帝國」，幾個世紀中都保有強盛的國力，加上中國本身的文化，培養出其重視道德權威主義秩序的「王道主義」的思想。例如近年中國經濟與軍事力量成長，中國反覆表示「中國軍事力是防衛性」、「不會把核武用在先制攻擊」、「反對霸權主義國家」，就是「王道思想」的表現。然而這卻難以消除他國的憂慮，仍將中國視為「威脅」，忽略了中國本身的政治文化（天兒，1997：7-8）。

肆、結構的變動？

基層結構是中國「難以改變的特徵」，但並非「永遠不變的特徵」。從提出「基層結構」概念開始，天兒就不否認結構變動的可能性，並將變動的可能寄望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天兒，1989：80-81）。不過時至今日，改革開放政策已實行 20 餘年，天兒在訪談中仍認為中國具有一些難以改變的特徵，尤其在社會層面。國

內政策的改變，有些能夠帶動結構的改變；但有些卻因為結構的無法改變，而帶來矛盾與衝突。國際地位的變化，雖然改變了中國的外交政策，但卻無法改變中國本身的社會、文化或歷史結構。

一、國內政策與結構的變化：中國的「變動期」

從鄧小平統治的後期，到鄧小平過世後的「後鄧」時期，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情形，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都面臨了很大的改變。這些改變所造成的衝擊，引來中國在 20 世紀末期與 21 世紀時的社會動盪，天兒稱其為「變動期」(移行期)。

改革開放政策首先帶來經濟的變化，都市的外觀有了很大的變化；大都市開始建造高樓大廈，汽車逐漸取代腳踏車。除此之外，人民也變得更加活潑，開始注重穿著打扮，和 70 年代時人人穿著灰暗的衣服、面無表情的情況完全不同(天兒，1989：44-46)。然而，改革開放政策也解放了人民的物質欲望，甚至表現出極端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情形，也造成了官員的貪腐。基層結構社會因素中的「斷層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由於地方本身資源的差異，加上「先富」政策的實行，區域的發展差距加大，社會中的各種差距更為加大(天兒，1998：84-87，185-188)。

財政制度的改革讓地方的權力變大，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結構關係。不過這也讓中央越來越難控制地方，地方統治的完善與否端視該地而定。此外，全國性的政治與社會問題越來越多，失業、投資過熱等問題逐一浮現。鄧小平採取了一些政治民主化的嘗試，然而民主主義的不成熟加上「非制度社會」等社會結構的問題，讓情勢變的難以控制。經濟開放，政治上卻未開放的結果，最後終於在 1989 年爆發天安門事件(天兒，1998：70-92，112-116)。

改革開放政策改善了中國的經濟，但「先富」制度卻造成區域貧富發展不均。

政治方面，新政策的實行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賦予了地方更大的自主權。不過由於中國社會中「非制度化」的「人治」特性難以避免，造成了貪腐等許多問題。中國的政策改變了，改變了人民的物質生活，也改變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經濟和政治的因素互相影響，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社會；然而基層結構中的幾個因素－社會的斷層、文化與歷史因素－仍無法輕易改變。

二、國際地位與對外政策的改變：從開發中國家到負責任的大國

中國過去以「開發中國家」自居，常以開發中國家的身分區分和西方已開發國家的不同。鄧小平在 1974 年的聯合國大會上發表「三個世界論」，並說「中國既是社會主義國家，同時也是開發中國家」。從中國在 1990 年的國民生產毛額等經濟指標來看，確實也仍位居開發中國家之列。然而，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中國的經濟和軍事能力都有了驚人成長，外界對中國的期待與恐懼也隨之升高。隨著國際地位的變化，中國不再強調自己是「社會主義政營」、「第三世界」的一員，轉而強調「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積極參加國際社會，朝向「負責任的大國」發展（天兒，2006：122-125，162）。

第三節 天兒慧的中國經驗與基層結構概念

基層結構中有多種結構因素，其中又以斷層社會、文化與歷史制度因素最為重要。這些中國社會「難以改變的特徵」，即使歷經國內的改革開放政策、國際地位與對外政策的變化，都還是存在在中國社會之中，持續產生影響。結構因素中的許多特性，都是對中國社會與人民的特性而發，而非中國政治或經濟的特徵；例如中國是「視狀況而定的社會」、精英和民眾的差距等等。天兒 1986-88 年間曾經擔任外務省調查員而在中國生活，對中國社會做了很多深入的觀察，因此對中國社會與人民的特性特別有理解。這些理解都融入其基層結構的概念，結構因素中的許多特性，都是發想自某個在中國生活時有過的體驗；而基層結構概念的建立，也是源於此時。本節就將論述其中國經驗對其「基層結構」概念的影響。

壹、 中國研究的契機與中國經驗

天兒在訪談中提到，其大學時代還沒開始學習中文，對中國研究也尚不感興趣。當時最有興趣的是歷史，尤其是歐洲史的部分。1972 年，天兒開始修習碩士課程，適逢尼克森訪中以及日中國交正常化等事件，激起其對中國的興趣。當時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期間，日本國內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很高，進而讓其決定對毛澤東做深入了解，並以此為碩士論文的題目。適時有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以及中共出版的《毛澤東選集》，都是很好的研究材料。

最初天兒也跟隨當時中國政治研究的流行，關注菁英階層；發現中國出版的資料會將人做「善惡」兩分，和毛澤東交好的都是「善」，反對他的則是「惡」，著重在領導階層的權力鬥爭之中。這也讓其意識到，觀察中國政治不能只從菁英階層來觀察，還要關注其他階層。一開始其對中國的農村、土地改革問題感興趣，

認為共產黨能夠以原本較弱的軍力打敗國民黨，主要都是這些農村基層發揮的作用。這就是其博士論文的主題，「中國革命與基層幹部」，描繪基層幹部在中國政治動態中的角色。

1986年2月，天兒受外務省之邀，到駐北京使館擔任調查員，1988年2月才返回日本。雖然在北京生活，天兒利用職務之便與閒暇之餘，走訪了中國各地，進行了多次的實地觀察與訪談。這段時間對天兒的中國研究有很大的影響，此時的許多文章都大量援引己身在中國生活的經驗，並根據這些經驗出版了《中國改革最前線》、《中國近代化的調查記錄》、《前往中國大陸》、《彷徨中的中國》四本書。其「基層結構」的概念也是在這段時間建立，許多結構因素的內涵，都是來自某段中國經驗的發想。²²

貳、 中國經驗對社會因素的影響

中國社會的特徵是「重斷層社會」，包括第二節提過的：都市與農村、精英份子與民眾、統治的制度化與視狀況而定的人際關係，以及政治掛帥、經濟殿後政策的斷層差距。這些截然不同的地域發展差距、社會階級差距、處事態度、政策優先差異，都同時存在在中國社會之中。天兒還在北京生活時，發表〈文化大革命的質問：在北京研讀的日本文革論〉一文，以1985到86年間出版的幾本文革研究專書為基礎，²³分析日本的文化研究途徑，並提出自己對於文革研究途徑以及中國政治社會結構的見解。雖然其當時尚未使用「重斷層」此一名詞，實際上的概念是十分類似的。他在該文章中也提到，「在中國生活之後，我開始思考兩者（農村跟都市）的差距是否比比我以前所想像的更大。」（天兒，1987：126）以及「這些（差距和斷層的情況）都是由社會結構上的特質而產生的。雖然只在中國生活

²² 本節壹、貳兩段多處出自與天兒慧之訪談，參見訪談紀錄。

²³ 分別是加加美光行編著的《現代中国の挫折—文化大革命の省察》、《現代中国のゆくえ—文化大革命の省察Ⅱ》、著作之《逆説としての中国革命-アジア反近代精神の敗北》、安藤正士、太田勝洪、辻康吾《文化大革命と現代中国》

了不到一年，但這種感覺卻是越來越強烈（天兒，1987：132）。」，可見其中國生活經驗對其社會結構觀察的啟發。

一、都市與農村的斷層：農村實地觀察的感悟

天兒出生在日本岡山縣的農村地區，在實地走訪中國的都市和農村之後，卻發現中國的農村和日本的截然不同。中國生活的期間，天兒搭乘火車走訪各個地區；曾經從北京搭乘整整一天的火車到長沙，也曾經花三天的時間，經過蘭州再到烏魯木齊。和中國的農村相比，日本農村的都市化程度很高，無論文化、生活方式、景觀都和都市無異。被日本人視為「農村」的地區，實際上都是中、小型的都市，這點和中國差異很大。中國只有大都市和農村兩種地區形態，沒有所謂的「中小型都市」。在和天兒的訪談之中，天兒也提到中國延安市的市長到日本金澤市一帶開會，搭乘新幹線時觀看沿途的風景，忍不住說「日本全部都是都市」。反觀中國，大都市和大都市之間都是農村，無論是經濟發展情形還是文化、價值觀，都有很大的差距。

二、精英份子與民眾的斷層：差別待遇

在中國對外資訊還很封閉的 70 年代，天兒主要透過官方的文書、媒體來了解中國。是時共產黨執政之初，強調「為民服務」、「社會平等」，天兒對中國的印象，也是一個沒有上下階層關係、女性不受歧視、「平等主義」的社會。1976 年，天兒初次訪中，發現中國的社會上下關係意識遠比日本強烈，官員都具有「特權」。例如當時參觀革命歷史博物館，雖然現場還有許多一般民眾，但陪同的官員卻讓天兒等訪中團的成員優先進入。後來在中國生活兩年，觀察到更多精英份子與民眾間的差異，加深了其對斷層的看法。例如 1987 年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全大會提出政治報告，北京的幹部與知識份子都很興奮，熟識的一位女性勞工卻無動於衷甚至表達不屑之意，令天兒印象深刻（天兒，1994：86）。

三、統治制度化與視狀況而定人際關係的斷層：政治制度與關係社會

天兒初至中國時，對中共機關運作的制度化留下深刻印象。因為任職於使館，其備受中方禮遇，每當要到他省進行調查旅行時，從車票、訂房到安排會面等細節，全都可交由中方的外交部或政府人員處理。雖然效率不一定良好，但運作的過程確實頗具系統（天兒，1994：89）。然而，在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後，天兒發現中國社會實際上並不如統治階層有系統，甚至是個高度靠「關係」的社會。雖然靠關係一類的情事在他國也會發生，但在中國卻是一個根深蒂固、且非常普遍的情形。中國並不乏法律、制度等規定，然而實際運作的情況卻不良好。中國人民普遍不遵守法律，不被「制度」約束。比起制度，人們真正重視的是「關係」，認為什麼事都是「可商量」的；這就是中國社會制度和關係的斷層。

四、政治掛帥與經濟殿後的斷層：政治優先主義

這個部分和其中國生活經驗的關係較低，大部分是出於對中共政府政策的觀察。和中共相比，日本的政治家在政策上需要兼顧政治與經濟，兩者可說是一體化的關係。然而在中國，尤其是毛澤東時代時，政治就是政策的全部。雖然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共也逐漸正視經濟的重要性，但和「開放」的經濟政策相比，政治還是相對處於「緊縮」的狀態。

參、中國經驗與文化因素的影響

中國生活的期間，天兒除了觀察各地的社會景況，當然也少不了和人民的交流、接觸。天兒對中國文化與民族性的了解，即大部分是出自這段時間的觀察。不過也正因如此，其對中國人民民族性的分析多是針對現代人而言。其舉出在中國時因為學術紛爭而受排擠一事，認為中國人執著於既得利益、喜以流言詆毀對

方，都是受到當時中共統治下鬥爭風氣的影響。他曾經受到中國學生赴日求學的請託，而盡力給予幫助，對方卻不顧情面的去追尋新的、更好的機會。這種機會主義的傾向，天兒則歸結為是受到過度競爭的現代環境所影響（天兒，2006：65-70）。

其它像中國人的特徵和中日情感表現方式的差異，天兒也舉出許多生活中的例子。中國人普遍不遵守交通規則，也不守時，和日本人的特徵相差甚大。中國人不拘小節，買東西的時候，店員喜歡說「沒有、賣完了、明天來、沒關係」，被天兒開玩笑稱做是「四 M 主義」。在天兒的觀點之中，中國人的情感表達方式很接近美國人，缺乏自謙、自制的意識；例如學生向老師請求推薦函時，自吹自擂的人非常多。中國人自我表達的欲望強烈，也不喜歡道歉，這些個人主義的傾向都和美國人十分類似（天兒，2006：81-93）。然而中國人個人主義的傾向主要也是受到現代環境過度競爭下的影響，和中國傳統的關聯薄弱。因此，天兒所謂的「中國人的特徵」，與其說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民族性，更像是「現代中國人的特性」。這也是因為天兒在中國所經歷的，就是現代的中國。

第四節 小結

本節主要介紹了天兒慧在研究中國時主要使用的概念，以及這個概念的建構過程。天兒使用「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研究中國，認為中國社會存在一個「基層結構」，會影響中國的政治系統。這個基層結構中又包含許多結構因素，最重要的有社會因素、文化因素與歷史制度因素，共同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社會與外交政策。在這三個因素中，又以社會因素最為重要、著墨最多，也是天兒正式歸入基層結構中的因素。天兒的社會因素指的是中國社會之中存在著「四種斷層」，分別是都市與農村、精英份子與民眾、統治的制度化與視狀況而定的人際關係，以及政治掛帥經濟殿後政策之間的差距。而這些因素概念的建構，主要都出自天兒在中國時的生活經歷；其在中國所感受到的各種社會特色，都成為了「基層結構」概念的一部分。

天兒重視中立客觀的實證主義與科學方法，研究中經常大量引用各種數據、調查與圖表。在提出「基層結構」之時，也對定義、模型的建構特別注意。不過，其雖然在方法論上務求客觀，理論建構卻主要出自己身的經驗。其也回顧了大量的文獻，並多方以各種數據印證理論，並不違實證的精神；但理論中的核心概念，以及主要的實證資料都是出自個人經驗與見解。天兒曾經到中國生活，觀察到了當地的政治文化、社會特色，對其日後的中國研究都留下深刻的影響。縱使在研究過程中力求客觀，這樣的經歷仍是其研究中的一個主觀因素，始終伴隨著天兒的中國研究，也成了天兒和其他日本中國研究者不同的一處。

第三章 天兒慧當代中國論述

本章主要介紹天兒的中國研究內容，以及其如何使用「基層結構」去進行分析。天兒的中國研究主要聚焦在 1949 年之後的當代中國，範圍上對中國的內政、外交都有所涉獵。本章將從其幾個研究重心探討其論述：毛澤東與鄧小平政權的特徵與比較、中國對外關係、中國威脅論的評價。期望能透過本章的整理，理解天兒的論述，以及「基層結構」如何影響其對事件或人物的觀點。

第一節 毛澤東、鄧小平時期的 政治、社會與領導風格

天兒（1992：13-26）認為，和毛澤東時代比起來，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有兩個轉向：「從多層級變動到多元結構變動」、「從社會主義獨裁到近代化獨裁」。前者指的是毛到鄧時期政治社會體制的變動，後者則形容毛到鄧領導風格與政策方向的差異。針對這兩個特性，本節將先探討天兒概念中毛鄧時期政治社會的差異，再探討兩位領導者的領導風格。

壹、毛澤東與鄧小平時期的國家、政治與社會關係

天兒（1994：182，165）強調若要觀察整體政治社會的變動，不能只著重「國家、體制」觀點，更要關注「社會」觀點。因此，在討論毛鄧時期的政治社會之時，不只對政治體制進行比較，也關注兩個時期國家和社會的互動與發展。天兒認為，毛時代強調縮小國家規模、模糊國家與社會的界限，造成地方的反彈，也成為鄧小平反省的方向。然而，鄧在激發地方活性、權力下放地方的同時，卻讓傳統的「地域主義」復活，間接讓國家的作用變小，和毛的路線不謀而合。但天

兒也強調，這樣的結果並不完全是領導人政策實行的結果，社會結構本身的變動才是主因。

一、政治體制的比較

分析政治體制，天兒從「最高權力者與周邊」和「地方權力機構與民眾」兩個層面，分析最高領導者、黨政官僚、軍隊、地方權力機構、民眾、知識份子六個在政治動態上最重要行為者地位的變化。和鄧小平時期相比，毛澤東時期黨的統治力、指導力和吸引力較強，地方跟社會的多樣性也還不明顯，行為者的關係相對較為簡單。毛澤東時期，中央、地方和基層（大眾）三個層級互動，是構成「多層級變動」時代的主要特徵；鄧時期則在這之外發生了更多元、多樣的政體結構改變（天兒，1998：35）。

（一）最高權力者與周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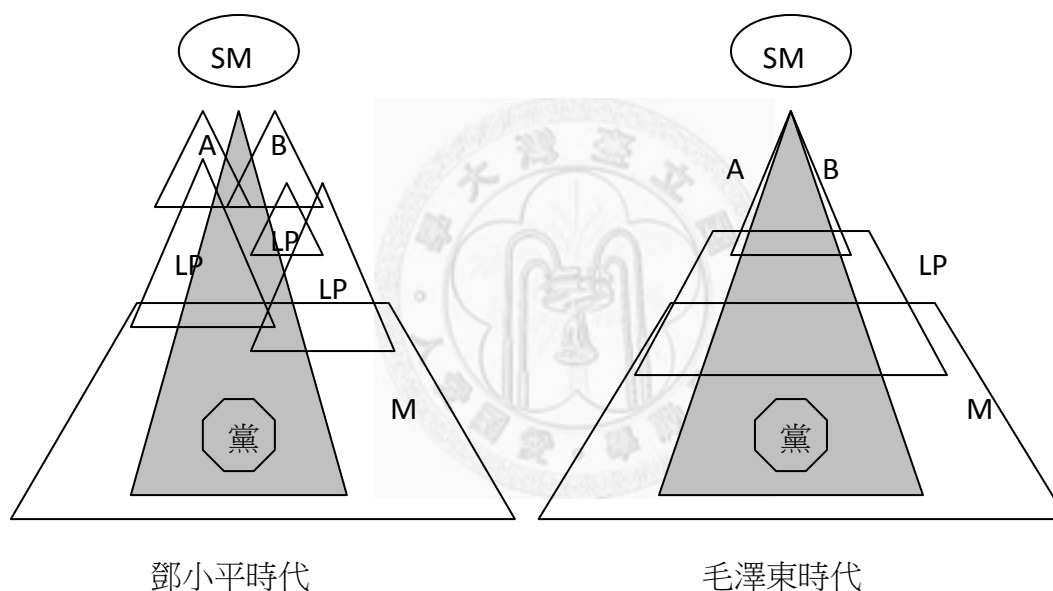
和毛澤東時代相同的是，鄧小平時代最高權力者（指鄧小平）仍掌握實權，以強力統制穩定秩序。不過不同的是在黨政官僚方面；鄧時代隨著經濟政策的重要性增強，政治、思想官僚的地位變弱，經濟官僚的地位增強。而軍隊方面，軍人也從過去向黨及最高領導者服從的情況，漸漸轉向以國家為服從對象的「國家軍隊」，遠離政治和權力鬥爭（天兒，1998：36-37）。

（二）地方權力機構與民眾

毛澤東時代，「地方」的權力機構是相對於「中央」的被動行為者；鄧時代「地方」則成為主動的行為者，具有立法、財政等權限，但也產生不同地方之間的摩擦。民眾方面，改革初期由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民成為改革中的重要力量，但也因為經常發生的抗議、暴動，成為社會不安定的因素之一。近年來，隨著都市化的情形增長、經濟生活的改善和現代化生活意識的增加，以及失業、罷工情形的出現，民眾漸漸成為政治體制中的要角。而在知識份子方面，

雖然知識份子對政治改革有很強的期待，卻受到當局的限制，難以產生重要作用（天兒，1998：37-38）。

毛鄧時代政治支配的情形，可以以圖表表達如下（見圖3）。由圖中可看出鄧時代的幾個改變，一是黨控制的弱化，二是軍隊和官僚的分離，三是地方權力機構的多元化。



SM：最高領導者(strong man)；A：軍隊；B：黨政官僚
LP：地方權力機構；M：民眾

圖3 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支配

資料來源：天兒慧（1998：36）

二、毛澤東時期：多層級變動

（一）社會特質的重要：「急進全體主義」的質疑

1970年代的J.R.Townsend 和其後的毛里和子大體上都將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社

會定位為「急進的全體主義」²⁴。天兒（1994：96-98）認為這樣的觀點雖有可解釋之處，但卻太過局限於政治系統基本機制(mechanism)和形式(style)，忽略了社會在政治總體特徵中的重要性。社會本身的傳統特質仍存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不僅對政治體系造成很大的影響，也構成政治體系本身。社會和國家應該是互為因果的概念，因此若要觀察整個政治體制，就不能忽略社會的重要；這也是天兒提出「多層級變動」（重層的變動）特徵的原因。

（二）多層級變動的內涵

天兒重視「中央」以外層級在整體政治體制中的重要性，將毛澤東時期的體制特徵定位為「多層級變動」，認為「中央、地方、基層」²⁵三個層次之間相互互動的關係，才能完整說明毛時代政治的動態變化（天兒，1992：16-17）。天兒舉了「農村的集體化」和「文化大革命」的過程說明這個結構下層級互動的關係，也代表國家和社會分別在農村和都市中發生的合作與衝突。此兩事件固可以以中央層級的路線和權力鬥爭去理解分析；但天兒認為在這樣的觀念之外，更應該重視的是其背後國家和社會的互動，也就是「中央、地方、基層」三層次的交錯影響和互動（天兒，1994：114，121）。這兩個例子的詳述分別如下：

1. 農村集體化

50年代毛澤東開始推行農村集體化的政策，後來並強制實行人民公社化。政策推行的過程之中，人民的回應雖然積極，但也出現不少反對、抵抗的聲音與行為；除此之外，傳統社會本身的特質，也深刻影響集體化推行的成果。例如初期推行合作社時，農民會對合作社的成效進行評估決定是否加入，因此在推動數年之後，出現了停滯甚至是縮小的情形。「反冒進」的想法從農民（基層）一路往上

²⁴ 一方面強調中國菁英統治的特性，認為黨和最高權力者毛澤東在統治過程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認為政治下層結構的自立程度較低，社會動員與變動都受到意識形態的牽引，屬於「臣屬、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天兒，1994：96）。

²⁵ 地方指的是從省到縣、鄉的層級，基層指的則是村的層級（天兒，1992：16-17）。

擴張到縣、省（地方），57 年開始就有省級的反合作社活動。除此之外，縱使毛致力於「新社群」的成立，傳統社群的作用仍無法忽略。例如當時運作較好的人民公社，主要都是由近親或近鄰組成的公社，具有傳統社群基礎（Parish & Whyte, 1978: 315）。這些社會反動不僅影響了集體化的失敗，也讓加強對地方控制的中央踩了剎車²⁶（天兒，1994：107-115，168-169；1998：25-29）。

2. 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的理念是盡量縮小中央國家的規模、國家機構簡單化，以及將權力下放到地方。毛澤東之前，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淡薄，但毛則致力於將兩者一體化。透過單位社會和檔案制度的建構，毛在都市中也建立起新的國家社會關係。從國家社會的觀點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指導之下，整個巨大化官僚主義國家權力機構解體、並由社區型權力取代的過程。雖然如此，在紅衛兵於 66 年登場後，國家陷入無秩序的狀態，仍須靠各地軍隊為中心的地方領導單位維持各地秩序（天兒，1994：115-137，169）。這些都說明不同層級單位在毛時代曾嘗試被融合、但又具有主動對抗能力的互動結構。

三、鄧小平時期：多元結構變動

（一）和毛澤東時期「多層級變動」的差異

毛澤東時期各個「層級」之間雖然有合作有對抗，但基本上都維持層級分明的情形，且主要是垂直的互動。到了鄧小平掌權時，鄧對毛時代「國家吞沒社會」的現象進行反省，決定進行改革開放政策（天兒，1994：161-162）。隨著政策推行，地方和地方、基層和基層間的水平互動出現了；而由於各個地域本身特性的不同，這些互動和政策、權力、社會的改變產生連動關係，構成天兒筆下的「多元結構

²⁶ 天兒（1994：168-169）認為「高崗、饒漱石事件」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增強，但又因為農村集體化的失敗而或得暫緩。此事件不單只是一次地方奪權，更讓毛澤東有機會廢除建國初期劃定的大行政區，以加強對省的直接控制。然而相對於這樣急進主義的做法，人民對農村集體化的反動也顯示了地方和基層對中央的抵抗能力。

變動」時期。「多元結構變動」強調的是不同地域、不同時代人民生活在同一時代之下產生的差異²⁷。主要原因除了各個地域原有的自然、地理、文化差異之外，也因為改革開放政策的龐大與複雜，使原有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變動，改變了原本「從上到下、中央控制地方」的單向關係（天兒，1998：39-42）。

（二）多元結構變動的內涵

1. 「諸侯經濟」的地域經濟差異

由於各地的發展情況不同，改革開放政策之下各地的做法也不同。例如一些經濟情況不良的地區，當地政府或指導者就採取封閉、保護的政策，以該地域自身的經濟發展為優先，無視中央的政策。相對的，在適合經濟發展的地區，如深圳、珠海、汕頭等，則成立經濟特區實行不同的制度。這之中有的地區受到外來企業的衝擊，造成原有「單位社會」的崩解；但也有像廣東這樣保有原有地域和政治意識的地區（天兒，1998：31-33）。

2. 農村幹部選舉與共產黨的控制

社會活潑化與利益多元化帶來了社會的動盪不安，對此中央的對策即是基層政治體制的重新整編。在部分地區，由於黨的控制變得越發困難，因此開放基層選舉，安撫民心。然而在部分地區，共產黨安定社會方式是加強黨組織的團結運作，例如陝西與山西省（天兒，1998：33-34）。鄧時代的經濟和政策都採取多元並行的方式，並隨著區域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三）政治改革的失敗與天安門事件

鄧小平重視安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也強調經濟和政治的改革開放。然而社會結構本身的僵化，與鄧小平本人受到的傳統社會關係牽絆，不只讓鄧走

²⁷ 例如都市與農村、沿海與內陸、北方與南方、受到近代化影響與保留傳統思考與習慣的不同差異（天兒，1998：40）。

上其所批評的超法規權力者（毛澤東）的路，更造成整體政治體制的危機，如天安門事件的爆發（天兒，1994：143-150；1996：87）。和毛澤東時代比起來，鄧小平時代由於社會的多元化，多了更多「不安定」的元素，不如毛時代領導者絕對權威下的統治來的穩定（天兒，1998：59-60）。多元結構變動的體制是鄧時代的特徵，也是其改正毛時代缺點所做的嘗試。然而，其所無法改變的是社會因素的持續存在，尤其在改革開放政策加強了社會多元化後，社會因素變得更為複雜。這樣的因素正是第二章中提到的，中國社會中「難以改變的特徵」，在毛鄧時代也影響著兩人政策的成效與結果。

貳、毛澤東與鄧小平領導風格的差異

一、毛鄧成長背景與理念的差異

毛鄧的成長背景、個性、政治的經驗等，塑造出兩種不同的領袖形象，也讓兩人在政治上的理念大異其趣。天兒以幾個形象說明兩人的差異，分別是「直接反抗與對抗逆境」、「本土與國際」、「夢與現實」、「皇帝與半皇帝」。前者指的是毛澤東的特性，後者則指鄧小平的特性。

毛澤東從成長時就反抗父親、反抗家庭，在北京大學任圖書館員時更對所謂的教師、知識份子產生反感。這反映在其政治上對「權威」、對其政敵蔣介石、對蘇聯的反抗。和其相對的，鄧小平的政治生涯並不順遂，曾兩度受到打壓，但都再度崛起、終究掌握最高權力。而和留過學、思想開放的鄧相比，毛受到中國典籍的影響深遠，且擅長軍事戰略、重視地方力量，發展出一系列「農村包圍城市」等重視本土力量的戰略。然而，毛澤東建國前實事求是的風格，在建國後受到現實限制，漸漸被夢一般的理想所主導，因此在經濟與人民生活的改善上不如重視生產力與經濟等「現實」的鄧小平。除此之外，毛澤東重視「戰爭」、「矛盾」，也和強調「安定」的鄧小平有很大不同；雖然兩人最後都走上趨近獨裁者的「皇

帝」作風，但和毛專斷獨行的作法相比，鄧更願意接納他人的意見，只能稱上是「半皇帝」（天兒，2004：29-54）。

二、中國政治的「磁場」與領導風格

除了毛鄧個人化的因素，天兒認為兩人的領導特性更受到中國本身政治社會特徵的影響。中國政治特徵具有「二元對立」的「磁場」，從政治動態（安定與混亂）、政治文化（虛與實）、政治主體（菁英與大眾）、政治認識（敵與友）到統治方式（人治與法治），都具有二元對立的特性。中國的政治情勢在這二元磁場中輪流流動；從毛到鄧時代，也標誌著兩種對立的特徵。鄧小平的時代是「邁向近代化」的時代，而中國的近代化正是從「亂、虛、大眾、和敵人的緊張關係、人治」這個磁場，過度到另個「安定、實、菁英、非敵對相互依存、法治」磁場的過程（天兒，1996：12-17，202）。除此之外，毛鄧時代人治的傾向以及官僚型統治的特性，也都延續中國歷史上的「王朝特性」，說明歷史特性對今日政治的深刻影響（天兒，2000：17-22）。

事實上，鄧小平的領導方向並不是完全和毛澤東相反。在革命戰爭的理論、民族主義與外交路線上，鄧繼承了毛的概念。然而自建國以來，鄧在國家、社會、經濟建設的層面上，一反毛澤東革命家的做法，開始引進改革開放政策，和毛產生重大歧異。鄧和毛一樣重視民族主義，期望建設富強的中國；但其比毛更加務實、軟硬兼施，且非常重視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儘管如此，在政治層面，鄧的作法仍然是以安定、平衡為重，培養接班人、排除異己，並在天安門事件後走上接近毛的獨裁道路。這不僅是鄧個性與個人體驗所造成的結果，更是受到中國淵遠歷史與錯綜政治環境的「磁場」所牽引。這「磁場」中的一個重要特色，即是中國難以變化的「基層構造」。鄧小平可以輕易改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形態，卻無法徹底改變中國社會特徵的各個面向（天兒，1996：199-204）。



第二節 中國對外關係與中國威脅論

天兒對中國的對外關係與外交政策也有深入研究，其中包含中國對日本、亞洲、美國的關係；由於第四章將單獨探討日中關係，本章的中國對外關係以日本以外的國家為主。另外，近年隨著中國經濟、軍事力量的成長，其他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說法甚囂塵上，對此天兒也有自己的見解。

壹、中國對外關係

一、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歷史因素的影響

無論外交或內政，天兒都重視「歷史、傳統」作用的重要性。因此，在探討中國外交政策之時，天兒先從傳統的外交戰略分析起。

（一）傳統中國的外交特徵

天兒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中國外交有三個特徵：以華夷秩序為基礎的「朝貢外交」，重視禮儀的「接待外交」，以及重視權力的現實主義外交。華夷秩序以文化區分「華」和「華以外的世界」，「華以外」的國家透過朝貢的方式進貢，形成有上下區分的朝貢外交。雖然中國將其他國家視為文化較低的「夷狄」，但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下，相當重視禮儀，對外來者以禮相待，相對的也要求外來者遵守中國的儀式，是謂「接待外交」。另外，由於中國國土廣大，地方割據情形時而有之，因此形成重軍事實力的外交戰略，如「合縱連橫」、「遠交近攻」、「三分天下」的計策等。這些傳統的外交政策，到今日都還影響著中國的外交戰略（天兒，2003：240-242）。

（二）現代中國的外交特徵

天兒認為 1949 年後的中國外交政策有四個特徵：「國家要素」的重要性、「綜合國力」的重視、「大國外交」與「雙邊外交」。中國對「國家」的重視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論述。一方面，傳統華夷意識上中國就對國家相當重視，延續至今日則轉化為對近代「國民國家」的重視，強調「國家」的救亡圖存、以及進一步的富強。另一方面，中國由國家壟斷外交政策，對「非國家」的外交並不重視；即使此一情形在「瀋陽總領事館」事件後稍有變化²⁸，大體上國家仍在外交政策中扮演壓倒性的主導地位。而相對於毛澤東時代對軍事力在外交上的重視，今日的中國外交除了軍事外，還有經濟和民族的凝聚力等考量，注重「綜合國力」的提升。

對外關係的處理戰略上，中國對國際關係以「極」的方式理解，著重「極與極」的關係，而所謂的「極」即是綜合國力強大的大國。具體問題上，中國重視雙邊關係，並盡量掌握主導權，例如和東南亞的領土紛爭、日中關係等問題上，中國都盡量採兩國各別處理的方式（天兒，2003：245-248）。

（三）多極化、大國意識與和諧世界

自 2002 年第 16 次黨代表大會之後，中國外交政策開始具有責任大國的意識，重視和各國的合作與發展。表現在具體的作法上，中國也漸趨務實，重視非零和的國際合作，並漸漸開始注重多邊關係與地區合作機制的建立。如前所述，中國對國際關係以「極」視之，對當今的國際社會更有「多極化」的理解傾向，因此更加重視國家間的合作（天兒，2006a：114-119）。

多極化認識讓中國提倡國際合作，這樣的認識和大國意識結合，就是中國「和諧世界」的理想。中國自 2005 年以來提倡永久和平與繁榮的「和諧世界」，其中不僅是對世界各國共同合作的呼籲，更隱含身為「大國」的中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²⁸ 事件中中國曾嘗試讓非政組織（NGO）進行協助，讓中國外交「國家獨佔」的特性略受改變（天兒，2003：245）。

在和諧世界的理想下，中國不僅參與既存的國際活動，更致力於新活動、新會議的提倡，例如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不過在這樣宏大的理想下，中國的外交政策仍具有重視國家利益的傳統特徵。和諧世界不只是中國所期望的國際新秩序，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實現，更是中國改變美國霸權領導、建立中國式「平等、公正、合理國際秩序」的方式（天兒，2006a：112-114，119-125）。

（四）外交策略的發展、變化與互相影響

從建國時期「一邊倒」政策到改革開放後的「獨立自主外交」，中國逐漸擺脫對「世界中心」的堅持，重視對外關係與戰略對象的多元性。除此之外，由於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多樣與多元化，外交也不再是可以專斷獨行的政策，還須顧及國內反映，因此形成外交與內政的連鎖關係（天兒，1994：183-207）。21世紀的中國，對國際情勢的認識轉向「一超多強」，主張世界的多極化以及各國的平等共存。而在綜合國力之外，中國也逐漸重視「軟權力」，例如孔子學院的設立（天兒，2010：42-47）。

然而，無論中國的外交策略如何發展，傳統的特徵始終影響著中國外交。今日的中國仍然重視傳統「接待外交」的禮節、形式與王道主義，例如對訪問中國的他國元首以禮相待，對有違中國禮節的國家冷淡處之，如對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表達抗議與憤怒（天兒，2003：242-244）。除此之外，2009年後廣受關注的「北京共識」也有中國傳統秩序的影子：以文化區分的圓錐形上下權威關係，以及以文化而非法制建立的秩序類型。雖然天兒（2010：47-50）認為北京共識的建立與影響都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但中國傳統秩序的影響卻是不可忽視的。

二、中國和各國關係：大國意識的影響

中國的對外政策固然受到傳統與歷史的影響頗深，然而隨著中國經濟、軍事

等國力的增強，中國逐漸具有大國意識，對外也採積極而和平的策略。

（一）中國和東亞各國的關係

中國過去以「開發中國家」自許，2000 年前後則以「影響世界的責任大國」自居，並自 2003 年起提出「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願景。和「和諧世界」的大戰略相結合，中國在東亞注重「善鄰外交」，強調和鄰國發展平等、和諧、互惠的關係。在這樣的「大國意識」之下，中國逐漸走出過去狹隘的國家利益觀念，積極和各國發展多樣化的和諧關係（天兒，2010：10-12）。

舉例而言，過去中國對南北韓以地緣政治下國境邊緣的觀點視之，將朝鮮半島視為中國的緩衝區，在韓戰中盡力阻止美國勢力進入此一地區。然而冷戰後的數十年來，中國開始重視經濟發展和安全保障，不再堅持地緣政治上只支持北韓的政策，而以達成朝鮮半島的和平為優先，例如在朝核問題中就願意尊重南北韓當事國的意見。和印度方面，儘管中印兩國過去關係緊張，1980 年後仍積極嘗試在政治、經濟、安全保障的層面上合作；雖然無法完全消除兩國的爭端，但達成許多實際的合作，例如自 2005 年起建立「戰略互惠夥伴關係」、2003 年首次進行海軍共同演練等（天兒，2010：23-28；33-37）。

中國和東南亞國協（ASEAN）各國同樣也從冷戰後開始改善關係。隨著東南亞國協的茁壯與地域安全論壇（ARF）的成立，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漸漸重視此一組織的存在而尋求接近。最後，中國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率先對東南亞國家伸出援手，因此較日本等其他亞洲大國獲得更多東南亞國家的信任，並於 2001 年簽訂十年後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天兒，2010：28-32）。

不過，中國對亞洲各國的態度並不僅止於雙邊關係的改善，更尋求在這基礎

之上建立「東亞共同體」。中國的東亞共同體構想中，以安全保障為目標、經濟為和各國改善關係的優先項目，並以東南亞國協、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等中國和周邊國家的合作機制為中心。雖然「東亞共同體」在理論與形式上都仍十分模糊，以此為名而建立起的合作機制確實不斷擴大。而中國過去以「社會主義政營的一員」、「第三世界的一員」自居，如今漸漸具有「亞洲一員」的認知，也體現出其大國意識下，積極融入世界的觀念變化（天兒，2006a：136-138；148-156）。

（二）美中關係

美中長期以來處於時而合作時而衝突的脆弱關係，即使在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後，也因為天安門事件、台灣問題、波斯灣戰爭等事件讓關係數度受到衝擊。然而由於「中國威脅論」在美國興起，中國逐漸改採積極和美國交好的作法，重視和美對話、盡力維持兩國友好。例如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江澤民就願意和美國相互協調，緩和兩國關係。不過中國在整體對外策略上仍致力排除美國單極霸權的領導，以「多極化」等策略逐漸改變現有的國際情勢，降低美國的影響力（天兒，2006a：111-112，114）。

貳、中國威脅論

天兒認為，中國威脅論並不是在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軍事崛起後才出現的。對中國的鄰近國家來說，「中國威脅論」早在中國的帝國時代就已經存在。當時的中國是亞洲的泱泱大國，對周邊國家有擴張的傾向，透過冊封讓鄰近國家臣服於中國的權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毛澤東「革命輸出」的策略也讓中國經常和鄰近國家產生摩擦，一直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國對外的態度才漸趨軟化，逐漸和鄰近國家改善關係。

然而199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發展和軍費支出都大幅成長，再

次引起鄰近國家的警戒；加上蘇聯瓦解、冷戰結束，美國可能撤出亞洲的疑慮讓東南亞國家擔心「權力真空」出現，「中國威脅論」又再度出現（天兒，2003：121-125）。雖然美國後來並沒有就此從亞洲撤出，但威脅論仍然存在，且對此憂心的國家越來越多。究其原因除了中國驚人的經濟成長外，不斷增加且不透明的軍事支出、1990年以來積極的核子試驗更是讓他國憂心忡忡的原因（天兒，1997：4-6）。然而，究竟中國是否是一個威脅？天兒認為，一方面不應因危機感過剩而忽略中國本身的主張，另一方面其客觀層面上的經濟和軍事發展也不如外界所想像的龐大。天兒也強調，其並不是抱持「中國不可能是威脅」的樂觀主義者。只是在中國經濟、軍事膨脹的同時，也不能忽略中國本身的變化和數字背後的意義。現在的中國已經意識到自己是一大國，比過去更有自信，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就是一個威脅；有自信的中國反而變的更理性、更從容了（天兒，2006b：155）。「圍堵中國」絕對是一個危險的政策；正如奈伊（Joseph Nye）所言：「如果把中國當成敵人的話，中國就會成為真正的敵人」。這是在考量中國威脅論時不可忽視的一點（天兒，1997：13）。

一、「中國威脅論」的印象與實際

從威脅的印象、威脅的意圖與威脅的能力三方面來說，中國過去的強大以及和周邊國家的衝突，加上中國的領土主張等實質行為，以及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實力，都構成他國「中國威脅論」的印象與恐懼的理由。不過天兒認為，如果就此判定中國是「好戰國家」言之過早。客觀評價中國的強大，應該拋開美國式的、冷戰之後過度的危機感，重新檢視中國的行為與意圖。中國反覆表示「中國軍事力是防衛性」、「不會把核武用在先制攻擊」、「反對霸權主義國家」等，也強調其國力強化的目標是「不受他國干涉」，都顯示中國對防衛性軍事力量的重視。除此之外，中國傳統文化意識上重視道德權威主義秩序的「王道主義」也不可忽視（天兒，1997：6-9）。探討中國所追求的「國際秩序」時，應該要從傳統的中華秩序中

去觀察；對於中國部分被認為是有侵略性的言論，也應該要認知到這是出自於中國無意識間的「權威主義」或「華夷」思想（天兒，2010：47-52）。不能單單因為中國具有威脅的能力，就斷定中國具有這樣的意圖；雖然中國也致力於成為「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但並不表示其會成為具有侵略性的超級大國（天兒，1997：8）。

二、經濟、軍事的成長與問題

除了應重視中國本身的說法與意圖之外，從客觀的層面觀之，中國的經濟與軍事成長又是否真的會構成威脅呢？經濟層面上，中國人口眾多、領土廣大，經濟的成長看似永不停止。憑藉著廉價的勞動人力與廣大的市場，外資紛紛湧入，獲得了「世界工廠」甚至「世界市場」的美名，也造成包括日本在內的周邊國家產業紛紛外移到中國，加深各國憂心產業空洞化的「中國威脅論」。然而，天兒（2003：248-252）認為這樣的說法太過誇大。以日本為例，雖然日本的廠商很多都到中國設廠，卻不代表中國能夠獲得日本企業的生產知識（know-how），進而取代日本廠商。更何況，國際企業的競爭本來就是當今經濟活動的正常現象，日本企業應尋求自我改進。除此之外，中國也有許多本身的問題。例如尚不足夠的高等教育，以及「一胎化政策」下的高齡化社會，都是中國經濟未來可能出現的變數。

軍事方面，中國的軍事支出確實不斷增加，且由於資訊不透明化，外界普遍認為實際的軍事支出要比公布的還要多上三至四倍。然而，日本軍事專家茅原郁生（2001：177）認為，中國在「量」上雖有強大的戰力，「質」上卻充斥著許多舊式的軍隊與武器，且在情報或綜合作戰能力等軍事的「軟實力」方面也十分缺乏。天兒（2003：253-258）同意這樣的看法，且認為除此之外，日本強大的防禦能力與和美國的安保關係都對中國有相當大的嚇阻能力。雖然被捲入周邊軍事摩擦或被用「政治手段」威脅的可能性也存在，但在中國對「中國威脅論」的說法有意

識之後，已逐漸調整自身的外交策略，強調「國際合作主義」。



第三節 小結

繼第二章探討過天兒研究中國時主要使用的概念之後，本章的重心則放在探討其研究的內容與見解。第二章曾介紹其概念中「社會、文化、歷史因素」的內涵，本章則可以看出這些因素的重要性。在內政的分析上，天兒比較毛澤東時期和鄧小平時期政治、社會與領導風格的差異。在毛鄧兩位強人統治下，此時期的中國給人集權的印象，學者也多半從中央領導體制去分析此時的政治局勢。然而，天兒強調「社會因素」和「歷史因素」發揮的作用；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制並不是只有「中央」一個層級，還有「地方」和「基層」，也就是「社會因素」，彼此的互動構成了「多層級變動」體制。鄧小平時代試著改善毛澤東時代的缺失，讓社會變得更加多元與複雜，形成「多元結構變動」的體制。不過正如第二章所提過的，中國的「社會」和「歷史制度」都是基層結構中「難以改變的特徵」；這些因素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許多困難和挫敗、讓鄧小平的領導風格最終趨近「毛澤東化」，也帶來了天安門事件這樣的國家和社會衝突。

在中國對外關係與中國威脅論方面，天兒則強調「歷史因素」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並主張從「歷史」觀點去重新理解中國威脅論。當然，今日的世界情勢已經和冷戰前有很大的差異，更遑論數千年前的「中華帝國」時代，因此天兒也強調中國的外交政策確實出現一些新的觀點與策略，例如中國的「大國意識」。然而，若能重視「歷史因素」，將更能理解中國話語背後的真實涵義，也能去除冷戰思考下過度的危機感，更加公正客觀的評斷「中國威脅」。

第四章 天兒慧的日中關係

天兒身為日本學者，對日中關係自然有更多描述；而在日中關係之中，也可看到天兒對「文化因素」重要性的強調。繼第三章第二節介紹天兒對中國內政和外交的見解後，本章重點放在其對日中關係的論述之上。第一節先介紹天兒對日中關係不同階段關係的分析，以及其對兩國重要議題的見解；第二節則從影響兩國關係的因素－文化因素與戰略因素上進行探討。透過本章的整理，得以瞭解天兒對日中關係的觀點。

第一節 日中關係的變化與重要議題

日本和中國關係深遠，在地理、文化和歷史上鄰近且互相影響。然而，由於戰爭和包括台灣在內的區域問題，兩國在亞洲的近代史上處於對立和互不信任的狀態。即使兩國於 1970 年代邦交正常化，數十年來兩國關係仍經歷了有好有壞的不同階段，其中人事也大有異動，影響國家關係的發展。另一方面，兩國政府和國民的關係也起起伏伏，具體展現在許多議題上彼此的爭議（天兒，1992，35；2006a：12-14）。

壹、日中關係變化的不同階段

從 1972 年兩國正式建立邦交開始，天兒將每十年視為日中關係的一個新階段；截至 2010 年為止，共可分為四個階段。在這不同階段之中，兩國的關係有進展也有阻礙，而影響兩國關係甚鉅的人事問題，也有很大的變化。

一、日中關係四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 1972 年開始的整個 70 年代。此時期的特徵是從僅限於「友好人士」的交流，慢慢擴展到一般人的交流。尤其在兩國關係正常化後，日本掀起一

股「中國熱」，不只中文的學習蔚為風潮，到中國進行貿易的人士也大幅增加。然而相對於日本的中國熱，中國對於日本在經濟上能有所提攜的期待過大而難以實現，造成中方的失望。

1978 年兩國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在日本帶起「第二次中國熱」，也讓日中關係邁向第二階段。這個時期除了意識形態和政治的交流之外，經濟的交流也大幅增加；然而隨著雙方的交流逐漸密切，纏繞兩國的「歷史問題」也再度浮上檯面，造成此時期兩國關係同時存在安定與不安定的因素。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對日出口大幅增加以及日本對中的借款，兩國的關係大幅成長，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也於 1982 年互認夥伴關係。然而，教科書問題、靖國神社參拜和光華寮事件，為兩國關係的進展蒙上陰影，造成兩國關係的不穩定。加上 1989 年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關係一度十分僵化；不過日後隨著經濟的熱絡，兩國逐漸恢復關係。

前兩階段的日中關係侷限於「兩國關係」，對國際的影響有限，且主要是「日本對中國」的單向關係。90 年代開始，兩國關係進入第三階段；主要特徵在於「日中關係的國際化」，具體表現在當時首相海部俊樹出席 G7 會議時公開呼籲「不應該孤立中國」、「日中關係是世界中的、亞洲中的關係」等發言。不過此時兩國的重要互動主要是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援助（ODA）以及日本對於歷史問題的回應等，基本上還是「日本對中國」的單向關係。直到 1990 年末、中國經濟大幅成長，日本因泡沫經濟景氣低迷，才轉變為雙向關係。

邁入 21 世紀，中國無論在經濟還是軍事層面都大幅成長，「大國意識」也逐漸增強。此時，日中關係邁入第四階段，兩國的交流在規模、多樣性和複合性上都所有進展。首先在 2001 至 2006 年小泉政府時代，日中呈現「政冷經熱」的不平

衡狀態；兩國摩擦不斷，經濟的熱絡卻從未停止，尤其在 2005 年中國加入 WTO 後，兩國簽訂更多合作協議。且政治上「冷」的狀況，主要也侷限於小泉本身，並不妨礙其他自民黨或他黨政治家和中國的交流。到了 2006 年，安倍晉三甫上任即至中國進行「破冰之旅」，讓兩國首相互訪正常化，逐漸邁向「政熱」的境界；然而經濟上，由於中國製品問題頻頻，反而出現「經冷」的情況。在第四階段，除了兩國的互動增加，日中關係國際化的情形也持續延伸，具體展現在「東亞共同體」的議題上。日中關係不只是兩國關係，更是整個亞洲太平洋的關係；其中和美國的互動，更是東亞共同體中的主要問題（天兒，1992，35-37；2010：19-23）。

二、日中人事異動：「掘井人」時代的興起與結束

除了各種國內外事件的影響，「人」的因素更是影響日中兩國交流的重要關鍵。冷戰時期，美國對共產國家採取「圍堵」策略，日本政府和中國政府也呈現對立的局面。然而由於經濟上的需要，許多力促日中貿易的議員和團體崛起，讓兩國的關係接近，也對日中邦交的建立功不可沒。72 年日中建交之時，周恩來引用中國諺語「飲水不忘掘井人」，感謝這些對日中關係建立有貢獻的人們。而這些在 72 年以前對日中關係交流有貢獻的主要人們，也被稱為「老掘井人」，和關係正常化後的「新掘井人」做一區隔²⁹。

無論新掘井人或舊掘井人，「掘井人交流」都具有兩個特徵：第一，日中的交

²⁹ 「掘井人」字面意義上同時指日本和中國兩方的人員，但由於中國的對外關係高度掌握在政府手中，加上早期在對日關係中處於較被動的狀態，中方的「掘井人」僅限於幾位高層領導人，且也並非天兒討論的重心。在「老掘井人」方面，中國方主要有周恩來（總理）、廖承志（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郭沫若（中國科學院院長、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孫平化（中日友好協會秘書長，後任會長）；日本方面則有內山完造（日中友好協會）、高良とみ（參議院議員）、松村謙三、古井喜実（眾議院議員）、中島健藏（日中文化交流協會）、高碓達之助（東洋製罐社長、經濟審議廳長）、岡崎嘉平太（全日空社長）。而「新掘井人」中方主要為鄧小平（黨副主席）、胡耀邦（總書記）和王震（國家副主席），日本方面為田中角榮、大平正芳（首相）、竹入義勝（公明黨委員長）、竹下登（首相）、林義郎（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大來佐武郎（外相）、土光敏夫（經團連會長）、稻山嘉寬（新日鐵社長、經團連會長）、河合良一（日中經濟協會會長）（天兒，1998：2）。

流以特定人物關係的建立為基礎。第二，日中關係被當作「特殊關係」處理。就第一個特徵而言，由於中國比起制度更加重視人與人的關係，因此兩國關係的建立高度倚靠雙方特定人士關係的建立。第二個特徵則主要以「老掘井人」時代為主，當時戰爭結束不久，不少人對中國懷有贖罪般的情感，中國方面也有許多人年輕時曾赴日留學，對兩國關係懷有「特別意識」。

人與人的緊密交流是「掘井人」互動的本質，但也因為人的主觀因素的影響過大，讓彼此的交流欠缺理性和客觀，經常流於情感用事。1987年胡耀邦辭職與1989年天安門事件，日中關係受到重大衝擊，也造成一批新的人事異動，日中交流的「掘井人時代」可說正式落幕。在這之後，無論是雙方交流的層面或彼此的矛盾都大幅增加，但連繫兩國關係的特定「掘井人」再也沒有出現。現在，雖然也有部分人認為「掘井人」有存在的必要，但由於長期疏於活動，若要恢復有實際上的困難。

從日中建立邦交前的「老掘井人」到建交後的「新掘井人」，大體上是從非執政黨的政治、經濟、文化界的人士，轉向執政黨體系的人士。老掘井人對中國滿懷歉意、以建立邦交為目標，新掘井人則以協助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為重心。到了90年代後，掘井人的角色由兩國政府官僚取代，同時民間、學生的交流也增加了。天兒認為，比起有特定目的的「掘井人」，學生或民間的交流更加重要。許多中國的年輕人往後都可能是公務員甚或領導者，若能加強其與日本的交流，對日中關係的未來影響甚大。無論兩國具有怎樣的矛盾與問題，加強各界、各階層的交流，促進對彼此的理解，才是建立兩國關係的關鍵（天兒，1998：2-35；192-193）。

貳、日中在爭議議題上的處理

日中簽訂和平友好條約不久，日本就開始對中國的經濟援助。兩國的交流初

期是從經濟、貿易方面開始，後來才漸轉向政治、文化的交流。隨著交流增加，歷史、政治等過去的問題也重新浮上檯面，不過基本上並未影響到日中間的經濟關係（石原忠浩，1997：33，52）。天兒亦認為經濟並非影響兩國關係的主因；造成日中衝突、甚至動搖關係根基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歷史問題、台灣問題、中國威脅論與日美安保問題（夏冰，1997：272）。，這些因素造成兩國關係雖然並非一直極度惡劣，但卻無法持續維持穩定。

一、歷史問題

圍繞著二戰而起的「歷史問題」，始終是日本和中國在兩國關係發展上的一大障礙。雖然戰爭已結束半世紀，戰爭的陰影仍殘留在人民的心中，也讓中國人民對身為侵略者的日本難以諒解。這樣的情緒在某些事件的加溫下，讓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更佳高漲；其中尤以「靖國神社參拜」與「教科書事件」最易激起衝突。靖國神社為日本供奉戰爭中過世軍人之處，但由於供奉對象包括 14 名二戰中的甲級戰犯，每當有日本首相前往參拜，即引來中國人民的不滿。而教科書事件主要是由於日本部分出版社在歷史教科書中，淡化日本在二戰中的責任，屢次引來中國的不滿與抗議，並曾經於 2005 年引發大規模反日運動。

即使日中已經於 1972 年建立邦交、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明仁天皇也曾於 1992 年訪中，歷史問題仍然存在在日中關係之中，且不斷帶來衝擊。對此，天兒認為歷史問題之所以始終纏繞兩國關係不休，主要原因是兩國人民對於歷史的認識有很大的差距，且此一差距越來越大。隨著時間過去，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日本人越來越多；雖然大部分日本人承認過去的戰爭是「侵略戰爭」，但對於外界一味指責的態度漸有不滿的情緒。而對中國來說，雖然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年輕人也逐漸增加，但戰爭的直接犧牲者、受害者，以及親人在戰爭中受傷的人多數仍健在。加上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強化中國人民對「侵略者」的敵對意識，更加加深年輕

人的反日情感。近來更由於日本部分政治人物不時發表挑釁性的言論，不斷激起中國人的憤怒情緒，在兩國都成為熱門話題。

兩國的「認知差距」究竟應如何彌補？首先，日本不能逃避問題，必須要面對「侵略」的事實，接受並加以貫徹。但中國也應理解日本國內多元民意的特性，不應過度解讀部分對中強硬的政治人物（如石原慎太郎）的言論。另一方面，要求日本人能有完全符合中國想法的歷史認識，其實是很困難的；中國應該採用「三七開」³⁰的精神，理解日本人確實有為過去做出反省和補償。無論如何，兩國都應該著重於歷史事實，積極進行合作，建構兩國共同的歷史認識，才是著重大局的解決方法（天兒，2005：51-53）。

二、台灣問題

「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處理台灣問題時的原則，且一向視為其內政問題，他國不應干預。日本在和中國建交時，自然也尊重這樣的原則；然而日本與台灣不僅曾有過殖民時代所建立的關係，在經貿上往來也十分密切，引來中國的關注與不滿。事實上，80年代時台灣並沒有成為日中的主要問題。但自從李登輝就任總統、積極擴展對外關係之後，中國經常質疑日本親台的態度。雖然日本始終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政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日台關係是民間層次交流」，沒有變動過立場；但也不可否認的是，台灣和中國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實體與民主主張，加上台灣人對歷史的認識較為客觀、和日本人互動良好，都加深了日本人對台灣的親近、理解甚至同情。然而天兒認為，日本在處理台灣問題時還是把中國的立場放在第一位，且這樣的做法並不違背「日台友好」的精

³⁰ 天兒慧在這邊使用的「三七開」為中共黨史上常用名詞，指雖然有三分過錯，但仍有七分功勞，因此應以功代過。普遍認為此為鄧小平對毛澤東在文革方面的評價，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鄧小平表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神。日本和周邊國家的善鄰友好十分重要，中國也應該理解這樣的立場，支持日本同時和中國及台灣交好（天兒，2006a：31-34）。

三、中國威脅論與日美安保問題

冷戰後的國際秩序應如何安排，「美國一極領導」和「各大國多極化」是兩種熱門但截然不同的見解。而亞太地區的安全保障，究竟以美國為主、日本作為輔助的「軸心與輪軸」（hub& spoke）模式，亦或中國主張的多極模式為佳，也成為一個爭議。然而，中國無論對美國亦或日本都有強烈的不信任感；對中國增強的軍事，日本也有持「中國威脅論」的聲音，讓日中兩國因為安全戰略引起不少衝突。天兒認為，雖然聯合國能力有限，還是應該建構以聯合國為主的國際秩序，並以地區的安全保障機構作為輔助。在亞太地區，這樣的機構可以由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等以日美中三國為軸心的機制擔起責任，盡力尋求大國間的協調關係。日本在安全保障上不應向美國「一邊倒」，但也不能放棄日美安保體制，而是應該在和美國維持關係的狀況下，積極改變國內「中國威脅論」的觀念，達成日中的互相尊重與信任（天兒，2006a：41-45）。

第二節 影響日中關係的文化與戰略因素

第二章中曾經介紹天兒中國基層結構中「文化因素」的概念，包括日中的文化與民族性、時間與空間認識的差異，以及情感表達方式的差異等「人」的因素。在天兒的日中關係論述中，可以大量看到這些因素的作用，包括日本和中國人民互相理解的程度、對歷史的認識等，主導了兩國關係的好惡。另外，除了文化因素的作用，日中兩國在戰略上的差異也是影響日中關係的因素之一，因此在本節一併探討。

壹、文化因素：「人」對日中關係的影響

一、反日與反中情結

90年代以後日本和中國人民的衝突不斷，2004年亞洲盃足球賽、2005年北京的日本大使館、瀋陽總理事務館等日中衝突，不斷引起中國的反日情緒。隨著日本經濟的弱化與中國的崛起，中國不斷爆發的反日事件也引起日本人民的不滿，「反中」的聲音逐漸在日本國內發酵。雖然日本和中國於1972年就恢復邦交，兩國人民的關係似乎是越來越惡化。然而天兒認為，反日與反中情結可以從更深的心理層面去理解，且兩國人民的關係未必如外表所顯現的惡化。

（一）日本人的反中情緒

日本人在長遠的歷史上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甚深，對中國有無意識的親近感。包括日本人從小就閱讀「三國志」、「水滸傳」、「西遊記」、「論語」等中國經典，以至宗教、料理等生活層面，處處受到中國的影響。加上兩國關係正常化時，日本人視毛澤東為「偉大的領導者」，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又發表「放棄賠償請求」的宣言，讓日本人自1972年來的20餘年間持續維持對中國的好感。但是，隨著國

家自身政治經濟情況的改變，兩國關係也起了變化，日本的反中情緒漸漸出現。日本對中國情感惡化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個：歷史問題、借款問題與「大國主義中國」問題。

歷史問題如上一節所提到的，兩國人民對於歷史有「認知差距」，中國無視於日本戰後的專守防衛原則與和平主義的浪潮，一味指責日本為侵略者，讓日本人漸感不滿。借款問題方面，自 1978 年以來，日本持續提供對中的經濟援助（ODA），是日本對外援助中的最大國，也讓兩國透過經濟交流而促進關係。然而，日本人民對於使用稅金大量借款給中國的好處為何，漸漸感到質疑。中國內部偶有「借款是（戰爭）賠償的一種」、「借款是必須要償還的，不需要感謝」等否定借款的聲音，讓日本人無法感受到借款的必要。加上中國經濟的驚人成長、日本的相對衰退，日本國內的反對聲浪逐漸升高，政府也決定在 2008 年停止借款。

「大國主義中國」方面在上一節也有提到，中國在領土、領海等問題上的態度十分強硬，讓日本人民對中國產生「中國威脅論」與「傲慢」的印象。加上日中兩國交流增加，人民接觸的機會也增加，往往將普通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放大到民族的層次。例如在日中國人的犯罪事件、中國人於商場上強硬的談判作風，「現實中的中國人」讓日本人忘記對中國的親近感，對中情感逐漸惡化（天兒，2006b：36-48）。

（二）中國人的反日情緒

在中國方面，由於歷史問題等原因，反日的情緒較為複雜。然而近十幾年來的反日浪潮，除了各種政治、經濟、歷史的複合原因外，媒體和網路的推波助瀾也是原因之一。如同上一節所說到的，日中之間存在各種爭議議題，除了歷史問題之外，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反日教育的作用，加上日本過度依賴美國的態度，

以及中國國內遇到的一些問題，都構成中國人民反日的理由。然而除此之外，由於近幾年來網路、手機等的發達，整個社會的情報網絡和過去完全由共產黨統治的態勢完全不同。一方面，網路的存在讓人民得以自由發言，不同的聲音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也由於網路難以管制的特性，部分情緒性、挑釁性的言論，也經常帶來誤解。

不過天兒認為，中國人的反日情結，其實還有更深層的心理因素。第一，戰爭對中國人有非常大的影響，許多相關受害者仍認為日本政府應該做出更多道歉與補償。加上日本某些政治家的挑釁言行，讓中國人民的憤怒情緒不斷被挑起。中國受害者或家屬對於政府放棄賠償請求的做法也無法理解，紛紛組織民間求償團體；中國政府的態度也從反對到逐漸接受，給予這些團體活動空間。第二個因素則是中國自身的優越感。過去日本經濟是中國傾羨的對象，近幾年卻逐漸被中國超越；這增強了中國人民對抗日本的意識，產生「鄙視日本」的優越心理（天兒，2006b：28-35）。

（三）反日情形的實際：民意調查的分析

中國對日觀感的民調，長期以來都以負面印象居壓倒性多數，實際上也衝突不斷。然而，天兒在各種中國的民調之中，解讀出了負面情感的另一個層面。近幾年的民調，雖然對日本的負面印象仍然多於正面印象，但「普通」、「沒有特別情感」的中立派意見，實際上才是占大多數的。除此之外，對於日中關係的未來，持有樂觀態度的人也多於悲觀者。天兒認為，中國人對日本的情感已經從「一面倒的惡化」漸漸轉向「多樣化的情感」，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國人對於「過去的日本人」和「現在的日本人」已經漸漸有了切割。這個特徵可以表現在中國人關注的日本議題之上。民調中顯示，中國人對日本的關心，集中在商品、經濟、日中關係等幾個層面，遠勝對政治、歷史的關心。另外，在某些和日本交流較密切的

城市，例如上海，日本居然同時成為「最討厭」和「最喜歡」的國家。這代表雖然反對、討厭日本的人仍然存在，但對日本具有「厭惡」以外情感的中國人也在增加。對中國人民來說，對日本的情感已經不再只有一種。因此日本也不應該受到中國反日運動的影響，而應該帶著更積極的態度，加強和中國的交流（天兒，2006b：59-67）。

二、日中關係的障礙

天兒認為「人」的因素在日中關係中十分重要，因此對於反日和反中情緒探討甚多。如果人民存在對抗意識，無論政府如何努力，兩國關係仍然會惡化。日中兩國在許多層面上相似，但看似接近實際上卻漸行漸遠，容易產生誤解。因此，增進兩國關係最好的方式，就是拋除一切成見、更努力的去了解彼此。

（一）「相互理解陷阱」與「感情問題」

日中關係時好時壞。但即使在感情融洽的時刻，任何衝突仍足以動搖兩國根本關係。日中關係如此不穩定，天兒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相互理解的陷阱」與「感情問題」。日中兩國在人種、語言、生活習慣等方面看似相近，但實際上卻截然不同。兩國人民「自以為互相了解」，反而因此失去認識真正的彼此的機會、造成更多誤解，形成「相互理解陷阱」。「感情問題」則是指戰爭帶來的後遺症；由於一些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屬受到的直接或間接的傷害，讓反日意識在不少中國人心中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情感，難以改變（天兒，1989：136-140）。

如同第二章在介紹「文化因素」時所提過的，天兒認為日中兩個民族在時間與空間認識、情感表達方式上都有差異。然而兩國人民都用自己的方式去和對方相處，卻沒有真正的了解過對方；這不僅造成人民在交流上的衝突，也影響到兩國的關係，成為「相互理解陷阱」。例如在歷史認識和戰爭處理的問題上，中國不

斷指責日本「沒有道歉」；但事實上多數的日本人都認為日本已經在各種官方文件上表示過謝罪的意思，也認為已經用過其他的形式對中國進行「賠償」。日中兩方對於「道歉」的認知在根本上就截然不同，但兩國卻沒有考慮過對方認知異於自己的可能性，形成各說各話的局面（天兒，2006：91）。

「感情問題」方面，天兒雖身為戰後世代，仍認為日中戰爭對日本來說十分重要，是日本人不能不接受的國家歷史問題。其也表示身為日本人，「無法忘記過去侵略亞洲各國的歷史。我反對各種因狹隘的民族主義而起的，試圖抹煞、扭曲、美化歷史的行為。」（天兒，1989：137，164）天兒曾經和中國的戰爭受害者家屬見面，理解這種「感情問題」解決的困難。但其也提出當年的戰爭背景：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國內的一元國家體制、貧窮的經濟情況，以及走上歧路的亞洲主義。這些在當今日本已不存在，因此也沒有擔心日本會再發動戰爭的必要（天兒，1989：164-165）。日本人不能忘記過去的歷史，但中國人也應該理解到日本和過去的不同，才能夠為兩國關係找到新的出路。

（二）理解的重要與日中關係的未來

雖然日中交流在關係正常化後大量增加，中國卻無法擺脫「歷史的受害者意識」，日本又在近年對中國產生「威脅感」，兩國關係始終無法改善（天兒，2006a：78-81）。天兒（2006a：242）認為，「中日間最大的問題在彼此誤解」，過去兩國強調互相理解、友好交流和經濟合作，兩國卻缺乏根本的互向，無法建立穩定關係。因此，除了實質上的交流，兩國人民更應該要從根本上改變認識對方、解決兩國問題的態度，就是其所提出的新原則：「減少相互誤解、建立理性關係、創造共同利益和共同意識」（天兒，2006a：52，252）。例如中國人經常懷疑日本軍國主義可能復活，但日本不僅國內反戰意識濃厚，國防的費用也多用在人事費上，是中國人應該要理解的部分。而兩國有許多鷹派的網站或報紙，經常使用情緒性的言辭，

讓兩國的問題複雜化、擴大化，應該要避免讓這樣非理性的聲音造成太大影響。除此之外，現在環境、貿易、資源等「國際問題」逐漸增加，兩國應該把握在此類問題上的交流合作，進一步創造共同的利益和意識。

事實上，兩國的交流已經逐漸出現戲劇性的變化。2000年起，中國人可以有條件的到日本旅行，赴日求學的中國學生也漸漸增加，讓中國人得以對日本產生不同於歷史記憶的「新印象」。不過，改變兩國關係最大的，還是網際網路的普及。即使中國政府對網路有所限制，仍然無法阻擋訊息交流的浪潮。透過漫畫、戲劇、時尚等日本流行文化，日本得以以新的面貌走進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讓中國人對日本社會與日本文化有了新的認識。同樣地，中國也逐漸在日本「日常生活化」，不再只給日本人從歷史中獲得的「貧窮、戰爭受害者」印象。雖然也有因交流反而對對方產生壞印象的例子，但如果是出於理解，而非偏見、誤解去批評，至少還有解決的辦法。因此，在增加兩國交流之餘，如何讓人民客觀充分「理解」對方，就是兩國要改善關係的最重要工作（天兒，2006a：117，177-197）。

貳、戰略因素對日中關係的影響

雖然天兒強調文化因素，但戰略因素也確實對日中關係造成影響。日中過去的關係主要是「日本對中國」的單向關係，但隨著 21 世紀中國大國意識的發展，外交戰略轉趨積極，也改變了和日本的關係。過去，歷史問題、經濟援助是兩國關注的焦點，但近年來中國也出現一些「對日積極派」，從宏觀觀點探討兩國關係，強調強化日中關係的重要性、以及避免讓歷史問題成為兩國障礙。中國對日本的態度何以發生改變？第一，對主張「多極」世界的中國來說，身為「超強」的美國給中國帶來威脅感，因此積極和依賴美國的日外交好，希望日本能夠脫離美國而自立。第二是站在建立「東亞共同體」的觀點。即使日本近年的經濟發展不如以往，仍然是世界重要的經濟體之一，對「東亞共同體」的建立來說十分重要。

第三，著重長期發展的中國，有許多環境、能源開發等問題，都需要日本的經驗或合作。(天兒，2004：46-49)。

然而天兒認為，面對逐漸改變態度的中國，日本卻沒有做出相應的反應。國家應該拋開狹隘的國家觀念，從戰略的觀點思考兩國關係，在「國際」的觀點上解決兩國問題、尋求合作，才能讓日中關係在新的層次上發展。對日本來說，也應該避免某些在歷史問題上的情緒性舉動，擺脫在經濟上或軍事上對中國的恐懼，在考量國際關係的前提下思考和中國的相處方式，才能真正消除兩國的互不信任、建立理性而客觀的關係(天兒，2006a：213-232)。



第三節 小結

本章介紹天兒對於日中關係的一些看法。首先，日中關係在這數十年來歷經多個不同階段，但基本上可歸納為兩個變動方向：第一，日中關係不只局限於兩國，對亞洲甚至全世界的關係都會有影響。這是日中關係的重要之處，也是處理日中關係應有的態度。比起將日中視為「特殊關係」，天兒更傾向視之為「普通的兩國關係」。第二，日中關係過去多由日本主導，但現在中國的態度已轉為積極，並主導多項議題，兩國開始發展「雙向關係」而非過去的單向關係。和這樣的變動相應，兩國交流的形式也從高度倚賴特定人士的「掘井人」交流方式，漸漸轉向官僚和民間雙軌進行，也就是一般兩國交流的模式。天兒認為這些都是良好的變動：從單向轉為雙向關係讓一直處於主動狀態的日本獲得回應、從特殊關係轉為普通關係，則讓兩國可以擺脫特殊的情感糾葛，穩定而長遠的進行交流。最後，「掘井人」時代的結束開啟了民間交流的大門，這些交流讓兩國人民更加認識彼此，是兩國改善關係的重要基礎。

日本和中國曾經在建交之後經歷過一段關係良好的蜜月期，之後關係卻起起伏伏，在冷戰後更頻頻陷入緊張，甚至將對方視為威脅。對於其中的原因，天兒以「文化因素」解釋，一方面建議兩國客觀理性的理解事實與彼此的立場，另一方面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本都出在兩國人民彼此的不理解與不信任。何思慎(2008: 253-258)則從戰略的角度觀察此一問題，認為兩國關係惡化的主因是中國崛起之後導致兩國實力相當，進而引發的競爭關係。「歷史問題」90年代以前並不構成威脅，反而是在中國經濟大幅成長，開始注重經濟海域開發而和日本有權益重疊之時，才重新成為問題。歷史問題就像中國政府的外交工具，一方面可以抑制日本正常國家化，一方面也可激起國內的民族主義。加美光行則認為兩國關係的惡化出於欠缺主體性的民族主義。兩國近代化的道路並不相同，但兩國在反西歐近代化掙扎、抵抗的過程未完之前，卻都遇到挫折，造成民族主體性的喪失。兩國

在區分論的認知上也出現歧異，中國開始將現代的事件和過去的歷史、戰爭問題結合，模糊日本政府和一般民眾之間的區分，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激起仇日情緒（陳綺齡、邵軒磊，2011，35-38）。不過陳鵬仁（1999，357-369）則認為，兩國雖然經歷了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光華寮以及天安門事件等問題，日本為了亞太地區的安定，加上外交政策上跟隨美國腳步的做法，對中國政策不會有太大變化。

日本和中國在歷史問題、台灣問題和安全戰略上都有不同的看法，彼此互不信任，經常造成衝突進而引起兩國人民的不睦。然而，這些衝突往往也是造成兩國人民無法信任彼此的原因。究竟是不信任帶來實際衝突，亦或是實際衝突帶來不信任，中間存在在邏輯上的矛盾，也是天兒所忽略的問題。雖然天兒分別對「如何增進互信」和「兩國在衝突議題上應該採取的態度」做出自己的闡述，但卻未解釋兩者互相影響的情形。

天兒從文化和戰略兩個角度，深層剖析反日和反中的情緒。正如天兒強調人民互相理解的重要性，其認為兩國關係改善的主體始終是在「人民」而非國家身上。然而，兩國的民族性和民族意識都有很大的差異，也因此兩國無法只因為「交流增加」就改善關係，更需要改變「交流的態度」，以理性而開放的態度去了解對方。事實上，天兒自己也認知到日中兩國，尤其中國人民對歷史問題的敏感程度，讓日中關係十分複雜，也讓兩國取得互信極為困難。因此天兒的見解，與其說是一種「建議」，毋寧說是其身為一個日本中國學家對於日中關係的期待。天兒對日中關係的未來是帶著樂觀的態度的。即使日中兩國衝突事件不斷，其也相信無論在文化或戰略層面，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觀感已經出現改變。因此，天兒對日本有更多期許；對於日本近年才漸趨增加的「反中」情結，認為應該要避免其中情緒性的因素，而用更積極理性的態度去面對中國。

第五章 斷層與延續：天兒慧知識脈絡

在分別討論天兒分析中國的理論架構和其對當代中國內政、外交，以及日中關係的論述之後，本章將重新探討天兒理論架構核心—「基層結構」的意義，並將天兒的論述與方法論和其他學者做比較性的分析。本章期望能在前幾章的論述性內容之外，提出更多分析性的內容，為天兒在日本學術界中的角色與特殊性做一定位。

第一節 「基層結構」的意義

壹、「斷層」特性：「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的建構與意義

第二章中，曾經介紹天兒「基層結構」概念的內涵，包括基層結構中的各種不同因素，以及可能的變動性；並在最後一節中探討這樣的結構和其學思歷程的關係，亦即「基層結構」概念如何受到其中國經驗的影響。第三章與第四章則分別介紹天兒在這樣的模式下，如何分析中國的內政、外交，以及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此處嘗試重新回歸「基層結構」這個分析模式本身，觀察其模式建構過程中的變化，並嘗試分析其所代表的涵義及其背後的原因。

一、「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的意義

天兒的「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具有兩層意義，一個是其對中國社會在近代化過程中轉變的體悟，另一則是方法論上對「社會主義・開發中國家模式」的反省。³¹這是「基層結構」模式的意義，也是其建構模式的原因。

³¹ 「社會主義・開發中國家模式」是從社會主義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角度，對中國進行分析。根據天兒的論述，「社會主義・開發中國家模式」最早由其師岡部達味提出（天兒，1994：40-41）。

雖然「基層結構」強調的是社會中「不變」的部分，但事實上天兒一開始注意到的是中國的「變化」。1980年代後期，中國進入近代化的過程，從政治到經濟、社會的各個層面都經歷劇烈的變化。無論是都市的樣貌、建築的高度、空間的利用、技術的進步甚或日常百姓的表情和言談，都和過去有所不同。然而，正是這些「改變」，才突顯了中國社會中的「不變」，並成為中國在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障礙。這些矛盾到底是如何產生的？中國社會中「不變」的基層結構，就是天兒的答案，也是基層結構的第一層意義：解釋中國近代化後面對的矛盾。天兒認為，比起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何，更重要的是要先瞭解「中國特色」是什麼（天兒，1989：42）。

另一方面，「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也是對「社會主義・開發中國家模式」的修正。如同第二章也提到過的，雖然「社會主義」和「開發中國家」都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的政治或經濟情形，但會讓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或開發中國家畫上等號，面臨限制；而即使解釋上合情合理，也容易使研究者只關注事件表面，忽略背後的特質。因此，天兒（1994：44）認為不能只強調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開發中國家的同質性，更要關注其異質性。不過，天兒所做的並不僅僅是研究、分析中國的這些「異質性」，其主張根本的推翻這些社會特性做為「特殊因素」的存在，建立一個新的理論架構，讓這些社會特性作為研究的重心，不再只是個別國家的「特別因素」（天兒，1994：52）。天兒的架構從反對強調同質性的普遍理論而起，但最終的目的則是建立新的普遍理論，讓本來被視為是「特殊」的社會特質，成為分析各個國家時的工具，而分析的方式就是透過對該國「基層結構」的理解。

二、「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的內涵與政治變動論

（一）基層結構與系統

至於「基層結構」作為理論的內涵為何，和「系統」又具有什麼樣的關係？天兒最初提出此一概念時，雖然就使用「基層結構・系統」一詞作為分析架構，但實際上著重基層結構內涵的論述，缺乏對「系統」的定義（天兒，1989：73）。後來其再次提出此一概念時，整體的架構更加完善，也對「系統」的概念及其和基層結構間的關係有更多論述。根據天兒的定義，系統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具有特殊意義的層面中，在複數的行為者之間，其行動根據某些規則而有一定的規則性、連續性。」「系統……是實質上進行機能運作的有機體，對於所有的作為（input），都有一定的規則性與連續性可以期待……從而獲致所有可以預測的結果（output）。」（天兒，1994：42-43）由此可以看出，天兒的「系統」實際上借用了社會科學中常見的系統概念，是輸入與輸出項的轉化過程。然而其並未對輸入與輸出項的內容作更多論述，其所關心的是系統「實體」本身，強調的是系統和基層結構的關係。天兒透過定義的方式強制規定系統具有某些政治社會的基層結構，再根據研究經驗確認其中的關係（天兒，1994：43）。也就是說，系統的概念實際上是被建構出來的，天兒先觀察到的是基層結構，進而再假定在這基層結構上有一個系統，和基層結構相互作用。

前面說到「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是對「社會主義・開發中國家模式」的修正，這也對系統和基層結構的關係有影響。天兒認為社會主義和開發中國家的概念，部分都具有系統的機能，然而其中不同國家的異質性，還是要靠基層結構來理解（天兒，1994：43-44）。「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不只修正「社會主義・開發中國家模式」將國家個性作為特殊性的假設，也根本的認為社會主義和開發中國家的概念就是一種「系統」；要了解這樣的系統，就要先了解基層結構。

（二）政治變動論

「社會主義・開發中國家」和「基層結構・系統變容」兩個模式，不只是分

析政治社會的架構，也可分析政治變動。社會主義就包含兩方面的政治變動論：各國、各地區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所做的實踐、造成的變化，以及在這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引起的對立與鬥爭。和開發中國家有關的政治變動論，則可說明傳統的、非近代的政治因素在經濟、社會與文化影響下朝向近代化改變的過程（天兒，1994：48-49）。

不過在中國的政治變動論方面，天兒反省的目標是「穩健與急進的鐘擺式變動論」與「制度論的政治變動論」。前者「鐘擺式變動論」解釋中國政治領導者在保守與開放之間的擺盪，以及個別領導者在施行政策時緩急交互的做法（收與放的平衡）。後者「制度發展論」則意在探討改革開放後的政治體制，以及現階段的歷史在長期的歷史中的位置。這兩種變動論都由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學者予以理論化，³²其中「制度發展論」源自開發中國家的近代化論，也特別受到中國社會的重視，例如提倡「新權威主義」的吳稼祥，就區分中國社會不同的發展階段（天兒，1994：47-51）。

天兒對此兩種理論都進行批判，認為前者讓政治變動陷入平板的非歷史性循環論，後者則實際上將政治變動視為從非制度性社會轉向制度化社會的過程，也是一種政治擺盪。這兩種變動論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忽略中國特有的歷史、地緣政治與社會狀況，和「社會主義·開發中國家」分析政治社會時的問題相同。分析中國的政治變動，不能如「鐘擺式變動論」只著重中央領導階層，也不能像「制度論的政治變動論」把過去的社會只視為「遲滯、傳統、非制度性」，欠缺對個別個性的探討。因此天兒提出「政治領導的三層結構模式」，認為中國的政治變動應從「中央、地方、基層（末端）」三個階層的互動來考慮（天兒，1994：51-52）。由此可見，無論是分析政治社會的「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亦或分析政治變

³² 包括 Franz Schurmann（1968）與 G. William Skinner and Edwin A. Winckler（1969）及其他中國學者（天兒，1994：232）

動的「政治領導的三層結構模式」，都是起自對現有分析模式或「基層社會」、「社會個性」所做的修正，而這樣的概念也和天兒的「基層結構」概念緊密相關。

貳、「延續」中國：日本學術界的「中國」

日本的中國學界長期以來討論日本在亞洲的位置，如何觀看中國就變的十分重要；為了避免日本捲入中國的歷史進程，導致看到的都是日本所期待的中國，因此而有各種主張。即使對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戰後學者來說，這樣的問題仍然存在；且無論研究者自身是否有意識回答，其對於日本或中國的看法，本身就隱含著某種立場的選擇。天兒身為戰後的日本中國學者，關心中國的時勢、日中關係的變化，也關心日本的未來。如何在擺脫中國之餘進行中國的「延續」？日本的知識界如何處理此一問題，天兒又是如何處理此一問題？是此處探討的重點。尤其在 1990 年代後，中國經濟的成長、「中國威脅論」的出現，為日中關係投下變數，也為這些問題增添富雜性。本章嘗試將天兒的論述和「裂解中國」的石原慎太郎、中嶋嶺雄等人，以及「模糊中國」的溝口雄三與濱下武志作一比較，並分析內藤湖南創造的「空間」和天兒的不同；最後也嘗試歸納天兒和岡部達味、宇野重昭師徒關係下的概念影響，以及和毛里和子在「亞洲」觀上的類似性。

一、中國崩潰論、裂解論

美國的華裔學者章家敦在 2001 年曾經出版《中國即將崩潰》，詳述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各種問題，預言中國在不久之後就會分崩離析。當時中國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前景備受肯定，章家敦的言論自然引起熱烈討論。

類似的見解也存在日本的知識界中；同時也是文學家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除了力陳中國威脅的嚴重性之外，也曾在 2002 年預測中國會分裂成數個小

國家（莊雅涵，2008：66）。而日本的評論家宮崎正弘（2009：16），1994年在雜誌上發表「中國最多會分裂為十六個」的論述，其後又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已經出現停滯的情形，經濟的破產將帶來中國分裂，最多會分裂為16個部分（宮崎，1995：12-13）。到2009年仍堅持中國會因為經濟、文化等理由造成分裂，只是修正為「中國會分裂成七塊」（宮崎，2009：22-43）。中國研究者中嶋嶺雄（1989：27，143）自1980年代起就主張中國崩潰論，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更讓其中國崩潰的期望達到高峰。中嶋1989年出版《中國的悲劇》（中国の悲劇），以天安門事件作為出發點，認為這次事件是一次「反革命」，是人民對共產黨的絕望；中國已經開始崩潰了。

此類主張透過在地理上裂解中國，讓中國成為零碎的個體，也藉此讓日本得以擺脫中國。當中國成為碎裂的不同版塊，將不再是「巨大的他者」，讓日本得以平等的和中國對視。然而對天兒來說，其透過自身觀察去解讀中國，從「內部」理解，因此完全不需回答「日本在哪裡」的問題。天兒雖然提過中國在民族、地方風俗、方言上的多樣性，但其並未深入探討各個地區的差異與影響。在其「重斷層社會」的探討中，也並未討論沿海和內陸地區、或南北地區的差異。雖然有「都市與農村」斷層，但也並非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中國政治地域價值結構的差異。「斷層社會」概念上給人「裂解中國」的錯覺，但與其說將中國分裂，不如說是在以中國為一「整體」的前提下，強調其中的多樣性。這是天兒和「崩潰論、裂解論」的差異，也是天兒處理日本的位置的方式。

二、中國歷史與社會：溝口雄三與濱下武志

溝口從思想史觀點，批判日本知識學界觀察中國時對中國或歐洲觀點的依賴，主張中國自身的「歷史基體」。濱下提出「朝貢體系」理論，強調「亞洲的方式」，拒絕以西方標準來衡量近代化，認為應該要從亞洲各國的關係決定。天兒則

否定西方中國研究中強調同質性的普遍理論，認為應該從中國社會的觀點出發，注重中國的特殊之處；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同樣否定西洋模式對東洋模式的取代。

溝口 1989 年出版《做為「方法」的中國》，提出「基體展開論」。溝口（1999：18-20，106-107，117，127-129，145）認為江戶時代的日本漢學，只著重尋求「脫離中國」，缺乏對中國客觀環境的理解。而戰後日本的學術界採用歐洲的觀點來觀察中國，無論對中國是蔑視或稱讚，都不脫歐洲的觀點。即使像竹內好提出的，中國與日本的「回心與轉向」文化，仍是透過歐洲來將日本與中國異別化。日中兩國從歷史上來看就各自互異，兩國的差別並不待歐洲的出現。因此溝口強調「歷史基體」，³³認為這是觀察中國的近代之時必須注意的部分。日本、中國與歐洲都只是「多元化世界」的構成要素：要客觀的觀察、評斷中國，首先就需擺脫日本自身的觀點，將中國學視為外國學，加強對中國時代背景（即基體）的考證。

1983 年，濱下（1999：6、265）提出「朝貢體系」理論，主張以經濟體為單位來觀察中國的部分。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體系，在面對西方國家時不只是受到衝擊，也帶給西方國家衝擊。亞洲對於濱下是一個「空間」或「區域」的存在，在整個亞洲「有機整體」下，經濟與地域圈的關係超越了國家界線，中國的邊界在此之中則顯得模糊。

溝口雖然批判日本知識學界觀察中國時對中國或歐洲觀點的依賴，但並未說明現在的日本是否已擺脫中國，或仍像江戶時代需要處理如何脫離中國的問題？溝口強調世界的觀點，將中國視為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不需回答日本是否已擺脫中國。濱下雖然認為朝貢貿易體系是以中國為中心，但強調中國和其他國家（包

³³ 溝口（1999：28）在書中解釋，「基體」簡單說來即是傳統與通時性要素。

括日本)「共同」形成此一體系，而沒有處理日本和中國在此一體系中之互動。溝口強調歷史基體，濱下強調朝貢體系的經濟圈，都迴避了中國當下的具體位置，也讓日本得以外於中國。

溝口從思想史的觀點出發，研究中國傳統思想、考證歷史文獻，提出以中國價值為方法的「基體論」。濱下從經濟史的觀點出發，但其倚重的並非歷史文獻，而是把對傳統的重視擴展到整個東亞，從亞洲的觀點去認識中國。兩人在知識論的脈絡上有一共通點，而這共通點也和天兒不謀而合：亦即批判倚賴他人（包括歐洲）觀點的中國學，主張從中國本身的位置出發。溝口和濱下透過歷史的方式去認識中國，天兒則透過中國現實社會中的結構去理解。雖然彼此的方式互異，但都同樣重視中國觀點的重要性。

三、鄉村社會與斷層社會：內藤湖南

內藤湖南為明治、大正時代的史學家，對中國的觀察與評論多立基於中國的歷史。然而其「經世致用」的主張與擔任記者近 20 年的生涯，讓其觀點與其他同時代或同學派學者有很大的殊異。內藤的思想核心是中國歷史分期的「宋代近世說」與文化史論的「文化中心移動說」。其推崇中國文化，認為中國在宋代就已經進入「近世」，遠比西方國家要早。然而也正因如此，中國的文化正在衰老，文化的中心已經轉向日本。尤其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中國，缺乏政治、統治層面的能力，需要日本的啟發、提攜甚至共管，才能讓中國的文化再生。³⁴

內藤重視中國的鄉村社會。其區分中國「近世」的標準，其一就在於宋代貴族制度的沒落與平民勢力的崛起（錢婉約，2004：108）。內藤注重中國鄉村的「鄉團」勢力，其後並將這個範圍擴張到整個中國的平民、農民與一般大眾。這些人

³⁴ 主要參考自錢婉約著《內藤湖南研究》、內藤湖南研究會編著《內藤湖南的世界》、劉正著《京都學派》等書。

是中國發展向共和制度的主要力量，是中國改革的希望（吉尾，2005：177-182）。然而，內藤更加強調外在力量的幫助－尤其是日本的重要性。雖然推崇中國文化，但實際上是推崇中國過去的歷史。中國文化確實是日本的「催化劑」，但日本的文化還是靠自身的因素發展起來。日本文化具有優越性，雖然中國文化也傳到朝鮮，但日本的文化卻比朝鮮的好，也超越了中國（錢婉約，2004：134-136）。

雖然論著間充滿對中國「現在」的蔑視，但內藤和當時的學者不同，是真正的把中國「作為中國」來理解，而不只是作為自身思想正當性的手段。內藤固然也有自己的思想，但並不是透過中國來闡述思想，因為中國的社會本身就是其思想的母體（錢婉約，2004：14；山田，2005：111-113）。內藤反對當時西方的普遍性法則，重視東洋文化，強調東洋文化的一體性。然而這並非將日本和中國劃在同一時空中；中國有自己的「近代」，日本有自己的文化因素，內藤及其弟子強調歷史階段與分期的斷代史觀，讓兩者的文化處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之中。雖然其論述以中國為中心，但因為彼此處於不同的時空，讓日本得以客觀的觀察中國（石之瑜，2008：199-202）。

雖然天兒的時代背景與學思脈絡和內藤完全不同，但兩人都對中國的鄉村社會十分重視。所不同的是，內藤對鄉村社會的觀點猶如裂解論一般，將中國看成是許多不同小個體組成的空間、彼此互相區隔，缺乏統治能力。天兒從中國整體作大範圍的觀察，社會雖然有「斷層」，但卻正是中國社會的特色，並不影響中國的一體性。兩人同樣重視中國社會，但出發點卻彼此互異，也顯示了不同時代與不同背景下學者處理日中關係策略的差異。

第二節 天兒慧在當代學界的定位與特殊性

壹、 中國「內在」與實地考察的重視：岡部達味、宇野重昭

何培忠在《當代外國中國學研究》中，曾將天兒慧等人歸類為「沿循導師型」學者，追隨導師的方向，繼續深入某一領域做研究（何培忠，2006：417）。事實上，天兒確曾在訪談與書中提到其導師對其研究的影響；其在東京都立大學修習碩士課程時，由岡部達味任指導老師，學習各種分析、理論與寫作的基礎。博士期間在一橋大學修讀，也參加宇野重昭的「四月會」，共同研究中國，並因此確立博士論文題目（天兒，1994：268-269）。以下簡單介紹這兩位學者的學術特色，以及和天兒的關聯，尤其在方法論上的影響。

岡部達味長期從事中國研究，對中國外交領域的研究也受到多方肯定。岡部出生於1932年，日本敗戰給當時13歲的他帶來很大的衝擊，決定重新認識亞洲、認識中國。其高中開始學習中文，修習大學與碩士課程時也都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夏冰，1997：7-8）。身為「區域研究」者，岡部重視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與實地考察。其在訪談中曾表示「不去中國考察便談論中國…是非常不充分或不恰當的」（石之瑜等，2011：187）。

宇野重昭自求學時期，就重視實證研究的方法論，包括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以及實地考察的進行（石之瑜等，2011：70-71）。在1986到1989年期間，宇野曾參與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受國際文化會館委託的計畫；同鶴見和子、毛里和子、菊地昌典等日本學者，和中方的學者費孝通等人合作，在江蘇等地進行「小城鎮」的研究（何培忠，2006：439）。「在80年代和各方學者接觸、參與計畫後，除了政治學、外交史的角度，也更加開始考慮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角度的重要性」（宇野，

1989：7-8)。另外，宇野重視「內在因素」，質疑「西方衝擊」等只強調「外來因素」的說法。其認為符合中國實際的研究方法，應該要以中國自身內在發展的東西為基準，來觀察中國（宇野，1994：6；石之瑜等，2011：61-63）。

岡部和宇野都注重實證研究與實地考察的方法，而這也是天兒的研究所重視，並可以從其研究結果中發現的。天兒做學問早期，就適逢日中交流開始的時期；其研讀當地文獻、多次造訪中國，主要的理論架構也都在中國訪查後完成（見第一章文獻回顧部分）。不過除了研究方法之外，從兩位學者研究中國的觀點之中，也可看出些許和天兒的關聯，就是對中國「內在」的重視。³⁵

岡部在論述中國對外關係時，認為一國的對外戰略受到「國際情勢觀」的影響，而國際情勢觀的要素則涵蓋歷史（傳統）、意識形態與環境（對外關係經驗）三個層面影響（岡部，1991：39-41；2002：1-24）。岡部注重中國內在的歷史與價值觀，和西方科學方法多從權力、現實考量的做法不同。天兒在做中國相關的論述時，也相當注重中國本身內涵；例如「基層結構」之中，就包含文化和歷史因素。在「中國威脅論」的相關論述中，也認為中國的行為和中國的「王道思想」有關（見第三章第二節）。另外，宇野在論述日中關係時，曾表示日中關係的障礙和兩國的民族性有關。「日本人的認同和外國（中國）看來的日本人觀有落差」、「中國人注重意志，日本人注重感性」、「如果彼此的說明和理解不充分，只用模糊的方式表達，那相互的信賴關係要鞏固就十分困難」（宇野，2008：215-218）。這和天兒的日中關係論述類似，其也相當強調日本和中國在情感與民族性上的差別，以及互相理解的重要（見第四章第二節）。雖然天兒和岡部或宇野的論述方式、論證目的、實際使用的分析架構上都有不同，但在基本研究方法的方向上，以及對於中國「內在」，而非西方模型或理論的重視上，還是有很大的共通點。

³⁵ 此處的「內在」是引用宇野重昭的用字與觀念（宇野，1994）。

貳、日中關係與亞洲：毛里和子

毛里為史學出身，但面對國際問題研究時，頗受到社會科學方法的影響。毛里認為現代史不能只依靠史學方法，也要著重社會科學；而研究中國應將中國對象化並還原為政治科學，中國式的體制也應該對象化為政治學的一部分（學仕，2011：51）。其也批評美國的中國研究多從美式民族主義、市場經濟角度出發，缺乏客觀性（何培忠，2004：58）。毛里早期研究中國的周邊，包括少數民族以及蘇聯，其後則慢慢轉至中國本身，包括中國的改革。由於日中關係結構性的改變，2000年前後毛里也開始注重日中關係，尤其在2005年中國發生反日運動之後。隨著東亞整合的趨勢，以及毛里本人認為區域研究上的瓶頸，其也開始著重「亞洲學」的研究，並在2002年創建早稻田現代亞洲學院，同年著手「現代亞洲學創生」（現代アジア学の創生）研究計畫。

對於日中關係，毛里（2009：71-78；178-180）認為今日的衝突，都應追溯到兩國關係正常化之時談判的不完全。尤其在歷史問題方面，建交時的中國一方面對日本有戰略上的考量（接近美國，並切斷日本和台灣關係），另一方面當時中國政府高度控制輿論，所以可以做出只考量國家利益的決定，也就是對日本寬大。但日本政府正好相反；由於太過注重國內政治層面，缺少外交上的戰略，以為簽訂和約後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並持此一態度到現在。然而，隨著中國輿論管道興起，中國人民開始質疑過去政府對日寬容的態度；而日本則由於中國經濟崛起造成競爭關係，開始產生新的磨擦。

如何面對日中關係的未來？既然建交當時的「72年體制」已不再適用，兩國就應該尋找新的架構，也就是「亞洲」（毛里，2009：79-83）。透過「東亞共同體」的建立，應當可以減少兩國的競爭與磨擦，將國家利益轉化為區域利益（毛里，

2009：180-186)。當然，毛里對其中的困難也有所認知。東亞對日本和中國兩國的意義不同，而日本也缺乏外交上的大戰略。東亞共同體的建立還需要很多努力，但毛里仍認為是必須的方向（毛里，2004：233-236）。

毛里和天兒同在早稻田大學任教，同樣關注中國的現實問題，方法論上主要也都採美式區域研究方法，也都曾受教於宇野重昭。毛里卸任「現代亞洲學創生」計畫據點領導者後，該計畫更名為「為亞洲地區統合的世界人才育成」（アジア地域統合のための世界的人材育成拠点）計畫，自2007年以來轉由天兒領導至今。身為同樣關注中國與亞洲的學者，兩人在考慮日中關係走向上的觀點相似，亦即以更為宏觀的方式去考慮。



第三節 小結

本章總結了天兒慧的知識脈絡，包括其理論核心「基層結構」意義與內涵的重新探討，以及在日本知識界上的對應；並整理天兒的研究方法和領域的定位，並嘗試和相關的學者做一對照分析。

從基層結構概念的源起可以得知，這個概念是天兒對中國社會在近代化過程中轉變的感觸，而在方法論上也具有反省的意義。中國在 1980 年代後邁向近代化，無論器物、制度上都面臨了很大的改變。在這些「改變」之中，中國的「不變」被突顯，也就是作為「基層結構」的社會特色。然而對於將中國視作社會主義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的人而言，這些社會特質都是中國的「特殊」之處。天兒認為，社會特質本身就應該是必須被關注的重點，而非作為社會主義與開發中國家架構下的附屬。這也是「基層結構」在方法論上的意義。

在「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的內涵方面，天兒的理論主要奠基於其對中國的觀察，因此對「基層結構」的刻劃深刻，「系統」只是滿足社會科學方法之上建構的概念。除此之外，天兒也批判中國政治變動論中的「鐘擺式變動論」與「制度發展論」，認為和「社會主義・開發中國家模式」一般，太過注重同質性的探討，忽略中國本身的歷史與社會特質。

日中兩國的關係在 19、20 世紀之中，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甲午戰爭、辛亥革命、以至其後的日中戰爭、滿州國的建立、日本的戰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日本經濟的復甦……這些歷史徹底改變了日本和中國在過去幾千年中的關係，改變了日本在國際中的地位，也改變了過去由中國領導的東亞華夷秩序。由於東亞、甚至國際秩序的改變，日本在整個近代化的過程中，如何重構自己與中國、與東洋的關係，如何確認自己在全球中的身分，是日本在思想上一直試圖回答的問題。

天兒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和其他日本的學者又有什麼可辯證之處？

天兒的「基層結構」核心是「斷層社會」，然而雖以「斷層」為名，實際上卻完成對中國的「延續」。斷層社會探討中國在垂直層面上的多樣性，而非如崩潰論一般在橫向上、地理上分裂中國。除此之外，基層結構只涉及中國社會本身的現在與過去，無涉日本或亞洲，因此也和溝口或濱下「模糊中國」的作法不同。最後，天兒和內藤處在完全不同的時空環境，但卻正好都重視中國的鄉村社會。對內藤來說，鄉村社會足以取代不具統治能力而碎裂的中國，作為中國的延續。然而對天兒來說，鄉村社會就是中國本身。社會本身有斷層，有不足，但這樣的社會才是中國的本體。內藤重新定義中國的近代，來建立日本的使命；天兒則透過內於中國的再觀察，自始就無涉日本的立場。而正如天兒強調的客觀中立，其是站在中國「內部」去理解中國，也因此其並未考慮身為日本學者觀察中國的影響。如第四章所述，對於日本和中國的關係，天兒也主張在國際的觀點去觀察，將日中關係視為「普通的兩國關係」。無論是中國內部的政治社會，亦或中國外部和其他國家，包括日本的交往，天兒都主張將其「非特殊化」，也是其維持「客觀」的方式。

在方法論與研究領域上，天兒師承岡部達味、宇野重昭，重視實證研究與實地考察的研究方法，也重視非西方理論式的研究架構。而天兒和毛里出身不同、早期著重的研究也不同，但也在日中關係與亞洲共同體的概念上也找到了共通性。



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以日本學者天兒慧為主軸，整理其知識論與方法論的特色，並試圖梳理其在日本中國研究學界中的位置。由於日本和中國的地理鄰近性和兩國關係的緊密性，中國一直是日本學界關注的對象。從文學、歷史、思想到政治、經濟，日本的中國研究面向廣泛；而在政治研究的領域，也從戰爭前後受政治現實/意識形態主導的研究，漸漸轉向中立客觀的觀察。隨著學術界的發展，日本中國研究的領域和方法論多種多樣；而隨著日中兩國交流的密切，對待中國應有的態度也出現不一樣的聲音。當然，當代日本也不乏提倡日中交流、友好的學者或社會人士。但和這些人不同的是，天兒並非從宏大的政治理論、國家利益著眼，而是從自身和中國人民交流的經驗出發，強調相互理解的重要性。其著重實證資料，採取美式的區域研究方法，內涵卻是源於對中國的實地觀察。

本研究首先在第一章整理研究背景與文獻。1980年代後，日本和中國雙方資訊和人員的交流大幅增加，影響了日本的中國學界。此一時期正逢天兒初入學界，也獲得了多次到中國實地訪查的機會，大大影響了其中國研究的方向。雖然日本和中國的關係不斷變化，日本始終存在對中國的特殊意識，也成為研究中國的學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一章導論也提出本研究的問題意識：一、天兒研究的分析架構與議題觀點。二、自身經歷對分析架構的影響，以及分析架構對實際研究的影響。三、分析架構與議題觀點的特殊性。這些問題都已在第二至五章中提出回答，在此則再針對這些問題做一回顧。

壹、分析架構與議題觀點

天兒注重中國的最新時事與動態，其分析中國的架構則相對單純。在第二章中詳細介紹了天兒的分析架構，第三與第四章則分述其對當代中國不同議題的觀點。天兒提出「基層結構・系統變容模式」，強調中國自身具有的「基層結構」，

並針對基層結構下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與制度因素做一說明。這些因素都是構成「基層結構」的內涵，而這些因素則具有「斷層」的特徵。中國的社會在政治地域、政治文化階層、統治結構、經濟意識結構上有斷層，然而這些斷層的集合，就是中國社會的原貌。在這樣的分析架構下，天兒對中國的論述集中在幾個層面：毛鄧時期政治與社會關係的研究、中國的對外關係與日中關係。研究毛鄧的學者不乏其人，然而天兒的研究重心並非放在領導者本身，而是在兩人領導下，整個政治與社會的結構變動。在中國的對外關係與中國威脅論方面，也著重社會、文化因素，而非戰略觀點進行探討。

貳、中國經驗、分析架構與議題觀點的交互影響

第二章的後半段也介紹了天兒的經歷，包括在中國擔任調查員的兩年中國經驗。這樣的經驗可說是天兒中國研究的起點，對其分析架構影響甚深。正如上段所說，天兒重視的是社會、文化與歷史等層面。因此無論是中國的內政、外交亦或日中關係，研究的重心往往並非決策者或決策體系，而是這些現象背後隱涵的深層因素。這也是天兒「基層結構」的意義；無論中國的政權如何變遷、經濟如何發展、社會如何變動，在整個中國社會與中國人民的背後，有一個難以改變的「基層結構」，深深影響人們的一舉一動。這樣的基層結構，讓領導者的風格殊途同歸，讓對外政策的態度緊密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基層結構本身是「斷層」的，但實際上的作用卻是「延續」了中國。

參、分析架構與議題觀點的特殊性

基層結構的分析角度本身就是天兒中國研究的特殊之處，不過也非天兒一家之言。在第五章中，除了重新回顧「基層結構」的意義，也探討了相似的概念。日本如何擺脫中國，又如何延續？日本的知識界有選擇「裂解」中國者，亦有選擇「模糊」中國者。天兒強調中國社會的「斷層」，也強調中國的「去特殊化」。

然而天兒並非在地理上裂解中國，而是在垂直的角度上探討中國的多樣性；去特殊化也並非是抽離、模糊中國的手段，而是內於中國的理解。另外，天兒師承岡部達味、宇野重昭，在方法論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重視實證研究、實地考察，注重中國的「內在」觀點。而毛里和子同樣以美式區域研究方法觀察中國，也著重亞洲學研究，和天兒同樣以宏觀角度觀看中國。

天兒觀察中國強調客觀、中立的角度，但其理論建構實際上出於自身經驗的體悟。國家社會的特性或民族性，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經常被視為主觀因素，天兒卻主張將這些因素理論化，作為分析國家時的客觀因素。其強調中國社會的多樣性與斷層性，一方面雖然認為這是中國社會的「特殊」之處，一方面也認為這是在眾多不同社會特性中的一種類型，只是中國的「基層結構」和他國不同，需要重視但並不需要將其特殊化。天兒認為中國的社會是「重斷層社會」，在多種不同的層面上都具有差距、斷層，但這種斷層都是垂直的，而非在橫向上、地域上的斷層。雖然「重斷層社會」也提到「農村和都市」的斷層，但強調的是在這之下的不同社會、其中人民的不同態度，並非在地理上區分特地的地區、省分或城市。另一方面，天兒（1994：44）雖然強調中國的基層結構主要是探討中國的政治社會論，所以只關注政治社會層面。但其論述實際上即預設社會特性是影響政治的主要原因，因此著重探討社會特性與民族性，忽略經濟等其他因素。也因此，常見的「貧富差距」斷層並不在天兒的「重斷層社會」探討之列，只有「農村和都市」斷層隱含部分的經濟差距概念。

天兒的研究重心為當代中國，對中國的最新動向十分關注，也經常對時事做出評論。秉持著客觀中立的態度，論述間避免帶入自身的情感，而盡量從事實進行評析。然而，無論實證研究或中立客觀，本身都是「方法論」的一種；研究者在進行研究之時，本來就無法完全排除自身的立場。中立客觀的研究，本身可能

隱藏著研究者本身也未察覺的主觀意識。本研究並非要對方法論進行批判或否定，而是希望透過對單一學者的深入分析，提出另一種看法與可能性。另一方面，天兒注重時事，和歷史學、文學等出身的中國學家不同，以資料、實證分析，而非思想論上見長。由於訴求的不同，天兒的理論較淺顯易懂，但這並不能磨煞其觀點的重要性。本研究透過對其理論與觀點的分析，也嘗試呈現其研究的價值。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 山田伸吾，2005，〈內藤湖南與辛亥革命—另一個近代〉，內藤湖南研究會編著；馬彪等譯，《內藤湖南的世界：亞洲再生的思想》，西安市：三秦出版社，頁108-148。
- 山根幸夫編，田人隆、黃正建等譯，2000，《中國史研究入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譯自1991-1995，《中国史研究入門》，東京都：山川出版社。
- 天兒慧著，范力譯，2006a，《日本人眼裡的中國》，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譯自2003，《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東京都：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 天兒慧著，劉靜貞譯，1994，《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台北市：月旦出版社。譯自1992，《中国—溶変する社会主義大国》，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會。
- 毛里和子，徐顯芬，2009，《中日關係—從戰後走向新時代》，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譯自2006，《日中關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東京都：岩波書店。
- 孔健著，1992，《中国人からみた日本人》，東京都：學生社。轉引自天兒慧《日本人眼裡的中國》，頁84。
- 石之瑜，2007，〈前言：退出中國—近代日本對華思想中的普遍性方法與政治正確性問題〉，《中國大陸研究》，50(1)：1-8。
- 石之瑜、李靜旻，2007，〈斷代與斷裂——日本近代中國認識的基礎脈絡〉，《中國大陸研究》，50(1)：9-28。
- 石之瑜著，2008，《日本近代性與中國：在世界現身的主體策略》，臺北市：國立編譯館。

- 石之瑜、黃佳甯，2009，《不是東方：日本中國認識中的自我與歐洲性》，臺北市：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石之瑜等編，2011，《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口述知識史》，臺北市：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石原忠浩，1997，〈戰後「中」日經濟與政治互動關係〉，《問題與研究》，36(5)：33-55。
- 吉尾寬，2005，〈內藤湖南的中國共和制論〉，內藤湖南研究會編著；馬彪等譯，《內藤湖南的世界：亞洲再生的思想》，西安市：三秦出版社，頁 157-182。
- 何思慎著，2008《敵乎?友乎?: 冷戰後日本對華外交思路的探索》，臺北市：致良出版社。
- 邵軒磊著，2009，《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臺北市：國立臺大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何培忠，2004，〈日本中國學研究考察記（三）—訪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毛里和子教授〉，《國外社會科學》，4：57-60。
- 何培忠編，2006，《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慶，2002，《日本漢學史 1：起源和確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金觀濤，劉青峰，2000，《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夏冰著，1997，《日本如何面對中國》，香港：明鏡出版社。
- 孫隆基，2004，《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宮崎正弘著，譯者不詳，1995?，《中國大分裂—襲擊日本的恐怖衝擊波》，臺北縣：鑽石人生。譯自 1995，《中国大分裂—日本を襲う恐怖の衝撃波》，東京都：ネスコ。
- 陳綺齡、邵軒磊著，2011，《加美光行的中國認識及其學思歷程》，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陳鵬仁著，1999，《近代中日關係史論集》，臺北市：五南出版社。
- 章家敦（Gordon G. Chang）著，侯思嘉、閻紀宇譯，2002，《中國即將崩潰》，臺北市：雅言文化出版社。譯自 2001，*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New York：Random House。
- 莊雅涵著，2008，《如何正常，怎樣國家？：走進石原慎太郎的國族敘事》，臺北市：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曾倚萃，2008，《溝口雄三的中國方法：超克亞洲的知識脈絡》，臺北市：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溝口雄三著，林右崇譯，1999，《做為「方法」的中國》，臺北市：國立編譯館。譯自 1989，《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都：東京大學出版會。
- 潘乃德（Benedict Ruth）著，黃道琳譯，2007，《菊花與劍：日本民族的文化模式》，台北市：桂冠圖書。譯自 194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劉正，2009，《京都學派》，北京市：中華書局。
- 劉智瑋著，2008，《拒絕中華思想：論中嶋嶺雄的中國觀與台灣敘事》，臺北市：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 學仕，2011，〈毛里和子：日本漢學大師〉，《中外文化交流》，11：50-53。
- 錢婉約著，2004，《內藤湖南研究》，北京市：中華書局。
- 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1999，《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譯自 1990，《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都：東京大學出版會。

貳、英文部分

- Ash Robert, David Shambaugh, Seiichiro Takagi eds., 2007. *China Watching: Perspectives from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arish William L. & Martin King Whyte, 1978.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ownsend James R., 1986. *Politics in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参、日文部分

Weber Max 著，木全徳雄譯，1971，《儒教と道教》，東京都：創文社。譯自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轉引自天兒慧《日本人眼裡的中國》，頁 84。

千石保、丁謙著，1993，《中国人の価値観—変わりゆく社会意識とライフスタイ

ル》，サイマル出版会。轉引自天兒慧《日本人眼裡的中國》，頁 85。

天兒慧著，1984，《中国革命と基層幹部—内戦期の政治動態》，東京都：研文出版。

天兒慧著，1987，《文化大革命への問い:北京で読む日本の文革論》，《季刊中国研

究》，113-138。

天兒慧著，1988，《中国改革最前線》，東京都：岩波書店。

天兒慧著，1989，《彷徨する中国》，東京都：朝日新聞社。

天兒慧、加藤千洋著，1990a，《中国大陸をゆく》，東京都：岩波書店。

天兒慧著，1990b，《中国近代化の調査記録》，東京都：研文出版。

天兒慧著，1992，《日中国交正常化20周年の回顧と展望》，中国研究所（編），

《中国年鑑 1992 年版》，東京都：大修館書店，頁 34-38。

天兒慧著，1992，《歴史としての鄧小平時代》，東京都：東方書店。

天兒慧著，1996，《鄧小平—「富強中国」への模索》，東京都：岩波書店。

天兒慧編著，1997a，《中国の21世紀》，東京:東洋経済新報。

天兒慧編著，1997b，《中国は脅威か》，東京：勁草書房。

天兒慧著，1998，《現代中国—移行期の政治社会》，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

天兒慧著，1998，《日中交流の四半世紀》，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

- 天兒慧編，2000，《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4－政治－中央と地方の構図》，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
- 天兒慧著，2000，〈政治体制の構造的変容〉，毛里和子（編），《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1－大国中国への視座》，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頁15-50。
- 天兒慧著，2003，《等身大の中国》，東京：勁草書房。
- 天兒慧著，2004，《巨龍の胎動－毛沢東 vs 鄧小平》，東京都：講談社。
- 天兒慧，2004，〈日中外交比較から見た日中関係〉，毛里和子，張蘊嶺編，《日中関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東京都：岩波書店，頁25-53。
- 天兒慧著，2005，〈新世紀日中関係新思維的建構〉，《太平洋學報》，8：50-60。
- 天兒慧著，2006b，《中国・アジア・日本－大国化する「巨竜」は脅威か》，東京都：筑摩書房。
- 天兒慧著，2009，《日本再生の戦略》，東京都：講談社。
- 天兒慧，三船恵美編著，2010，《膨張する中国の対外関係》，東京：勁草書房。
- 中嶋嶺雄著，1989，《中国の悲劇》，東京都：講談社。
- 毛里和子，1989，〈政治体制の特徴とその改革〉，野村浩一（編），《現代中国の政治世界》，東京都：岩波書店，頁55-94。
- 毛里和子，1990，〈毛沢東時代の中国政治〉，毛里和子（編），《毛沢東時代の中国》，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頁1-32。
- 毛里和子編，2000，《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1－大国中国への視座》，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
- 毛里和子，2004，〈新たな日中関係を構築する「新思考」のために〉，毛里和子，張蘊嶺編，《日中関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東京都：岩波書店，頁217-238。
- 宇野重昭，1989，〈静かな社会変動〉，宇野重昭責任編集；野村浩一等編，《静かな社会変動》，東京都：岩波書店，頁1-31。
- 宇野重昭，1994，〈近現代中国史における国際契機と内発的発展論〉，宇野重昭，

- 天児慧編，《20世紀の中国：政治変動と国際契機》，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1-8。
- 宇野重昭，2008，〈日中関係の展望、そしてアメリカー日本の行き方と中国〉，宇野重昭，唐燕霞編，《転機に立つ日中関係とアメリカ》，東京都：国際書院，頁 207-231。
- 岡部達味，1991，〈改革と中国の外交思想〉，岡部達味，毛里和子編，《改革・開放時代の中国》，東京都：日本国際問題研究社，頁 39-62。
- 岡部達味著，2002，《中国の対外戦略》，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
- 茅原郁生編著，2001，《中国は何處に向かう：その中期展望と対中戦略提言》，東京都：蒼蒼社。
- 宮崎正弘著，2009，《中国分裂七つの理由》，東京：阪急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
- 菱田雅晴，1989，〈現代中国における社会移動〉，宇野重昭等（編），《現代中国 第3巻 静かな社会変動》，東京：岩波書店。
- 園田茂人著，1949，《中国経済の社会態制》，東京都：東洋経済新報社
- 園田茂人著，2001，《中国人の心理と行動》，日本放送出版協会。轉引自天児慧《日本人眼裡的中國》，頁 85。

附録一：天兒慧簡介資料

壹、年表

- 1947年 岡山県に生まれる
1971年 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卒業
1974年 東京都立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修士課程修了
1981年 一橋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
1982年4月 琉球大学助教授
1986年2月から1988年2月まで外務省嘱託専門調査員を兼任
1986年 一橋大学より社会学博士の学位を取得。
1989年 第1回アジア・太平洋賞特別賞を受賞。
1990年4月 共立女子大学国際文化学部助教授
1993年4月 共立女子大学国際文化学部教授
1994年 青山学院大学国際政治経済学部教授（2002年3月）
1999年から2001年までアジア政経学会理事長
1999年（4-9月） アメリカン大学客員教授
2002年4月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教授
2006年10月～2008年9月 同研究科長兼アジア太平洋研究センター所長
2007年～ 早稲田大学グローバルCOEプログラム「アジア地域統合のための世界的人材育成拠点（GIARI）」拠点リーダー
2008年4月 朝日新聞社書評委員に就任
2010年～ 人間文化機構現代中国地域研究幹事拠点拠点幹事長（早稲田大学アジア研究機構現代中国研究所所長）

貳、著作

書名	発行者	年分
現代中国政治変動序説	アジア政経学会	1984
中国革命と基層幹部――内戦期の政治動態	研文出版	1984
中国改革最前線――鄧小平政治のゆくえ	岩波書店〔岩波新書〕	1988
彷徨する中国	朝日新聞社	1989
中国大陸をゆく――近代化の素顔	岩波書店〔岩波新書〕	1990
中国近代化の調査記録	研文出版	1990
中国――溶変する社会主義大国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2
歴史としての鄧小平時代	東方書店	1992

ニュー・エンペラー――毛沢東と鄧小平の中国	福武書店	1993
日本の国際主義――20世紀史への問い	国際書院	1995
原典中国現代史	岩波書店	1995
20世紀の中国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6
鄧小平――「富強中国」への模索	岩波書店	1996
中国の21世紀	東洋経済新報社	1997
中国は脅威か	勁草書房	1997
現代中国――移行期の政治社会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8
アジアの21世紀――歴史的転換の位相	紀伊國屋書店	1998
中華人民共和国史	岩波書店	1998
岩波現代中国事典	岩波書店	1999
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1 大国中国への視座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0年2月
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4) 政治――中央と地方の構図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0年4月
アクセス国際関係論	日本経済評論社	2000
深層の中国社会――農村と地方の構造的変動	勁草書房	2000
中国史5	山川出版社	2002年6月
等身大の中国	勁草書房	2003年1月
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2003年10月
中国の歴史(11) 巨龍の胎動――毛沢東 vs 鄧小平	講談社	2004
日中関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 アジアの共生と協力をめざして	岩波書店	2004
日中関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 アジアの共生と協力をめざして 天児慧[等著] 毛里和子,張蘊嶺編	岩波書店	2004
中国・アジア・日本――大国化する「巨龍」は脅威か	筑摩書房〔ちくま新書〕	2006年10月
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1) 新たな地域形成	岩波書店	2007
中国外交の新思考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7
世界政治叢書(8) 中国・台湾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08
日本再生の戦略	講談社〔講談社現代新〕	2009

	書]	
アジア連合への道 理論と人材育成の 構想	筑摩書房	2010
膨張する中国の対外関係：パクス・シ ニカと周辺国	勁草書房	2010



附録二：天兒慧訪談稿

天兒慧先生インタビュー

時間・場所：2010.11.13・早稲田大学

訪談人：曾采薇（ソウ サイミ、台湾大学）、邵軒磊（ショウ ケンライ、台湾大学）

整理者：鈴木恵可（師範大学）、邵軒磊（ショウ ケンライ、台湾大学）

注意書き

- ・ 原則として発言者ごとに改行し、簡単な応答・笑いなどは（）内に収めた。
〈例〉天兒先生＝天：、インタビュアー＝イ：、全員＝（一同：笑い）
- ・ 中国語での発言部分は台湾繁体字で打ち込み、**太字**であらわした。

2010年12月9日

00'00"

インタビュアー：先生の成長された背景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すか？

天兒先生：ぼくは岡山、岡山縣、出身なんです。それでねえ、日本本州の西部に中国山脈があり、そのふもとで生まれた。**1947年**出生的、很久了（一同：笑い）。そこは農村の社会、**農村地區不是城市**です。ぼくの家はお寺なんですよ。寺、（イ：寺廟。）寺廟、廟っていうのかなあ。

イ：金持ちだ（一同：笑い）。

天：日本のお寺は中国…台湾とは違いますよ（一同：笑い）。**不一樣**的。小さな寺で。

イ：仏教の…？

天：そう日本仏教の、親鸞って知ってるかな？（イ：親鸞…？）親鸞の宗派。だけど、ぼくはぜんぜん宗教心ないですよ。**宗教心、沒有**。ぼくは男…で、兄弟はみんな女。ですからー、ほんとうはぼくが跡をつがなければいけなかったんだけど。ぼくの父親は中学校、小学校の先生していた。**教員。中學、小學の、教員。**

母親も…**教員**。だからまあ教育は…すごく、熱心な家庭で。4人の姉妹がいて…みんな大学まで行った。ぼくは小学校の後半かな、**三四年級以後**、野球が大好きだったんですよ。**打棒球**ですよ。**打棒球**。（先生が手を振って、イ：小心。すごい若い。）これ、ぼくの**六十歳**の…**六十歳**はなんて言うの？日本では還暦って言う…。（イ：還暦。）還暦って言う？

イ：いや、中国語ではないですか、**還暦**…。

天：中国語では、**還暦**。

イ：**比較少、很久以前の**…。古典的なイメージ。すごい昔。

天：これは還暦のときの。神宮球場でやった。

イ：ピッチャー。

天：ピッチャーです。だけど、昔はほんとはそうじゃないですよ。ぼくは小学校、中学校、ずっとセカンド、二塁手。二壘。(イ：二壘。)それでね、少年のころは野球をすごくやったんですよ。勉強はあまりしなかった(一同：笑い)。もう、ほんとに野球ばかり…。あの、そうだ、そこらへんに本があるんだよ、ぼくの本のなかにね、『日本再生の戦略』を出して)野球の話がずーっと書いてある。これ一部…これ余分があつたらあげたいけどないなあ。ぼくの生き方みたいなものが書いてあるの。「わたしを作った野球への愛」(一同：笑い)。野球に夢中になったんですよ、ほんとに。小学校時代、中学校とか高校時代。毎日毎日野球をやった。だから、野球のほうかほんとうにぼくにとっては大きい。すごく大きい。いまでもそうだよ。野球っていうのはね、なにがすごいかっていうと、もちろん体力もつくよね。だからこの歳になつてもまだ若くいられるのは、やっぱあのころからずーっと体鍛えている。その、体を…維持することを覚えているんだね。それからもちろん勉強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つて思う。でも野球がすごく好きだから、野球もやりたい。そこでどうやって時間を上手に使うか、いろいろ工夫をするようになる。時間を効果的に使う訓練をいつのまにか身につけたのだと思う。それからもともとぼくは、性格は負けず嫌いだと思います…負けず嫌いつてなんて言うの？

イ：不服輸。

天：負けず嫌いなんだけど。野球がよけい刺激して…ぼくを負けず嫌いにさせた。ぼくは身体は小さい、運動神経もそんなに優れていない。ハンディがあるわけだよ、スポーツ選手として。だからもともと大きな人、うまい人にいつもにいつもチャレンジする。そういう自分を作った。だから、ぼくは野球がなかったら、学者になれなかった。これは矛盾しているようだけど、ほんとうなんですよ。勉強ばかりしている人間は、そんなに大したひとにならない。自分のことと言うのは変だけれど、大きく育つためには、やっぱり、あることしかできないひとはだめなんですよ。他のことをも一生懸命できる。そういう人がやっぱり、大きく育つ。勉強は、ぼくは成績がすごく悪かったですよ。君ら信じないだろうけど。君らみたいな、台湾大学とかね、**政治大學**とかね、そんな優秀な大学じゃないから。ぼくはもう、早稲田大学の教育学部。いまは難しいけれど、早稲田は。昔はけっこう入りやすかったですよ。

イ：謙遜…。

天：いやいや、謙遜じゃなくて。ぼくはそこに1年浪人して入った。1年浪人して。

イ：ほんとう、うそ、知らなかった…。

天：学部にあえ…まともにストレートに入れてないんだよ。

イ：秘密だって（一同：笑い）。

天：秘密じゃないって（一同：笑い）。

ぼくは大学に入学してやはり野球部に入ることを決心した。1年の秋の早慶戦の少し前まで早稲田の野球部員だったんです。だから斎藤佑樹の先輩だな（一同：笑い）。この自分の研究室（早大西早稲田ビル6階）から真下に見える一帯がまさに野球部の練習場だった。「運命の糸」が僕をここへ導いてくれたのかな。安部球場と呼ばれていた。安部磯雄という、明治時代の早稲田の教授で、キリスト教社会民主主義者で、たいへん有名で立派な先生でした。この方が早稲田野球部の第一期黄金時代を築く上で大変な功労者でした。その功労を讃えて安部球場と名付けられたのです。私が学生だった頃の野球部は軍隊のような世界で、ある時から先輩のいじめにあうようになり、最後はけんかになって、それで野球を辞めました。でも悔しくて東京6大学の別の大学、具体的には東大に入ろうと、親に内緒で秋の終わりごろからもう一度受験勉強して頑張ったけど、またまた失敗。結局早稲田に戻って、でも何をしたいのか気持ちが入らなくて、NHKやチェコ大使館でアルバイトをしたり、道路工事現場でアルバイトをしたり、いろんなことしてた。ひとりで東京から700キロ離れた郷里の岡山に中古の自転車で1週間ほぼ無銭旅行で帰ったり、後で話すが3年、4年はほとんど大学紛争の中で過ごし、まともな勉強はしてない。ほんとに（一同：笑い）。

卒業の時期が近付くにつれて、高校の先生になろうかという思いが強くなった。でも教育学部にいながら「教職科目」は一つもとっていない。しかも卒業は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が、岡山の田舎には帰りたくない。家に帰ると、親父が寺の後を継げと強く迫るから。そこでいい手を考えた。大学院に行くことです。大学院に行けば当時「高校一級教員免許」が取れる。親もそうなら仕方がないと諦め文句を言わない。そこでまた浪人して大学院をチャレンジすることにしました。

えっと、ここにあるかなあ。あのね、『宝島』の別冊（1998年）で「学問の鉄人」という特集があった。ようするにいろいろな先生・研究者を対象にアンケート調査して、それでたとえば、「アジア研究ベストテン・ランキング」というのがあったんだよ。ぼくがね、なんか、得票が高くてね。5位くらいに入ってたのかなあ。東大の先生がほとんどで。ぼくは当時は青山学院大学の、**青山學院的教授**でした。その本の中で自分がインタビューを受けている記事がありました。インタビューのタイトルが「浪人の神様」（一同：笑い）。

で一、ほんとぼくは浪人したんです。大学の学部に入るのに浪人、修士課程にも浪人して1年、博士課程にも浪人して、就職するのに3年浪人した。6年浪人。これは、ほんとに。ぼくは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しぶといんだろうな。『日本再生の戦略』（講談社現代新書、2009年）の中に書いてある。

「私は大学教員の募集にチャレンジして全国旅行をした」って（一同：笑い）。教員になれないの（一同：笑い）。コネがないから。学界で評価を受けてるけど。ぼくは、なかなか先生になれないの。それで…公募の試験を応募するわけだよ、そうすると落ちるわけだよ。で、北は北海道、南は沖縄まで、「教員募集」に応募し続けてきた。最後に琉球大学、琉球大學にようやくひっかかったの。だから教員公募試験で、全国旅行をした（一同：笑い）。いや実際に行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よ。書類のうえでね。

イ：その琉球大学の期間は、どのくらいですか。

天：えっと8年半、八年半だな。1982年…2年間は専門調査員で北京の大使館に、2年間ちょっと。それを入れてだけどね。琉球はおもしろかった。どこでもおもしろかった。琉球はもう学生が可愛くて。ぼくもあそこ若かったからね。一緒に遊んでた。お酒とカラオケ、野球と。そういうこと。

10'20"

イ：中国研究の契機は？

天：中国研究、ぼくはね、実は歴史が好きで、えっと一、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地理歴史専修に入ってたんだよ。だけど当時のぼくはね、近代ヨーロッパ史を勉強したかったね。とくにドイツとフランス関係の、ビスマルクって知ってるかな？ビスマルク外交をテーマにしていた。フランスの近代史の先生のところに行ったの。中国語もできないし、中国に当時はあんまり関心がなかった。それが、ぼくの学生時代、やっぱり時代っていうのが人間に影響するなあと思うんだけど、その一、ぼくが学部に入学した1960年代後半、そのころは、あの一、君ら知らんだろうけど、アメリカが軍事介入したベトナム戦争がすごかったんですよ。

イ：60年代の…。

天：終り。ぼくは67年に早稲田の学生になった。66年は東京で浪人してたんだな。そのころに、ベトナム戦争。それから中国の文化大革命。それから…沖縄がまだ日本に返還されてない時の沖縄返還運動が盛り上がっていた。ぼくは69年の3月に沖縄にパスポートで行った。

イ：ビザは…。

天：ビザはあるんだよ。（イ：いる。）遅れた地域だからって、予防注射をいっぱい打って。それでむこう行ったらドルだよ。だからそれでね、とくに沖縄の経験はある意味で僕のアジア研究の視座をはぐくむ上で大きかったね、日本（本土）っていうのはナショナリズムを叫ぶと、戦後の日本のなかでは右翼って考えられていた。ところが沖縄に行く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って、そうでない意味もあると思い始めた。古い天皇制国家を支えるイデオロギーとしてしか考えなかった。それが沖縄に行くとき…「健全」なんですよ、ナショナリズムが。沖縄に、復帰したいと、日の丸を掲げ…

今だったら日の丸だれでも不思議でないけれど。昔は日の丸を掲げるひとは、なんとなくね、右のひと、右翼のひとって感じ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に戦後日本の民主主義っていうのは、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ころとちよつと左がかつたところがあつて。だからあんまりいいイメージを持たれてなかつた。でも沖縄に行ったら、日の丸掲げながら、反戦、ね、戦争反対、そして平和を守ろうと叫ぶ。日本の平和憲法っていうかたちがあるわけだよ。ああ、日の丸の旗を振りながら反戦、平和を叫ぶ、これも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と思つたわけです。だから、ナショナリズムについてもっと興味がわいて行つた。…それで、次第に中国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に関心が向かい、まず孫文を勉強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ぼくの学部の論文は「孫文から五四運動」を対象に、中国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をテーマに書いたのです。たぶん沖縄の経験がぼくの意識のなかにあつたのだと思います。話は少し戻りますが、大学2年の最後の春休みに1カ月近く放浪していた沖縄から戻ってきてベトナム戦争、嘉手納基地周辺の実情などを日本に報告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う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す。

14'30"

イ：ちなみに、60年代末…とくに69年から早稲田に、激しい学生運動があつたころの、先生の経験を…。

天：ぼくは、ほんとは上手に大学を追い出されたようなものです(一同：笑い)。まあ、振り返るとおもしろい人生だなあ。先ほど話した沖縄に行って帰って来てから、大学で「沖縄報告」をしようとした。はじめて…自分で沖縄の写真集や報告書を作って、それから…、そこみえる教育学部の建物16号館ね、そこでやる日、1968年4月26日かな。過激派学生が入って、大学を占拠するという噂が流れて、それで大学側がロックアウトしてしまつた。ぼくらみたいな普通の学生は、なんも知らなかつた。ぼくはある教室を借りて正式に、沖縄報告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ら、入れなくなつちやつて。それで大学側にね、これはおかしいって抗議を始め出して、それから学生運動に関わり始めた。だからぼくはまあ、一般学生として関わつたけど…結構目立つ存在になつてしまつた。69年、70年です。ほとんどまともに1年間やつた授業はなかつた。

イ：東大と同じ…(天：そうそうそう。)感じ…?

天：東大は国立だから。(イ：はい。)早稲田は私立だから。入学生を入れなきゃ、収入が入らないでしょ。だからみんな出してくれたんです。勉強しなくても(一同：笑い)。それで、レポートだけ書いて。授業はもうぜんぜんないわけ。レポートだけ提出して、それで単位をもらつて、卒業できた。そういう時代だつた。だから、ぼくは勉強ほんとにしてないってのは、ほんとにそうなの。みんな友達を書いてくれたから。レポートは。

イ：そのときは、中国からとくに毛沢東主義が、(天：そうそうそう。) 影響が…やっぱり強かった…？

天：早稲田も、すごく強かった。だから、政経学部には二人中国関係の先生がいて、わりと有名な先生。その人たちが、もう毛沢東主義者になっちゃって(イ：笑い)。ほんとに。それで、ひとは大学を辞めて、ヤマギシ会っていう自然主義の生きかたを重視する会に入ってしまった。それでもう、農村で自給自足生活を始めたひとがいるとか、ほんとにあの時代っていうのは、ものすごく…激動の時代だった。それで、ぼくはそこから中国に少しずつ関わるようになった。中国というかアジアにね。卒業論文は、ぼくの先生はフランス近代史の専門家で、僕も独仏関係史を勉強していたのだけれど、学生運動以降に、僕がアジア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を研究したいと言ったら認めてくれました。そのときであった学部長が人間としてすごい人ですよ。ぼくはこの人に人を見る目を教えられた。ぼくらの最大の戦いの相手はその学部長だったのですよ。生意気だと思うけどね、そのころ彼と闘ったんですよ。

イ：思い出す先生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天：そしたらその先生がね、先ほど触れた指導教授の先生が卒業論文を書き終えてそれを持って先生のところに会いに行った時、私のこういう話をしてくれた。「天児君、君は学部長の——竹内という名前の方だけれど——、竹内先生に感謝しなきゃあいかんよって」。「え、どうしてですか」って尋ねると、「竹内先生がある時私のところにわざわざ来て、天児君を長い目で見てあげて下さいとおっしゃられた」と答えてくれた。私はその一言を聞いて、愕然としてしまった。「敵」だと思っていた人が、実は私を大きく見守ってくださっていたのだから。まるで自分はお釈迦様の手のひらで暴れていた孫悟空のようだった。学部長は敵だったんですよ。その人が実は僕らを守ってくれたんです。すご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せんか。竹内先生のおかげでぼくは早稲田を卒業できたし、こんな素晴らしい先生がいる早稲田を心から好きになれた。孫悟空が、(イ：孫悟空。) 暴れまくって。それで俺はすごいぞって、釈迦なんかだめだ一つとか言って、あとで気がついたら、ただ釈迦の手のひらで暴れていただけだった。ぼくは本当に自分がただの孫悟空で、竹内先生という釈迦の手のひらで暴れていただけだったと思った。その後、指導教授が広島大学の方に移られ、竹内先生が大学院に行くときなど…ずーと僕を支えてくれたのです。(イ：竹内好でしょうか。) ぜんぜん違う。別のひと。竹内っていう名前は色々あるからね。(イ：そうですね。) そのひとは地理学の先生。竹内好は有名な中国思想家。(イ：そうですね。)

だから、ぼくが竹内先生に教えられたのは、ひとはイデオロギー、立場

だけで判断しちゃいかん。自分の考えと違うひとでも、そのひとそのひとのいいところはきちつと見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れは評価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ぼくが教員になって持つようになった教育姿勢の基本はこの時の経験によって築かれたと思う。これは台湾から来た学生にだって、大陸中国から来た学生にだって、同じ姿勢だということです。日本人にも同じような態度で関わる。そしてまずその人が主張することを聞く耳を持つ。頭からダメだとは言わない。そして若いとか、自分と考えが違うとか言って相手を排除しない。ぼくはいつも学問は自由だ、表現は自由だ、学問を政治の従属物にしてはいかんって言う。そういう姿勢は、やっぱりその竹内先生の姿勢から習ったな。だからぼくはその先生のおかげで、早稲田の時代は、勉強はしなかったけれど、人間としての勉強はものすごくした。それから、やっぱりいろんな経験をしたことが、自分の発想、考え方をすごく豊かにしてくれた。これから中国の話をしてますが、中国って言ったときに中国のことだけを考えるのでは中国および中国に関わるいろんなものを見てる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う。だからこそ中国自体を考えるときに、自分なりの目を見て、ほかの人とはちょっと違うかもしれない、自分なりにこうだっていうものが、つかめるん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がやはり、学生時代あるいはまあ野球などの経験ってのが大きいなあって思うよ。

現代中国を本気で研究しようと思うようになったのは、大学院受験浪人の頃(1971年)かな。1972年に東京都立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の修士課程に入学できた。

25'40"

イ：日中の外交関係を変化の年です。国交正常化でしょう。

天：台湾とは国交が無くなった年です。その年はニクソン…訪中ね。だから72年っていうのは中国にとって非常に、動いた時期ですよ。それで、もう中国の情報も入って来たし。やっぱり中国を勉強しよう。ぼくが本気で中国を勉強しようと思った理由の1つは文革です。当時の多くの情報が文化大革命って素晴らしい、毛沢東が正しい革命を行っているというものだった。つまり、ソ連はもう…墮落した、ソ連型社会主義はもうダメだ、それにアメリカはもちろん金持ちの国で、腐敗と貧困がはびこっていた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わけだよね。そういうなかで貧しくても、ひとのために、平等な社会を作ろうって、毛沢東は言っていたわけだよ。それでみんな、日本の多くの新聞なんかも毛沢東を賛美し、高く評価している。文化大革命も高く評価されていた時代だったんですよ。(イ：そうですね。) そういう時代だった。

イ：とくに安藤彦太郎先生…。

天：安藤さんも有名な中国研究者だった。(イ：そうですね。) 新島淳良とか。君よく知ってるなあ。(イ：はい、はい。) で、早稲田にね、新島淳良さん

というのがようするに大学をやめてヤマギシ会に入った人です。毛沢東を神のように崇めたすごい毛沢東主義者だよ。でも最後は「毛沢東に裏切られた」と思うようになった。それでぼくはどうだったのか、みなさんが毛を神格化していた、そういう雰囲気の中に、「なんで、毛沢東だって人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意識があった。(イ：神ですよ。) いや、毛沢東は、もうあやまちのない、神のような存在に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よ。中国のなかではもちろんそう言われていたけど、日本のなかでもそういうひとたちがけっこうね、とくに中国研究をするひとたちのなかでいるわけだよ。有名な小さい手帳みたいな赤い本をふって…(イ：毛語録)。ああいう雰囲気が…たぶん中国を研究するひとたち強かった。ぼくはやっぱ毛沢東はすごいとは思いますが、毛沢東だって人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気持ちがあった。

イ：最初から？

天：そう、そういう意識はあった。人間じゃないかって。この感性が実は中国をできるだけ客観的な対象として見ようとする姿勢につながるのですよ。何故そう思うようになったのか。自分の自我の強さもあるとは思いますが、同時に当時読んだある本が大事なヒントになった。つまり、それはね、エドガー・スノーというアメリカのジャーナリストが、**抗日戦争**、1935年頃に、**延安**、当時の共産党の根拠地、革命の聖地に入るわけだよ。で、毛沢東とか中国のリーダーに長いインタビューを行い、ルポルタージュとしてまとめた『中国の赤い星』、**Red Star Over China** を読んだんだよ。けっこう、おもしろいんですよ。それは毛沢東について書いているところで、毛沢東は素直に若い青年のころに、自分は、無政府主義者であり、モンロー主義者——アメリカのモンロー大統領がとった孤立主義の外交で、その後のアメリカの代表的な国際戦略となった——だったと言っている。彼は郷里の湖南省で、五四運動の時、**湖南独立運動**をしているひとですよ。1915年～18年のころです。ぼくはその頃の毛沢東の書いたものを読んで、すごく印象深かったことを強く覚えています。毛沢東ってほんとうに思想的に模索し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神様なんていうのはおかしいっていうのが俺のなかにはあるわけだよ。そういう感性っていうのは、研究をするうえではやっぱり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あることを思い込むんじゃなくて、自分の中に自分でクエスチョンを作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そのような感性がイデオロギー性が極めて濃厚であったあの頃の中国研究の雰囲気の中で、最初から僕自身のなかに生まれていたのは今から思えばきわめて大きな意味があった。それで、僕の修士の論文は「毛沢東研究」となった。で、ちょうどそのころ運よく、毛沢東の原本が中国語版で出版されたんですよ。『**毛澤東選集**』というのは当時は全4巻で中華人民共和国ができたあとに出版されます。**劉少奇**がその編集委員長で、毛沢東の20年代30年代40年代に書いたものを全部チェックして、それで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的じゃ

ない主張、国民党との関係で共産党にとって都合の悪い箇所、これらを全部削除している。それから、内容も部分的に修正するわけよ。毛沢東思想ってというのは、完成された、体系的な理論として書き直すんですよ。それをわれわれはいつも見てるわけですよ。毛沢東が改定したものを。ところが毛沢東がその当時書いたものが、竹内実先生、竹内好さんでなくてね、竹内実元京都大学教授を中心として、集め編集したのです。台湾に資料がすごくあつたりしてるんですよ。台湾とか香港から。それを全12巻の『毛澤東集』として日本で出版しました。ぼくはそれを手に入れて、読み始めた。そうすると、毛沢東の非常にリアルな、つまりきれいに体系化されて、お化粧した毛沢東じゃなくて、本物の毛沢東の考え方が出ている。それと、現実の当時の農村の運動を、ま、とくに新聞を利用して描き、毛沢東の生の考え方と関連付ける試みをした。あのころマイクロリーダーで少し手に入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れを例えば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に行って、農村根拠地の実情を調べて、あるいは台湾の「陳誠コレクション」と言われる1930年代の共産党根拠地の資料を集めたコレクションを利用し、それと毛沢東の生の原文を読んで、それで「毛沢東の独特な実践的な思想」をダイナミックに描こうとしたのが修士論文です。ぼくの大学院修士課程の指導教授は、いまもう大学の名前が変わって首都大学になったんだけど、昔の東京都立大学の岡部達味っていう先生でした。岡部達味先生はものすごい理論家であると同時に実証主義者なんだよ。だからもうきちっと証明すること、理論的にも、事実としても証明することを厳しく要求する人だった。本当に学問的には妥協を許さず、怖かった。

それから中国を研究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なにがおもしろいかっていうとね。道が…なかなか分かんないんだよね。分からない部分があるんですよ、中国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ても、やっても分かんない。まあ、その、巨大なやつぱり山だよね。こう、一生懸命上がろうとするんだけど…森のなかに入ってたたら、一生懸命上がっているようだけど、どこに自分がいるか分かんなくなる。なんかそれがおもしろい。つねに新しい話題をまた作ってくれるしね。ぼく、72年から今まで中国の研究でなにをテーマにしようかといつて、困ったことなんかないですよ。もういつもテーマがあるんだよ、中国は。いつもテーマをくれるんだよね。だから、まあそれだけたいへんな国なんだけども。

35'20"

イ：最初、先生の中国研究の考え方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したか？

天：中国を勉強し始めて、そのころ、毛沢東を研究しようとした。アメリカの中国政治研究は主にエリート研究なんですよ、基本的に。中国で出されたものを読むと、毛沢東がみんな正義で、毛沢東に対抗したひとはみんな悪

になるわけだよね。だから**劉少奇**は毛沢東と一緒に活動していましたが、文化大革命で毛沢東に批判され失脚。するともう**劉少奇**は全部だめになる、生まれた時から「悪玉」のような存在におとしめられる。**劉少奇**を倒した**林彪**が文革期には英雄になるけども、これもやがて「毛沢東暗殺計画」をたくらんだとして失脚し、「悪玉」になるわけでしょ。さらに**林彪**をやっつけた**四人幫**が…これもだめになる。で、**鄧小平**は文革のころずっと「悪玉」として引き出されてたわけ。そういうふうには、中国ではすぐに「悪玉」と「善玉」、悪いやつといいやつ、ね。そういう分けかたがよくありません。しかし政治的に必要となればすぐに「悪玉」が「善玉」になったりする。鄧小平の場合がそうです。蒋介石もずーっと「極悪玉」でしたが、最近「台湾統一」という政治的必要性から「善玉」に変わっちゃたですね。日本をすべて「悪玉」として描いて、「正義」の共産党がこれに戦って勝利するという「抗日戦争史観」もその一種です。いまでも中国は、もう、すぐ「悪玉」をつくっちゃう。今回の尖閣諸島近海での漁船衝突事件で、前原外務大臣、あいつは悪いつてね。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るわけでしょ。しかしアメリカの中国研究はできるだけ客観的、科学的にアプローチしようとする。毛沢東、劉少奇、林彪、鄧小平らの対立関係を党の権力闘争、あるいは党の路線闘争として描いているわけですよ。どっちがいいとか悪いとかは別として。毛澤東が出る前に、毛澤東よりもすごかったトップのリーダーがいて、**陳獨秀**とかね。それが失脚する。それで毛沢東もパーティー・ラインのアクターの一人として描き、彼らの *struggle* として描くわけだよね。このアプローチはぼくにとっては客観的に中国政治を研究するうえで非常に参考になった。ただ、ぼくが毛沢東に関する修士論文を、**碩士**の論文を書いた後になって、中国政治っていうのをトップのレベルだけで、見ちゃだめじゃないかと思ひ始めた。それだけでは中国政治が十分に分かん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ひ始めて。そこで、どう考え始めたかっていうとね、これが俺のドクター論文だけ。(イ：読みました。) あ、そう？すごいな(一同：笑い)。これを、この発想がドクターに入るころに芽生えた。こんどは**一橋大學社会学研究科の博士後期課程**にまた一浪して行った。その**一橋大學**で、中国政治研究はトップレベルの議論ばかりをしていて、これは中国の政治を全体を見るにはあんまりよく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ひ始めた。なんで思ひ始めたかというとな、農村の問題に興味があつて。それで農村の問題、ここでは革命やるわけだよね。ところが、たとえば、抗日戦争当時、共産党は**蒋介石**と連携を…つまり国共合作の時代に入っていた。その当時、共産党が地主の土地を没収をする政策をやめるんですよ。1930年代後半から。それまで共産党が指導して農村各地ではずっと土地の没収やってたんですよ。「**陳誠コレクション**」って。知ってる？**陳誠**(イ：**陳誠**)。って有名な国民党の将軍がいるでしょ。彼のコレクション、台湾

にあるんですよ。30年代前半の国共内戦の時期に、陳誠は国民党軍の前線の将軍だった。江西とか、湖南、福建とかで共産党が勢力を拡大したとき、蔣介石が共産党勢力を攻撃して全部やっつけちゃうわけだな。そのときに根拠地に残された文書・遺留品の大事なものを持って帰る。それが当時の共産党を理解する一級品の資料にな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が台湾にあるんですよ。ぼくはそれを見て、わあーすごい資料と思った。そういった資料を見たりしてたら、ようするに共産党の中央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と、違うことを下がや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で、国共合作以降、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共産党は土地の没収をやめるんですよ、政策としては「減租減息」政策にかえる。政策としては、だから地主の土地所有に打撃をあたえない。できるだけ…もちろん、貧しい人の味方になるけれど、だけど土地を没収しないという政策をやるんですよ。ところが現場に資料を見ていくと実際にはその当時でも農村の農民たちは土地を没収していつてるわけですよ。なんでこういうふう…で、それが中国の農村革命のダイナミックな、大きな転換になっていくわけですよ。しかも、ま、君らどういうふうに中国か台湾で教育を受けたか知らんけど、ぼくが調べた抗日戦争のあとね、日本が負けて、そのあと再び国共内戦が始まる。その当時の国民党政権と共産党政権の勢力比は、だいたいすべて4対1です。国民党の勢力が。たとえば、党員だとか、軍隊の数とか、それから支配している面積とか。城市の数とか。国民党側が4に対して共産党勢力が1。だいたい4対1の力関係でした。で、蔣介石は内戦開始間もなく、「1年以内に共匪はせん滅する」と豪語していた。ところがそれが逆転して負けるわけでしょ。なんで負けるのかと。（イ：そうですね。）ね、その分析もやらないかんわけだな。そのとき着目すべき点の一つに土地改革、農民革命があった。それを組織したアクター、パワーは何か。そう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るうちに、中国の政治を見るときには、上だけ見ちゃだめだと。「地方」、「基層」の政治社会動向に注目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の「基層幹部」という言葉は中国にあるんですが、学問的に「基層幹部」というのキーワードにして論文のテーマにしたのは、ぼくが最初ですよ。いまはもう中国研究者の多くが「基層」の研究をしてるけど、1970年代の終わりから80年代にかけての研究にはなかったですよ。中国政治研究の中で理論的にどうやって、「基層幹部」を中国のポリティカル・ダイナミックスのなかに位置づけ、中国政治の変容を描き直すか、これはぼくの大きな研究テーマとなった…。だから、そういうふうの研究っていうのは、一種あるテーマでこうやっていくと、それがこう行き着くと、必ず新しいクエスチョンになる。それでそのクエスチョンはなぜかっていうのを解こうとすると、新しいフレームワークというものを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繰り返しだと思う。

43'30"

イ：あの、この本の研究の…資料、資料？新聞ですか。中国の新聞ですか。

天：1940年代に延安で出版されていた『解放日報』が主な資料です。現在上海にある『解放日報』でなくて、後に『人民日報』に引き継がれていく新聞のことなんです。そのマイクロフィルムが日本の幾つかの研究機関にあった。もういまは資料に君ら恵まれてるからきれいに再生されてるけども、あのころはもう、ほんとに目が痛くなるような読みにくいマイクロフィルムでね。それを手巻きのリーダープリンターで一枚ずつ読んでコピーして、蓄積した。『解放日報』をぼくはものすごく活用したよ。で、まあもちろんそれだけじゃだめだ。外国人記者や中国人のいろんな農村ルポルタージュ、あるいは当時の小説などを活用し理解を深めるわけです。それと農村の二つの地域に焦点を当てて、比較研究の方法で分析を行ってみた。同じ時期の二つの**農村根據地**を比較をしながら、なぜこんなに違うダイナミクスで土地闘争や農村変革が進んでいくのかを考えた。トップは同じ政策を打ち出しているのにもかかわらずね。これはちょっと単純化してるんだけど、「**基層幹部**」が有能かどうか、組織としてしっかりしているかどうか、上級指導部との関係がどうか、一般農民との関係はどうかなどが極めて重要な要素だということを知る。でもそこまでは…まあ、そう、文章を通して中国研究をしているだけ。それで、ほんとにこういうやり方だけでいいんだろうかと思うようになった。それで中国政治がわかったのかと自分に問う。本当は分かんないわけだよ。不安なわけですよ。中国研究っていうのは。不安だけど、やっぱり中国を考えていると知的な **incentive** が次々とあふれてくる。ぼくは博士論文を書いたあとは少し新聞分析を続けた。1950年代のたとえば、「**反右派門争**」における大衆意識の研究など。あのころのいつも中国の新聞を分析しながら、政治的な変化の研究を行っていた。それから次の話になるけども、中国断層社会論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のです。

46'00

イ：中国での経験について。

天：1986年の2月から、86年、87年、88年の3月まで北京で暮らしていた。そのときは専門調査員という身分でした。いまはもう、専門調査員は博士課程の学生クラスを派遣して、「便宜供与」、ようするに日常の「**事務業務的活動**」をやらせているわけですよ。しかしぼくらのときは、専門調査員というのは、けっこうランクが上でした。ぼくが琉球大学の**副教授**で、そのときの大使館での**身分**はね、一等書記官、**一秘**でした。それでべつに、「**事務的仕事**」なんて一切要求されない。**隨便**ですよ。研究テーマについて勉強していれば基本的にかまわない。で、ぼくは大使館の**政治部**に所属

してたから、中国政治のニュースや動向を整理し分析し、また地方の視察旅行の成果を政治部に報告していたんですよ。一応は、外交官だったわけだよね。外交官の身分っていうのはね、やっぱり、中国は政治の国だから、日本の外交官に比べて特権が多いように感じられた。学者で中国にあのころ行ったら、地方各地を視察する場合、申請から許可をもらう段階が多く、とても時間がかかるんです。まずは大学だよ。たとえばぼくが北京大学に研修で2年間行くとすると、そうすると、もう、大学のなかで申請して、チェックされて、それを上に提出して、国家教育部が検討し問題がないようだったら、視察先の現地の政府弁公室に連絡し、それから訪問希望組織、人物とコンタクトをとって、了解が出た後に、また逆のコースで手続きが処理される。それから大学から私に連絡が来るのは、最低で3ヵ月か4ヵ月はかかるといわれる。ところがその時はぼくは外交官だったからそんなに時間は必要ない。最初は手続きをきちっとしてただけど、それでもだいたい…二週間くらいでOKだった。やがてもっと簡単に許可をもらうことがわか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中国はやはり「**關係**」社会なんだよ。中国人の大使館スタッフの、そういう方面を担当している人と仲良くなつてね。で、もう、彼が直接、地方の人民政府の外事弁公室、外辦に連絡するわけだよ。それで私の作成したスケジュールをコピーで送って2、3日先方が検討して、OKが出たら、すぐに現地視察が始まるということだった。受け入れてくれた政府のが維持弁公室の担当者は、ホテル、車の手配、視察先の幹部らとの連絡をすべてやってくれていた。それでもうすぐに現地に行くわけだよ。ぼくはそうした1~2週間の視察旅行を繰り返したんですよ。2ヵ月に3回ぐらいの割で。それは一、おもしろかったなあ、ほんとに。いまでは、中国どこにでもひとが行けるけど、そのころは自由にはいけなかったから、珍しかったと思うよ。

この本(『中国改革最前線』『中国大陸をゆく』)は、ぼくが中国へ行って視察旅行をして最初に書いたもの。各地をまわって、大学ノートで6冊くらいたまった資料を使って書いた成果です。そのころパソコンなんかないから。ワープロを北京の自宅に置いてた。それでノートとして。1回の視察で大体三都市ぐらい、およびその近郊農村を回るといった感じでした。たとえば今回は、武漢とそれから**長沙**と**衡陽**、三ヶ所ぐらいを計画して。で、その都市と周辺の農村を調査するんだけど、やはり現場に行かなければ感じられない、見られない貴重な話や出来事にたくさん出会った。そうした旅をずーっと繰り返したの。旅行の時はもうだいたい列車で行った。飛行機に乗ると点と点しか分からない。ようするにその国の事情を知るにはやっぱり自分の目線で感じなければならぬ。例えば列車に乗って、**長沙**まで24時間ぐらいかな。(イ：どこから?)北京から。いまはもう速くなってんだろうけど。一番遠くへ列車で行ったのはウルムチだね。ウルム

チは北京から 72 時間、3 日間。だけど…あ、途中で甘肅省の蘭州に降りて、蘭州の貧困地区を視察し、それからまた列車に乗って、柳園で下車し、ジープに乗ってがたがた道を走り、敦煌についた。敦煌からまた柳園に戻り、また列車に乗ってウルムチについた。そこが一番遠い旅だったな。そういう旅をして、そうしてるときに、ぼくは、中国っていうのは、農村と都市では、こんなにも違うのか、ということを実感し始めた。それはもう風景とかね、人々の生活とか、そういうのが、こんなにも違うのかと。それを関連の論文や資料と合わせ考えると、都市と農村の断層っていうものは、理論的にも言えるわけだよ。歴史のなかで脈々と生きてきた変わりにくい社会構造としての都市と農村の断層、それを自分の肌で感じる事ができた。

イ：それが、なん年の出来事ですか。

天：86 年から 88 年。

イ：ちなみに、あの、先生、もともと日本の農村出身者として、やはり中国と日本の農村を実際目で見たら、どういう感じですか。

天：それはぜんぜん、違うよね。(イ：はい。) ぜんぜん違う。おもしろい話を 1 つ紹介しよう。日本の農村っていうのは都市化されてるでしょ。実際は。実際は、文化も、生活の様式も、それから…風景だって、ずいぶん都市的です。延安に 1987 年夏に行くわけだよ。もちろんおれひとりで…。そしたら、おもしろかったよ。やっぱり外交官という身分が効いたのか、延安の市長がね、迎えてくれたんです。西安から行って。あのころ延安に行く道路はほとんど舗装されてない、山間をぐにゃぐにゃ迂回しながら行くので、朝 7 時前に成案を出発して、夜の 7 時前によく到着する。いまは高速道路ができてから、びゅーっと行けるんだけどね。うす暗くなってきた夜によく着いたら、延安市長がね、歓迎の宴會してくれるわけだよ。それで宴会のところで中国の改革開放をどう見ているかという質問を受けた。そこで僕は、中国を旅して感じるのは、大都市が点在しているが、そうした大都市と大都市の間はほとんど見渡す限り私から見れば農村風景だ。もちろん、小都市と呼ばれるところはあるが、日本人の私から見ればみんな農村の一部。近代化のカギは中規模、小規模の都市ができていくかどうかだろうと言いました。そしたらその延安市長がね、急に立ち上がってね、「そうだ、君の考えに賛成する」とかなんとか言ってね。もう、地方なまりの強いおじさんだったけどね。それでこう言うんだ。「おれは去年、全国市長会の代表のひとりとしてね、日本に行った。会議の後日本を旅行した。東京から新幹線に乗って金沢まで行ったんだって、言ったんだよね。金沢に新幹線なんてあったんだろうか(一同：笑い)。米原という駅で特急か何かに乗り換えて行ったんだろうな。その次に言ったのはね、とにかくその一、新幹線から見える風景は…すべてが都市であった」

ってね。すべてが都市だって言ってたんだよ。へー、そうかなあ、静岡県ってのはお茶の産地だし、名古屋一帯の濃尾平野も農村風景だよ…。だけど延安っていう山奥の、まあ、延安っていうのは**黄土高原中にある町**ですよ。木があんまりないんだよ。あそこはね。いまはだいぶもう緑地され、ずいぶん変化してきたけど。とにかく、その延安の人から見れば、日本の農村は農村じゃないですよ。都市なんですよ。都市。それがすごく印象深かった。君ら瀬戸内海行ったことある？瀬戸内海。中国地方と四国の間にある海。(イ：瀬戸内海。)瀬戸内海を見ると、ぼくの生まれたところ、あそこに小さい島が点在している。あとは海で。あれが中国の風景の縮小版だな…。つまり点在する島々が都市。海が農村。そんなふうに…つまり都市と農村がそういうふうに繋がっていない、一体化していない風景が中国。ぼくは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

都市と農村の断層性ということ意識し始めてから、中国社会の変わりにくい構造をどのように特徴づけたらいいの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すごくこだわり始めた。とこで次に考えたのが、エリートと一般大衆(老百姓)との断層ということです。

ぼくは毛沢東から勉強してるから、毛沢東ってのは、もう人民が歴史を作るんだってね、すごくきれいなこと言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ところが、ぼくが初めて北京に行ったのは…**1976年、第一次中国去**ね。そのときまだ毛沢東が生きている最後のときですよ。その旅行の途中で**唐山地震**を経験した…。ちょうど**瀋陽**で。「四人組失脚クーデター」もその年だったね。まさに**文革**が最後のときですよ。時代。それで毛沢東、共産党はいつも「**为人民服务**」という。で、中国という社会はみんな平等だと思うわけ。ところが北京に行って、**天安門廣場**で、**人民大會堂**革命歴史博物館などをぼくらは見に行くわけですよ。そしたら、われわれを案内してくれている幹部らが並んで**老百姓**をぜんぶどかして、彼らより先にわれわれが建物の中に入る。ある種の特権行使です。(イ：特権…)特権階級ですよ。あれえ、勉強したこととちよつと違うなーと思ってね。その後、北京で暮らすようになって、幹部のみが許可されている病院の別の受け付けや商店など、そういった特権が広く認められていることを知りました。エリート(幹部、**精英**)と**老百姓**の格差・断層みたいなのを感じたんですよ。それから歴史的な関係をずっと調べていって、エリートと**老百姓**の断層は構造的な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たのです。これが2つめの断層性。

それから次に強く感じたことは、中国には法律や規則、制度はたくさんあるが、実際にはそれらはなかなか機能しない。物事を実際に動かす力は「**関係**」とよばれるもの。たとえば環境の法律は次々と作る。環境法なんか、日本に負けないぐらいたくさん、そして厳しいものがある。法律はすぐ作る。しかし法律を信用しない、守らない。法律、**没関係**ってね。つまり大

事なのは「**関係**」なんですよ。中国という社会は。だからぼくがそこで思ったのは、われわれ西側で勉強して、**制度化**という言葉を知る。Institutionが Institutionalize するっていうね。それは、たとえば今日君ら、11時にここ来るじゃない。これは、まあ、約束でもある。ところが、その約束とかルールに従って人間が行動するというお互いの了解があるから、それできるわけ、ね。大学にはカリキュラムがあつて、そのカリキュラムに従って、先生や学生の行動は Institutionalization されてる。近代社会というのはかなり細かい部分でもルールとか法律、制度によって機能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る。しかし中国では表面的にはかなり近代化していても、なかなか制度に沿って物事が処理されていかない。いつも、やっぱり**商量**、**商量**とかね(一同：笑い)。という話になるわけでしょ。人通りの多い道路なんかをよく見ていると、信号はあまり守らない、ヒトと自転車と自動車が混在しながら道路の風景が動いている。つまり制度と人間関係、**関係**の断層っていうのが見られる。3つ目の断層だよ。

それからもうひとつは政治と経済。日本なんかは政治と経済というのは、もうかなり関連し合っているといつていい。政治家も経済との関係をもつてないと政治はできないとかね。それから政治家が政策を語るときにはやっぱり、経済をどうするかっていうのが一番大きな問題。中国は、まあ、いまはだんだん変わってきていると思うけど、中国はやっぱり毛沢東だとか周恩来は、そんなこと考えない。政治がすべて。だからどんなに貧しい状態になっても、中国は素晴らしい、ということをアピールする。論語にも「君主は食を語らず」という言葉がある。まさに政治をつかさどる人は食いものこと＝経済を問題に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で、政治と経済の断層性を象徴している。もちろん今日の中国では政治と経済との関係は緊密化している。しかしそれでも「政治優先主義」とか「政冷経熱」、「政治は引き締め、経済は開放」といった言い方があるように、しばしば政治と経済は乖離する。4つ目として政治と経済の断層が指摘できる。ぼくはその後、『中国——溶変する社会主義大国』(東大出版会、1992年)の中で、中国の変わりにくい構造を「基底社会構造」と名付けて、その特徴をいま語った「4つの断層性+3つの大規模性」——3つの大規模性とは人口、領土空間、そして思想の大規模性——から見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だという指摘を行っている。

1H03'30"

イ：いまの中国をどういうふうに理解したらいいでしょうか？

天：あの一、いずれにしても、中国をどういうふうに理解したらいいのかわかるときに、なんでいま述べたことを考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かということ、中国の全体像が分からない。ある現象を一生懸命勉強する。それは分かる。でも

それを全体のなかにどう位置づけるのかってというのが、どうしても分からない。よく、森を見る、木を見るって言葉があるでしょ。木を見て、森を見ないって。台湾でもあるね。(イ：はい。)木を見て、森を見ない。木を、木をたとえばたくさんみれば森が分かるかっていうと、そうじゃない。木をたとえば百本見たら、あるいは二百本見たら、千本見たら、森が分かるかっていうと分からない。森を見るためには、やっぱり上から見るとか、(イ：はい。)あるいは離れて見ないと分からない。そうしないと分からない。つまり木を見るというアプローチと、森を見るというアプローチとは実は違うわけね。あるいは「群盲象を撫でるが如し」という言葉がある。目の見えない多くの人が、象に触れて象はどういった動物かを言いあっている。ある人は鼻を触り、象は長い穴のあいた柔らかな棒のようだといい、耳を触っている人は平たい柔らかなゴムのようだといい、足を触っている人は太い柱のような動物だといい、しっぽに触れた人は細長い毛の生えた鞭のような動物だということ。それぞれ象の部分としては間違っていない。しかしそれでは象という動物を完全に誤解してしまう。それで、じゃあ、どういうふうに森や象を見たらいいのか。つまり中国という森、象を見るために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かなっていうことを思い始めた。これはやっぱり中国の全国を見る努力をしようと。ぼくはチベット以外はほとんど行ったわけで。それに全体を示す数字、傾向を示す事例を研究した。そうすると中国の全体像がすこし見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それで見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ころで、現象としては激しく変化しても、容易に変わらないものは何かを考えるようになり、先ほど言った「基底構造」論にたどりつく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よ。基底構造を踏まえながら変化する現象を解釈していく、基底構造は中国という巨大な空間を理解するための基本的な方法的な枠組みになったんですよ。

1H 05'15 //

天：アメリカで中国政治研究をやるひとたちは、まず中国を全体主義モデル、**Totalitarian System** で理解しておく。**Totalitarian System** は、もともとはナチズムの研究で、そのナチスの政治体制を研究することを通して理論モデルとなったものです。それをソ連のスターリニズムの研究にあてはめた。冷戦時代にね。で、これで、ソ連の政治がかなり分かった。そこで、それは中国共産主義体制にも当てはめ、それを踏まえたうえで個別の中国の特徴や現象を説明しようとする。でもそれで、ほんとに中国が分かったことになるのか、というのがぼくの疑問なんだよ。それは、前にも言ったように基層幹部の研究なんかをしていて、上と下とが違うことが起こっている。**Totalitarian** の目から、**System** からみたら、上がこう指令出したら下ぜんぶ浸透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だけど、実は浸透していない。いや、浸透しているじゃないかと、言うひともあるけど、「上に政策あれば、下に対策あり」

という現象が広く見られる時、それ自体をいつも例外として扱う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たとえ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をつくると。みんな、世界…中国全体が人民公社をつくるとかいう話になるわけでしょ。けども、よく見てみると、やっぱり各種各様ですよ。あるいは人民公社が廃止されて何年経っても、農民たちは「何々公社」と呼び、あるいは人民公社時代の配分方法(工分)が残っ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る。

で、あるとき、**費孝通**っていう有名な社会学者に会ったことあるんですよ。それでね、**費孝通**と話をして…、先ほど話した変わりにくい構造としての「4つの断層性」を紹介してみた。これに対して彼は…基本的にどこまで分かってくれたかは、分からんけども、こういったぼくの認識が間違ってるとは言わなかった。あなたたちのなかに、いまでもその断層っていうのは存在しているかどうかの問いがあったよね。断層社会は確かに変化してますよ。劇的に変化はしてるんだけど、中国を見るときに断層社会論をこう使えば、よりその変化の特徴を構造的な関係で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とえば、われわれが一般的に理解する中間層はなかなか生まれない。いや、お金の面では中間層は増えて来てますよ、たしかに。けど、われわれの一般的にいう中間層、というのはなかなか生まれてこない。中間層というのは「市民」意識を持っている人ですよ。台湾では少なくとも、70年代、80年代、市民運動が起こったりするわけでしょ。市民が、ようするに自律した個人がある社会的に活躍していくという仕組みが、中国の場合なかなか生まれない。政治的な発言がおさえられてるから。それから、権利意識の問題も限られた地域を除いてなかなか育ってこない。中間層の人々は彼ら自身が独自の主張や立場を持つ存在というよりも、一方でエリート予備軍、他方で老百姓に落ちていく予備軍的な意味合いがまだかなりある。そして共産党がどんどんエリートの代表組織になってくる。だからいままでエリートっていうのはもちろん、都市でいえば官僚、企業家、専門家などですよ。いまの共産党はまさに共産主義のイデオロギーの代表じゃなくて、まさにエリート層の代表に化している。その下に**老百姓**などがあるっていう。まだ、エリートと一般大衆の断層構造は、なかなか変わってない。都市と農村との差っていうのも、やっとならから都市にひとつがずいぶん入って来ている。けど農村から都市にどんどん入りながらも、そのなかの多くが都市のなかに農村を作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ね。**陸學藝**っていう中国の現役の有名な社会学者ですが、彼は近年の中国社会に、都市における二元構造の形成、つまり都市における「都市と農村」という二元構造が形成されてきたと指摘している。それからいまだに、たとえば農村戸籍が残ったままで、都市戸籍と農村戸籍の差別が存在している。**戸籍**だよ。まあ、いまだに…基本的には変わらない。それから、制度の問題は、少しずつ制度化は進んでいると思うけども、非常に歩みが遅い。やっぱり

最後の物事の判断、処理の基準になっていくのは基本的には人間関係、**関係**ですよ。**関係**のネットワークで物事を処理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ね。だから、ある中国の有名な政治家と話をしてて。中国の民主化に対するべく自身のやり方の1つを紹介してみた。なにかっていうとね、地方のリーダー、たとえば**省長**とかね、**市長**とかね、そういうひとたち個人を直接、国民が選挙するようにすればいい。個人を選ぶ選挙だからそれはけっして共産党体制をこわすことにはならない。しかも国民に対しても国際社会に対しても民主的な選挙をやってるというアピールになるよって言ったら、彼は「それは天児さん、だめですよ」という返事が返ってきた。どうして？って聞くと、「われわれ中央はもうすでに、経済を地方に奪われてるのですよ。この上、指導人事まで地方に奪われたら、中央はどうやって地方を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るんですか」と答えた。つまり中央と地方の関係はルールとか法律といった制度によって規定されるのではなく、結局は指導者という人の関係によって規定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の意味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制度と関係の間の特徴もまだ十分に変化しているとは言えないのです。4つ目の断層性として指摘した政治と経済の関係でも、確かに改革開放政策の推進の中で、従来の「政治優先」から「経済優先」の政策に大きく転換しました。経済と政治のインターアクションも顕著になってきています。しかし、今回の尖閣列島近海での中国漁船衝突に端を発した日中関係の急激な悪化現象は、今日日中経済関係は大いに発展し、相互依存的な関係は進んで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いつきよに「政治優先」の状況が生まれ、日中関係を覆ってしまいました。依然として政治と経済の断層が生き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の他、中国の政治を「虚」と「実」の関係から見直す、あるいは中国の外交を伝統文化の視点からとらえるといった興味深い話も残っていますが、今日はもう時間がかなりた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ね。

イ：そろそろここで一段落になります。では、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